

#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杨洁勉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规划和设计自身崛起之路的意识正越来越强，既是为了防止自身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身崛起成果。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艰难转型，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中国在促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和平崛起，就是要完成从大国到强国、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从国际规范被动接受者到国际秩序积极塑造者，最终赢得世界体系核心地位的多重艰巨任务。国际社会的传统大国势必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出让其在现有国际机制中的优势地位，削弱其影响国际社会的能力，进而损害其既得利益。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与传统大国协调各自的立场与利益，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如何与新兴崛起的大国实现和平相处，避免共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同时防止自己衰落，避免丧失在国际社会中的更多既有权利，才是最大的战略任务。

大国崛起的准备主要分为物质准备和理论准备两大部分。理论准备可以防止大国崛起陷入物质主义，单纯追求发展硬实力，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最终陷入非和平崛起的历史悲剧。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不同于单纯地发展软实力，既指对以往大国崛起路径进行阐释与分析，也强调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为中国在崛起前和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建设与对外关系提供战略指导，并有可能对中国崛起提供国际合法性支持，让世界乐见或至少不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崛起进程是通过内部改革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日益巩固和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过程。中国需要发扬和促进内在的制度优势，在外交实践中勇于创新 and 转型，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中的融入式崛起。中国崛起绝不能是体系外的自我实现和膨胀，而应是自觉融入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成功转型的过程。同时，国际体系也不能脱离中国而单独存在，否则将是不健全的，也难以妥善解决全球治理问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根据国际和国内新形势的现实情况，有意识地为崛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与实施途径，满足中国崛起历程中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战略需求。中国崛起可能具有独特性，但作为群体性崛起中新兴大国中的一员，也必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契合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需要有意识和自觉地规划，如何为自己的最终崛起做好充分准备，奠定扎实基础。

当前的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口，既要在推进国际体系顺利转型过程中通过维持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又要彰显国际责任和义务，尽力而为地为全球问题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在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过程中与其他国家一道增进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普遍意识，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 國際展望

双月刊 总第 27 期

2013 年 第 6 期 11 月 15 日出版

## □ 卷首语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杨洁勉

## □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1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

——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

时殷弘

13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韦宗友

27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宋德星

47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

——美国的经验

赵可金

## □ 世界经济

65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特点及原因分析

王国兴 尹翔硕

83 新时期中非金融合作

——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

张小峰

## □ 国际政治

102 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

卢 静

117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

梁益坚

## □ 学术动态

135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嘉涵

140 “2013 周边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方 晓

## □ 书评

145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

——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张 春

150 英文摘要

封三 本刊征稿、征订启事

#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

——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

时殷弘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周本纪》中有关记述的政治和战略解读，探索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中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的塑造和“改换天下”的大战略进程。笔者认为，基于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周族逐渐发展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而牢固地确立了与一种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这一大战略方式成功地使得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便已转移，再辅之以其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和霸权战争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宣示及有效的联盟建设，使得最终的军事决战结果早在战争之前便被注定。周族成功崛起后迅速采取了包括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帝国的大战略措施，保证了崛起成果的延续。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关键词】**史记·周本纪 民族特性 改换天下 大战略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01-12

## 一、“创世纪”（上）或“民族缔造”

### [一个民族与其传统和政治实体的缔造]

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正义种曰稼，敛曰穡。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郟[tai]，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周族的历史起源（虽然是按照传说或传奇的历史起源）：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据蕴意）“民族文化”。]

后稷卒，子不窋[kù，古同“窟”]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集解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不窋以失其官而犇[ben，同“奔”，奔走，流亡]戎狄之间[农耕生活方式的一度倾覆]。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渡]渭，取材用，□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农耕传统由这位族裔领袖失而复得，或曰经“复辟”而确立不移。]○索隐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bin]。□正义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

庆节卒，……[经历七代]……古公亶[dan]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由此开始了农耕华夏与总的来说侵略性和劫掠性的诸游牧族的冲突，那差不多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正义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止于岐下。[在侵略性和劫掠性的游牧族面前撤退和迁徙，如农耕民族那么多次地做的那样。它们在文化上和体魄上显著地较少战斗性，并在军事上相对低效。]◇集解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驷案：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古公亶父；经过在他领导下的迁徙和选择，周族的经久核心

居住地和力量崛起根据地得以确立。] 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古公亶父；“民族”传统和文化通过更富特征的“自我界定”而进一步强化。“民族”特性的初始的决定性巩固]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集解徐广曰：“分别而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集解礼记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郑玄曰：“此殷时制。”[古公亶父；更为定居的生活，城镇建造，国家构建；部分地依靠选择性地模仿先进“民族”殷商。周族给它自身的“制度供给”：供给一种符合自身“民族”特性、富有发展前景和具备未来的广泛“复制”和推广潜能的制度。] 民皆歌乐之，颂其德。○索隐即诗颂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是也。

## 二、“创世纪”（下）或“改换天下”

[走向权势、造反和新型帝国之路（连同一种在对外关系中富有特色的政治/战略文化和愈益自觉的相关战略的形成）]

[第一阶段，伟大的政治领导从事的初始“战略缔造”]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经行使“软权势”而壮大和扩展。]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前12至11世纪；一说前1152—1056年][文王；周族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领导——伟大的战略成就的一项先决条件或大便利条件；他承继的和在他那里才成为自觉的战略传统；他的战略抱负、战略眼界、战略勤勉和战略耐心]，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被牢固地确立。一个正在兴起中的自觉的新型强国或许已开始形成其大有抱负的大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它大致已经有了它的民族和政治文化特征天然地规定的根本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 伯夷、叔齐在孤竹，◇集解应邵

曰：“在辽西令支。”闻西伯善养老，盍[hé, 合, 聚合]往归之。太颠、闳[hong]夭、散宜生、鬻[yù]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

崇侯虎谮[zèn]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you]里[文王囚中演《周易》，成为一位自觉的甚而“理论化”的战略家]。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shen 或 xin]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莘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骊戎之文马，□正义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按：骏马赤鬣编身，目如黄金，文王以献纣也。有熊九驷，□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驷，三十六匹马也。他奇怪物，因殷嬖[bì, 宠幸]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以献纣”——作为战术甚或战略的贿赂：如此富有美德的一位君主——文王——从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纣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索隐一物，谓莘氏之美女也。以殷纣淫昏好色，故知然。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yuè, 长柄重斧]，使西伯得征伐。[本为潜在反叛者所不得的先进武器现在被用来交换腐败性的礼物或贿赂，特别是美女。一位盲目愚蠢的暴君并无战略警觉，不仅因为他贪婪，而且因为他的未来死敌施行战略性欺骗或麻痹。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商纣王的“非战略性”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炮烙]之刑。[一个从人道和政治考虑两者出发的提议。道德行为可以非常政治性，在此场合为的是增进提议者的众望和影响——作为各族国中间的潜在领袖的众望和影响。]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阴行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政治战略；韬光养晦，持有伟大抱负和具体目的，并且从事勤勉的有目的的操作。宏伟的大战略目标大概已经相当自觉地得到确立，至少在政治领导的心目中，同时相应的初期大战略——渐进式低风险准备——得到意识明确的积极使用]，诸侯皆来决平[即求仲裁]。于是虞、芮之人□正义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有狱不能决，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政治文化和对外战略文化开始非常显著地具有“国际”吸引力。为具体方式尚系遥远模糊的决定性变革作积极明确的准备。在政治和外交战线的战略眼界和积极作为。]

明年，伐犬戎。□正义后汉书云“犬戎，桀瓠之后也”，今长沙武林之郡太半是也。又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明年，伐密须。□正义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涇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明年，败耆国。□正义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既行使软权势，也行使硬权势；或者说，政治吸引和军事征伐都属必要，都被施行。“双重战略”。合适的大战略往往必须是类似的双重战略或多重战略。]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依靠盲信或声称的天命 vs. 依靠人类努力——决绝的和明智的努力。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盲目狂傲和如后所述极端腐败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明年，伐邶[yú]。□正义括地志云：“故邶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邶国城也。”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正义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郿县东三十五里。镐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自岐下而徙都丰[“周人建都于镐”]。明年，西伯崩[文王太好地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完全奠定一种大有特色的“民族”政治文化、一种政治大战略和一个潜在的真正新型的帝国，那有待他的后继者去实现。他奠定了一种辉煌的战略传统。]，  
◇集解徐广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 [第二阶段，伟大统帅指挥的一场革命和历史性战役]

武王[一说前 1087—1043 年，文王次子]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文王第四子]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族现在已经接近具有实现宏伟的大战略目标的几乎一切关键条件：伟大的战略传统、杰出的战略统帅及其政治/战略幕僚群体、即将形成的“国际”联盟和即将到来的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

[武王；决定性的武力变革时刻：动员、战争目的宣告、革命进军和大联

**盟締造：**]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集解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索隐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集解马融曰：“诸受符节有司也。”“齐栗[犹斋栗，敬慎恐惧貌，语出《尚书·大禹谟》]，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广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集解郑玄曰：“号令之军法重者。”“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孟]津者八百诸侯。[一个专门的从事决定性较量的“国际”联盟，它奠定了未来经久性的“帝国”结构的很大部分——附属国/宗主国关系部分]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动员、宣告、进军，接着令人惊奇地戛然而止：这看上去是个大谜团。也许突然发生某事，表明就决战决胜而言时机尚未成熟。决绝迅速地调整，以适合形势。规划了的革命远征成了一场战略性演习。]

[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终于到来；它到来时，几代人准备的战略资源业已齐备：]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集解徐广曰：“一作‘灭’。”[革命危机真正到来。武力决定的最有利时刻。]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集解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大军革命远征终于发动！]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正义毕，尽也。尽从河南渡河北。诸侯咸会。[注意：下述初步的关于新权力取代旧权力、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包括“国际”制度）的价值意义和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宣言（虽然尚未实现的新权力和新制度至此依然是模糊的，但它必定已经可以从周族及其国家的、与商纣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较明确地推导出来）：]曰：“孳孳无怠！”[最严肃的事情，生死斗争，被所有斗争参与者最严肃地感知。]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集解马融曰：“动逆天地人也。”离遘[ā]其王父母弟，◇集解郑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举亲者言之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集解郑玄曰：“夫子，丈夫之称。”不可再，不可三！”[造反和征服之最终宣告，

充满伦理道德理由，甚而宗教辩解。]

[历史性的牧野之战：（一次又一次地发布宣告：这个事实表明，这场战役被自觉和明确地设想为百分之百的政治意味的战役，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政治动员和鼓动是关键。也许这也是为了使一个人自己（他说到底还是保守的）确信这场特殊的革命完全有理。]二月甲子昧爽，◇集解孔安国曰：“昧，冥也；爽，明；蚤[早]且也。”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集解郦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集解孔安国曰：“钺，以黄金饰斧。左手杖钺，示无事于诛；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令。”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集解孔安国曰：“劳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集解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集解孔安国曰：“亚，次。旅，众大夫也，其位次卿。师氏，大夫官，以兵守门。”千夫长、百夫长，◇集解孔安国曰：“师率，卒率。”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称尔戈，◇集解孔安国曰：“称，举也。”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集解孔安国曰：“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今殷王纣维[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集解郑玄曰：“肆，祭名。答，问也。”昏[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集解孔安国曰：“言纣弃其贤臣，而尊长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同时几乎也是意识形态宣言：实际上示意了未来新帝国的规范的根本价值基础将与商纣帝国的那些截然相反。]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集解孔安国曰：“今日战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相齐。言当旅进一心也。”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集解孔安国曰：“伐谓击刺也。少则四五，多则六七，以为例也。”勉哉夫子！[一项要革命的追随者们放心的鼓动：这场革命不仅完全有理，而且颇为容易，没有他们放血和死亡的大风险。]尚桓桓，◇集解郑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罍，如豺如离，◇集解徐广曰：“此训与‘螭’同。”于商郊，不御克犇，以役西土，◇集解郑玄曰：“御，强御，谓强暴也。克，杀也。不得暴杀纣师之犇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然而同时，这是生死斗争，大家必须彻底投入！]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集解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以大卒驰帝纣师。  
□正义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兵员数量优势在这场战役中毫无意义。]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叛]纣。[这是一场压倒性地被政治决定了的战役，甚至在战场上。]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正义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琬五，环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正义谓至朝歌。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上天降给你们安宁（休战）]”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一位对被征服了的民众颇为仁慈的征服者，使人想起另一位伟大的华夏革命家刘邦的《约法三章》。]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正义周书作“轻吕击之”。轻吕，剑名也。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集解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县[悬]其头小白之旗。[政治行动有时是非常象征性和戏剧性的行动，为动员、宣告或辩解之目的。而且，有时剧烈的残酷被设想为必需，以求令人铭刻在心的戏剧性效果。]武王已乃出复军。

[胜利之后庄严的革命典礼，以使用一种非常简要的方式宣示它的神圣意义，宣告天命所归和（据蕴意）人民（即被统治者）付托：]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集解蔡邕独断曰：“前驱有九旒云罕。”薛综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集解周礼曰：“司烜氏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曰：“鉴，镜属也。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絮气。”卫康叔封布兹，◇集解徐广曰：“兹者，籍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召公奭赞采，□正义赞，佐也。采，币也。师尚父牵牲。尹佚筮祝曰：□正义尹佚读筮书祝文以祭社也。“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不再提到“唯妇人言是用”、“怡说妇人”，那先前被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作为被摧毁的统治者的首要邪恶。为什么？有趣和费解的一点。]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革命成功，周族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新“国际”政治文化；新体制即将正式发动，以致“天下变换”。]

[第三阶段，开启新体制和新帝国的大战略措施：确定“封建主义”（分封诸侯）、构筑安全体系（置三监）、赢取贫弱民众支持和显示新型统治方式（振贫弱萌隶）、正式确立正统史册或正统意识形态（记政事，追思先圣王）]

[西周帝国制度确立；相应的政治、战略、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所有这一切都同时是非常战略性的；和平初始时节旨在确保新秩序安然长存的系统的大战略（分别关于总体政治秩序、地缘安全战略、合宜的社会安排、正统意识形态）。]

封商纣子禄父[即武庚]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按：二说各异，未详也。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可作式，同“轼”]商容之闾[武王乘车经过贤人商容家门口，俯首而立（以表敬意）]。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广曰：“保，一作‘宝’。”命闾夭封比干之墓。□正义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集解孔安国曰：“武功成也。”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郑玄曰：“宗彝，宗庙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集解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黄帝之后于祝，□正义服虔云：“东海郡祝其县也。”帝尧之后于蓟，◇集解地理志燕国有蓟县。帝舜之后于陈，□正义括地志云：“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大禹之后于杞。□正义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对正统古史表示尊崇，以表明新政权是这历史的合法后继者。通过变革与保存、进行革命与追随“宏伟传统”而来的合法性。一场特定的革命：既作为革命，又作为保存。]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正义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弟叔度于蔡。□正义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县，古蔡国，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是也。”余各以次受封。

### 三、平叛与巩固

#### [胜利伊始的远大战略忧虑和深刻历史回顾]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正义括地志云：“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名为。”按：盖武王登此城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义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一位审慎、勤勉和心怀忧虑的伟大统治者，在他辉煌的历史性成功之后立即忧虑他的新政权的安全。“人类幸福永不常驻不变”（西方撰史之父希罗多德史书概语）。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在此思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代历史教训。一番深刻的历史回顾：][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战时和平时、未胜之时和胜利之后始终满怀历史意识、政治清醒和战略忧患感；能望远、能深思、能雄辩、能实干的统帅：]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汝]：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纣帝乙立后，至伐纣，凡六十年]麋鹿在牧，◇集解徐广曰：“此事出周书及随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鸿满野。○索隐按：高诱曰“蜚鸿，蟻蝶也”。言飞虫蔽田满野，故为灾，非是鸿雁也。随巢子作“飞拾”，飞拾，虫也。正义蜚音飞，古“飞”字也。于今犹当今。于今六十年，从帝乙十年至伐纣年也。麋鹿在牧，喻谗佞小人在朝位也。飞鸿满野，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言纣帝乙立后，殷国益衰，至伐纣六十年间，谄佞小人在于朝位，忠贤君子放迁于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索隐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见灾异，我周今乃有成王业者也。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摈]灭，○索隐言天初建殷国，亦登进名贤之人三百六十夫，既无非大贤，未能兴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摈灭，以至今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索隐言今悉求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与纣同罪，故曰“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索隐八字连作一句读。我维显服，及德方明。□正义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集解徐广曰：“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索隐杜预云三涂在陆浑县南。岳，盖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谓近岳之邑。度邑，周书篇名。粤詹维[洛]、伊，毋远天室。”[忧虑，但同时持有关于旨在安全和维

护的初始措施的明确构想。]□正义粵者，审慎之辞也。言审慎瞻维、伊二水之阳，无远离此为天室也。营周居于雒[洛]邑[东都洛邑，成王时期周公营建]而后去。□正义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郑郛，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左传云‘成王定鼎于郑郛’。”纵马于华山之阳，□正义华山在华阴县南八里。山南曰阳也。放牛于桃林之虚；◇集解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偃干戈，振兵释旅；◇集解公羊传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试图使文化非军事化，以求和平化和稳定。]

……武王病……而后崩，◇集解徐广曰：“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 [平定叛乱，杜绝复辟，即武力巩固新帝国]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周公；伟大和漫长的历史性事业必然需要至少两三代非常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旨在巩固的最重要措施：使中央权力掌握在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统帅手中。]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三监叛，周公东征，平之。镇压最高层或大贵族叛乱，镇压复辟企图；武装巩固。][巩固新近已创立的制度：战略措施、政治教育措施、意识形态发展措施和（后述的）制度发展措施。它们总合起来是巩固新秩序的大战略措施：]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正义尚书洛诰云：“我卜灋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按：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东都洛邑]，颇收其馀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初，管、蔡畔[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集解孔安国曰：“封命之书。”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集解孔安国曰：“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总括周族政治经验，并为帝国治理树立信条。]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极负责任、非常忠诚和道德端正的国务家。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往往需要有伟大的个人品格。]

[随后旨在巩固的大战略措施：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

成王在丰[镐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成王]东伐淮夷，残奄，◇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迁其君薄姑。◇集解马融曰：“齐地。”□正义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巩固之后的东向武力扩张——旨在巩固的扩张。]成王自奄归，在宗周，□正义伐奄归镐京也。作多方。◇集解孔安国曰：“告众方天下诸侯。”既紕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集解孔安国曰：“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古文尚书序，周官，书篇名。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和帝国的进一步体制化。]……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对新的、有可能不胜任的君主的关键性政治教育，依据历史经验、光荣传统和关于审慎节俭的新政治信条进行的政治教育，预防既是狭义也是广义的腐败。政治教育跻身于、并且必须跻身于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之列。]以笃信临之，作顾命。◇集解郑玄曰：“临终出命，故谓之顾。顾，将去之意也。”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馀年不用。◇集解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集解孔安国曰：“分别民之居里，异其善恶也。成定东周郊境，使有保护也。”[两者都是战略安全措施]，作毕命。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收稿日期：2013-08-25]

[责任编辑：张 春]

#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 与大国崛起

韦宗友

**【内容提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关键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主权 殖民体系 后殖民体系 大国崛起

**【作者简介】**韦宗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中图分类号】**D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13-14

大国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一直以来，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崛起多持悲观看法，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和约”）创立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以来，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乃至霸权战争，和平的权力转移寥若晨星。1648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看法，英国、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德国（威廉一世和希特勒）以及日本等一个个大国的崛起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西方学者据此认为，在主权国家体系下（即西方学者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来提供秩序与安全，国家间关系是恒久不变的“零和性质”，一国的权力和财富增长必然会引发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冲突与战争便不可避免。<sup>①</sup>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崛起前景极为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很可能会引发中国与西方大国及既有秩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大国政治悲剧”难以避免。<sup>②</sup>

本文认为，将大国崛起时的战争与冲突归因于主权国家体系或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进而以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预测大国崛起的“悲剧”，显然具有误导性，这过于“简约”。主权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大国崛起的“悲剧”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演绎或理论抽象，而是一个实证问题。具体地说，主权国家体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含有丰富历史内容及边界的规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规范结构下，大国崛起的路径将截然不同，战争与冲突并非大国崛起的宿命。

## 一、主权国家体系、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

1648年和约被广泛认为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也是主权国家体系诞生的标志。波切尔（David Boucher）提出，和约“正式承认了欧洲现代国家体系并为其奠定了基础”，“确认了诸多国家行为体的正式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同时将均势原则确认为阻止霸权的机制”。霍尔斯蒂（Kal Holsti）也指出，

---

<sup>①</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p. 102-128.

<sup>②</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10.

“和约使得主权观念合法化，王朝不再受到等级控制而获得自主。它创造了一个可以让欧洲政治维持碎片化的架构。”摩根索宣称，和约“……使得主权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石”，“国际法规则得以牢固确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宣称，和约“正式承认了主权国家体系”。扎切尔（Mark Zacher）则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国家在其疆界内的最高权威或主权，终结了教会的跨国政治权威。”<sup>①</sup>

近年来，上述观点正日益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和约并没有确立国家主权原则，也没有由此创立一个基于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sup>②</sup>奥珊德（Andreas Osiander）通过对三十年战争及和约内容的详细分析，认为和约并没有确认任何国家的主权，更没有确立主权原则。针对被学者们视为国家主权原则获得明确确认的荷兰及瑞士独立，奥珊德指出，荷兰的独立是在1648年1月荷兰与西班牙国王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确定的，但该和约不是1648年10月签署的和约的一部分。换言之，荷兰的独立在和约签署前已经获得确认。至于瑞士，早在和约签署前，瑞士也已经事实上获得了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完全独立，若不是瑞士一个稍晚加入的州希望在和会上进一步确认其独立，瑞士甚至根本不想与和会发生任何关系。奥珊德还特别分析了神圣罗马帝国内各邦、自由城市的独立问题，指出尽管和约规定了诸侯邦、自由城市的实际领土管辖权以及对外结盟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主权地位，因为根据和约，这一结盟权不能用来损害皇帝或帝国及其公共安全，而且1648年后欧洲其他行为体也并没有承认他们的主权地位。<sup>③</sup>

奥珊德的批评细致入微，但过于苛刻。尽管从技术角度看，荷兰、瑞士的独立与和约的关系或许还可斟酌，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总体图景是，经过三十年战争及和约，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正式抛弃，承认了新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利，也为世俗国家的君主或国王行使境内的最高统治权（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扫除了法律障碍。而且，神圣罗

<sup>①</sup> All cited from 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2, Spring 2001, pp. 260-261.

<sup>②</sup> Randall Lesaffer, "Peace Treaties from Lodi to Westphalia," in Randall Lesaffer ed., *Peace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10; 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1, 1999, pp. 569-591.

<sup>③</sup>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pp. 262-273.

马帝国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加剧了帝国境内的诸侯“割据”局面。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如荷兰、瑞士、法国、瑞典、英国、西班牙等，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立乃至主要行为体，对内行使最高统治权，对外享有结盟、宣战、缔约等独立权与平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开启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新时代。

不过，这一“主权国家体系”与其当代含义有很大不同。自16世纪以来，经过博丹、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的阐释，主权概念已经具有“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及平等权”两大基本含义。但由于直至一战以前，战争一直都被视为执行一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政策工具，以武力获取领土以及征服非但未被视为非法，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被视为一国拥有主权的显著标志。因而，在对外关系方面，这一主权观念更多是强调一国不受外来约束，必要时以武力开疆拓土的能力，而不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对他国主权的尊重。

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此时的主权国家概念仅限于欧洲一些大国，即便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侯邦也不能被视为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至于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完全被排除在主权资格之外，它们反而是欧洲大国行使主权的对象及检验主权能力的场所。<sup>①</sup>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先后以宗教及文明标准，将欧洲以外的世界视为可以合法占领（occupation）及征服（conquest）的囊中之物。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前的一个多世纪，即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欧洲近代海外殖民风气之先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在罗马教皇的鼓励下，对新世界的“异教徒”进行征服，对其领土进行瓜分。1452年，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权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令其享有进攻、征服、臣服撒拉孙人、异教徒以及所有基督敌人的权利。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国王及王后颁发诏书，正式确立基督教对新世界的统治权，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领土，并将所有新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土地的征服和统治权分别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1495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也授权约翰·考伯特及其三个儿子探寻并发现世界上任何被异教徒占有的岛屿、国家或区域，令其加以征服、占领并纳入国王统治之

---

<sup>①</sup>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

下。<sup>①</sup> 他们将这些占领或征服的目标大致分为两类：无主地和可征服的领地。所谓无主地，主要是指美洲大陆、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岛屿。欧洲法学家及神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土著居民没有在其居住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对其土地进行有效的利用，因而不能认为这些土著对居住地区拥有主权，这些地区属于“无主地”，欧洲人可以合法占领。再后来，特别是欧洲进入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后，它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非洲、亚洲等已经拥有政治或政府组织形式、达到较高“文明阶段”的广大地区。在欧洲列强眼中，虽然这些地区不属于“无主地”，但由于它们依然没有达到欧洲的文明标准，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成员，因而其土地可以被视为征服和割让对象。<sup>②</sup> 正是以宗教和文明标准为借口，欧洲国家不仅“发现”和“占领”了美洲新大陆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而且在非洲、亚洲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狂潮，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

显然，这一时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体系），并不是当代理解的主权国家平等、独立的国际体系；相反，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部扩张、占领、征服的不平等体系。它是欧洲国家消灭土著民族、占有其土地，征服“落后民族”、割让、吞并其领土的殖民体系，也是一种基于种族优越论、以武力夺取“落后民族”领土的欧洲列强主权体系。换言之，它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的殖民体系。

从时间上看，这一殖民体系始于地理大发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走向没落，而其消亡则迟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独立浪潮。该体系的最大特征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宣称的“主权独立”，而是其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它只承认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的领土主权，其余国家和地区则是殖民和征服的对象。它不仅不反对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相反还将这一能力视为国家拥有主权的重要指标。它隐含了这一推论：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在欧洲之外以武力“开疆拓土”，那么其主权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随着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最终瓦解，国际体系进入了后殖民体系时代。

---

<sup>①</sup> M. F. Lindley,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Being A Treatise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Colonial Expans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26, pp. 24-26.

<sup>②</sup> *Ibid.*, pp. 24-31.

在后殖民体系时代，主权原则真正覆盖全球，国际体系不再是一些国家拥有主权，另一些国家被剥夺主权的平等体系。《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主权平等是联合国赖以成立的基本原则。其次，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被明确禁止，行使主权不再意味着对“落后地区”或“弱小民族”的征服，而是对任何此种企图的“自卫”或在联合国授权下的集体防卫。《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sup>①</sup> 相对而言，这一体系至少在形式上确立了主权平等和独立，也明确废除了殖民掠夺和战争、并对武力使用施加了严格限制。

综上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前后相继的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尽管前者在时间起点上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前者的最大特征是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后者则是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真正覆盖全球的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这两个阶段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统称，实际上掩盖、模糊了其中存在的重大差异。

## 二、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殖民体系是一个不平等、充满暴力的等级体系，也是将殖民掠夺与征服视为大国行使主权中应有之义的弱肉强食体系。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拥有巨大暴力能力和殖民能力的欧洲列强，居于金字塔中间的则是较弱一等的欧洲国家以及拥有主权或半主权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居于金字塔底层的则是完全丧失主权的亚非拉被征服、掠夺和占领的“落后民族”和“野蛮地区”。

---

<sup>①</sup> 联合国官方中文网站：《联合国宪章》，<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这一体系下，大国的崛起与殖民掠夺密不可分，殖民掠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它往往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欧洲列强对非欧洲地区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二是欧洲列强之间因殖民矛盾而发生的殖民争夺或争霸战争。

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崛起之路无不伴随着海外殖民与扩张，伴随着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敲骨吸髓般的掠夺与剥削。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和近代殖民主义的开拓者。如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美洲对欧洲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自 1492 年第一次与美洲进行接触之后，“立刻开始了一个爆炸式的、大规模的对美洲国家和文明的毁坏，对贵金属的掠夺，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地的占有。”<sup>①</sup> 它们通过武力摧毁了印第安文明，杀戮了印第安人口，占领了它们的土地。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还从美洲攫取了巨额的黄金、白银。据不完全统计，1561—1580 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约 85% 来自美洲。从地理大发现到 1640 年间，至少有 180 吨黄金和 17000 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而真实的数据可能至少是这一数量的一倍。此外，欧洲人从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及非洲奴隶贸易中也聚敛了巨额财富。<sup>②</sup> 除了抢占了美洲新大陆，它们还将触角延伸到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后起者荷兰、法国和英国如法炮制，也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殖民帝国。特别是英国，通过十七至十九世纪一系列的殖民征服和殖民战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占领了地球陆地面积的 1/3，统治了全球人口的近 1/3。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不仅为欧洲列强的崛起提供了可供掠夺的资源（如葡萄牙、西班牙在美洲掠夺了大量的贵金属）和廉价的劳动力（非洲黑奴和亚洲苦力），为其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间”，还为其商品找到了广阔的外部市场，弥补了国内市场的不足，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英国 19 世纪著名的殖民理论家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就指出，由于工业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仅靠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将难以为继，英国必须进行海外殖民才能维持经济

<sup>①</sup> J. M.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3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239—249 页。

增长和繁荣，才能避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sup>①</sup> 美国学者布劳特甚至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发现后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等地的贵金属及种植园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sup>②</sup>

随着一批批欧洲国家加入海外殖民饕餮盛宴，它们在征服掠夺亚非弱小、落后民族的同时，彼此之间因不可调和的殖民矛盾和殖民争夺而时常兵戎相见，战争频仍。如表一所示，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欧洲传统的殖民大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先后被英国打败，被迫将大片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英国成为这一系列殖民战争（除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大赢家，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也正因为这些战争，老牌殖民大国西班牙、荷兰逐渐走向衰败，潜在挑战者法国也遭受重大挫败。英国取代西班牙、荷兰成为海外殖民大国，并逐渐获得了海上霸权地位。换言之，英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和海上霸权国与殖民战争密不可分。

到19世纪末，随着德国、日本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殖民瓜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阳光下的地盘”。它不仅引发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瓜分狂潮，也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可供殖民掠夺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参与殖民争夺的国家及其殖民欲求却日益上升，不可避免地导致后起大国与既有殖民大国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兵戎相见。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是殖民体系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大国崛起的必然产物。

即便美国的崛起被认为总体上是和平的，但事实上也与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有着不解之缘。尽管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没有从事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但通过对境内土著印第安人的杀戮和驱逐以及狂飙突进式的“西进运动”，美国占有了与其人口极不相称、令其他欧洲帝国相形见绌、具有洲际规模的广袤国土。换言之，美国是通过国内殖民替代了海外殖民，走上崛起之路的。而且，在世纪之交，美国与没落的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争，占有了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向欧洲老牌殖民帝国展示了肌肉，并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

<sup>①</sup> Bernard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

<sup>②</sup>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第249—252页。

表一：殖民帝国间因殖民引发的战争，17世纪至美国独立战争

| 时间   | 名称               | 所涉及殖民地   | 影响  |
|--|------------------|--|---|
| 1652<br>—<br>1654                          | 第一次英荷战争          | 英荷相互不得与欧洲以外的另一方所属岛屿和殖民地通商。   | 荷兰的海上霸权受到削弱；英国开始走上争夺海洋霸权的殖民帝国道路   |
| 1655<br>—<br>1658                          | 英国与西班牙战争，法英结盟    | 英国占领牙买加，控制了荷兰的航运，确保了自身商业安全。  | 西班牙进一步走向衰败，英国加强了海上地位。   |
| 1665<br>—<br>1667<br><br>1672<br>—<br>1674 | 第二、三次英荷战争        | 第二次英荷战争，英国在欧洲败北，但在美洲颇有斩获，夺取了北美一些荷属殖民地；第三次英荷战争，荷兰将美洲的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割让给英国，承认英国人对圣赫勒拿岛的占领。 | 荷兰从此丧失海权，英国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海上霸主。  |
| 1756<br>—<br>1763                          | 以英法为主要交战方的“七年战争” | 法国及西班牙在北美大陆的大部分殖民地转入英国；英国获得西印度群岛大量法国殖民地；英国获得在印度所占土地。                                 | 英国成为海外殖民大国和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法国失去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国际地位受到重创。                                  |
| 1775<br>—<br>1783                          | 美国独立战争           | 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仅剩加拿大；西班牙拥有密西西比河以西与北纬31度以南的地区，其余为美国国土。                           | 美国独立是英国海外殖民的一次重大挫折，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拉美人民的反殖解放战争，在美洲大陆敲响了欧洲殖民的丧钟。 |

笔者整理制作。资料来源：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272页。

不过，这一殖民体系也孕育了促使其自身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首先是

地理空间的限度。殖民体系的逻辑前提是有足够的地理空间可供大国殖民和掠夺。然而，随着欧洲国家经过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占有和殖民，地球上的“无主地”和落后地区已经被占领和瓜分殆尽，不再有新的“无主地”或“落后地区”可供欧洲殖民和瓜分。殖民体系面临无地可殖的尴尬境地。这种基于对土地及其人口的物理占领的体系受到地球物理空间的限制。<sup>①</sup>

其次是主权规范的普及。西方国家全球殖民的过程，也是主权规范由欧洲向全球扩散的过程。欧洲列强通过发现、占有和建立殖民地，来印证和强化其主权意识和主权地位，但同时也唤醒了亚非拉被掠夺和被剥削地区人民的主权和民族国家意识，极大促进了主权规范的拓展。当亚非拉国家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获得行使主权的能力时，主权就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权，而逐渐成为全球性规范，也成为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侵略和干预的利器。主权规范的普及，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和合法性，消解了西方国家以文明标准构建的主权等级体系，破除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殖民神话。<sup>②</sup>

最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殖民体系最终走向灭亡的加速器。这两场造成上亿人口死亡的世界大战，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灾难，使殖民国家陷入道德破产，无法再以文明传播者或文明标准制定者自居，同时也极大削弱了它们对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促进了亚非拉人民的觉醒，唤醒了它们的主权意识，加快了殖民体系的没落和最终的灭亡。

### 三、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如前所述，后殖民体系是一个主权规范在全球普及，各国至少在国际法

---

<sup>①</sup> 张春和潘亚玲将这种基于对他国领土和人口物理占领的战争，称为“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这与本文提到的殖民体系下的殖民掠夺战争有相似之处。参见张春、潘亚玲：《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14—21页；潘亚玲：《试论全球化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存能力》，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第89—96页。

<sup>②</sup> 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副研究员的提醒。他指出，当主权民族国家制度及理念的扩散和推广到极致，达到全球普及阶段，殖民体系本身也就宣告结束了。另可参见潘亚玲：《“文明标准”的回归与西方道德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39—45页。

意义上获得主权独立与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它明确将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视为非法，并将国家单独及集体自卫权之外的武力使用权威由单个国家收归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这一体系中，出现了防止大国通过武力实现崛起的三重保障。首先，规范保障。主权规范得到公认和全球普及。主权不再是少数西方大国的特权，而是不论大小、强弱之所有国家的普遍身份和权利。尽管冷战结束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超越、弱化主权观念的声音和现象，但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不是淡化了，而是强化了。在这一规范体系下，即便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军事干预，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也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因而，很难想象一国会公然挑战主权规范，进行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其次，国际法保障。《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所有成员国主权一律平等的原则，并明确规定除自卫及安理会授权的战争外，所有其他类型的战争都为非法。在此，除了自卫外，战争不再是单个国家可以自行其是的自由度量，而是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的集体裁决。最后，制度保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任何战争行为都必须获得安理会五常的集体同意或默认。而一旦发生侵略行为，通过安理会的授权，入侵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集体制裁，包括武力的行使。虽然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冷战时期因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其作用大打折扣，在冷战后也因人道主义干预问题而饱受诟病，但总的来说，它在制止侵略和限制使用武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此外，由于主权规范普及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使得历史上的征服战争变得极为困难甚至难以想象，因为任何征服和入侵必然遭到民族主义的誓死抵抗，军事入侵和占领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而军事技术革新、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任何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霸权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无异于自杀。

与先前的殖民体系相比，在这一主权平等的后殖民体系下，后起大国很难指望通过殖民掠夺或武力开疆拓土实现崛起，只能依靠内部发展及和平的对外贸易。在这一体系规范下，大国崛起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模式：贸易国的兴起<sup>①</sup>以及大国门槛的提高。在殖民体系下，由于海外殖民掠夺可以

---

<sup>①</sup> 关于贸易国兴起问题，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曾有专著论述了贸易国的兴起，指

有效弥补国内资源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排他性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因而像诸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土狭小、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都可以通过强取豪夺、开疆拓土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在后殖民体系下，尽管海外贸易可以弥补一国国内市场的不足，但上述国家显然已被注定无法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只有那些具有广袤国土面积、拥有可观人口规模（在人口爆炸的今天，这意味着要拥有约一亿左右的人口）的洲级大国或巨型国家才可能成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大国的门槛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开疆拓土，大国崛起更多地依靠内部建设及自由贸易来积聚财富，这为贸易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等人早在18世纪就意识到自由贸易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性，并鼓吹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之上的“非正式帝国”，而不是建立排他性的殖民地，<sup>①</sup>但在殖民体系下，自由贸易受到排他性殖民地的顽强阻击，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当二战临近结束、欧洲老牌殖民大国已经被战争严重削弱时，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开始为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谋划，最终签署了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自由贸易的实施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也为贸易国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虽然由于冷战开始阻挠了东西方贸易，但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贸易原则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而随着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自由贸易原则真正在全球得到贯彻。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正是贸易国的崛起。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也受益于自由贸易，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贸易国的崛起。中印等新兴大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与汗水，通过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为世界打工”成为“世界的工厂”和“世界的办公室”而逐渐走上崛起之路。特别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而且由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一跃而成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全球贸易大国。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仅比美国少156.4亿美元，达38,667亿美元，

---

出了贸易国与领土国家之间在对待征服问题上的根本差别。See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sup>①</sup>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7;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pp. 1-27.

居世界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 47%。中国已是亚太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之一。<sup>①</sup>

后殖民体系为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殖民体系下，西方世界凭借其坚船利炮和技术优势，将非西方世界变成其可以肆意妄为的“自家菜园”。西方世界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革新，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新，都会激起西方世界新一轮殖民和瓜分的狂潮，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和痛苦，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殖民深渊和穷困潦倒境地。在后殖民体系下，技术进步除了增加军事威慑力外，更多地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创造商机和改进普通民众的生活，用于增加一国的财富。而即便是军事威慑能力的增加，也无法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夺，甚至不能用它来打开他国的市场和商机。在此背景下，那些具有广袤面积、巨大人口规模的非西方世界，如中国、印度、巴西等，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与创新，借助于规模经济，将最终在和平竞赛中赶上、超越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国土面积都相对狭小的传统西方强国，实现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性崛起。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初步展示了非西方世界在这一体系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前景。

后殖民体系时代也是国际制度史无前例地大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乎国际和平、国际金融与贸易稳定的国际制度先后创建起来。各国被编入一张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大网之中。这些制度的创立及演进，不仅颇为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平，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一些新的制度被创建起来，旧的制度也不断进行演进。如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东盟、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的成立，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制度的改革等。这些国际制度既为渴求发言权及国际威望的国家提供了表达自身诉求的场所，也为约束少数大国的单边行为提供了集体保障，同时还为解决国际冲突和矛盾提供了非暴力工具。<sup>②</sup>某种意义上，二战后的“长和平”得益于该体系密集的

<sup>①</sup> 《商务部反驳“中国外贸总额首超美国成世界第一”》，中国商务部网站，2013年2月17日，<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42271>。

<sup>②</sup> G. John Ikenberry,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U.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国际制度网络。它与主权规范的普及和贸易国的兴起一道，为二战后大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保障。尽管仍无法杜绝战争，但相对于殖民体系，该体系为大国的和平崛起及国际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 结 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两个阶段。前者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获得殖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后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既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它们对欧洲以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一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被剥夺主权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在这一体系下，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兴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它为贸易国的兴起以及具有广袤国土或众多人口或两者兼备的国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稠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约束大国的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也为大国国际威望等级的调整提供了制度化工具，从而更有利于大国在体系内的和平崛起。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在新世纪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收稿日期：2013-09-09]

[修回日期：2013-10-12]

[责任编辑：张 春]

---

China,”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009, pp. 97-108.

#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宋德星

**【内容提要】**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中国 崛起 大战略 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27-20

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国务活动家和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sup>①</sup>另一方面，对于国务活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对此，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撑其对外行为。<sup>②</sup>因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策的理论对应物。<sup>③</sup>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限于主题，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即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最后，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主题。

---

<sup>①</sup> 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宋德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

<sup>②</sup>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3, pp. 95-97.

<sup>③</sup> *Ibid.*, pp. V, VII.

##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sup>①</sup>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sup>②</sup>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单靠事实本身是不

---

<sup>①</sup> 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和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页。

<sup>②</sup> 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sup>①</sup>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的战略必需转化为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sup>②</sup>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sup>③</sup>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sup>④</sup>可见，

<sup>①</sup> 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75页。

<sup>②</sup>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sup>③</sup> 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此外还可参见时殷弘：《战略集中原则与其重大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sup>④</sup>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这方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 21 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中国还远未具备足够广泛的海外利益、足够强大的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和被承认的世界性特殊权利（虽然就这一权利来说，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使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处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符合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sup>①</sup>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全球公益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 21 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

---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73.

<sup>①</sup> 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4 页。

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sup>①</sup>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sup>②</sup>换言之，在大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sup>③</sup>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

## 二、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决策者群体

关于一国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

---

<sup>①</sup>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0年12月6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74662.htm>；另可参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01207/16282003\\_3.htm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01207/16282003_3.html)。

<sup>②</sup>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242.

<sup>③</sup>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sup>①</sup>

毫无疑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用以指导国家世纪性崛起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是且首先是国家决策者群体的战略思想及其集体智慧，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等。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下半期，在世界各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几经外交格局大调整的国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大国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与中国的内部变化有关。”结果是，“在从新生的革命国家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发展，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同现在世界的关系在不断改变。”<sup>②</sup>

显然，关于中国大战略理论思考的决策者群体，首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正是在这一格局下，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从而开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根本上摆脱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列强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屈辱命运，维护和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和作为东亚大国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会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甚至是武力较量，而这恰恰是对中国人民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的考验。

在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深深懂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实力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弱国无外交”。对此，周恩来总理有过这样一番论述：“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反对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sup>③</sup>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强加在中国人

---

<sup>①</sup> 同上，“序言”，第2页。

<sup>②</sup> 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50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变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sup>③</sup> 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民头上的战争，要有所准备。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制止战争，止戈为武，以战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他强调，只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做了充分准备，必要时敢于同它们在战场上较量，并赢得胜利，和平才可能被争取到手。<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思想，新中国才一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一面敢于以战争来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严重干涉和侵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和“一条线、一大片”等鲜明中国话语色彩的战略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并提出了“三个世界”格局理论，以塑造大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则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sup>②</sup>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sup>③</sup>不仅如此，这种革命还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次成功的革命性尝试。在世界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难怪有人惊呼，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sup>④</sup>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这场革命的世界性意义。<sup>⑤</sup>与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生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真正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sup>⑥</sup>的大战略思想主张。

---

<sup>①</sup> 张浞生主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sup>③</sup> 同上，第81页。

<sup>④</sup> 张晓明：《印度未来经济优势在哪里？》，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8期，第43—45页。

<sup>⑤</sup> 胡鞍钢：《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载《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7页。

<sup>⑥</sup>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

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概括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大阶段我国的国际战略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更有重大区别，其间实现了战略的大转变。”其中，“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为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sup>①</sup> 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业。<sup>②</sup> 正是这场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中的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sup>③</sup> 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活动家们需要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并特别强调后冷战时代有它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所以，在21世纪，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具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但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而催生中国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的一大缘由，无疑应主要归因于中国的世纪性崛起。早在20世纪末，《巨龙》一书的作者就指出：“在我们看来，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经济。在下个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将在任何意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上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日益崛起。”<sup>④</sup>

结果，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21世纪？对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是：

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sup>①</sup> 高放：《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

<sup>②</sup> 马丁·雅克：《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原载英国《卫报》2006年5月2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5月27日。

<sup>③</sup> 大战略研究者威廉森·默里在其著作《缔造战略》一书中，至少列举了影响战略缔造的六方面主要因素：地理，历史，政权的性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因素，政府和军事体制组合方式等。见唐那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第8—22页。

<sup>④</sup> 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孙英春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和谐世界”。2006年4月，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中国外交部领导详细阐述了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的内涵：“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sup>①</sup>

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详细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基本国际态度，即：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他特别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sup>②</sup>当然，要实现“和谐世界”这一伟大梦想，前提之一必须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sup>③</sup>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同时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中国是

---

<sup>①</sup> 《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张业遂详解“和谐世界”内涵》，中国网，2006年4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6/2006-04-02/8/711326.shtml>。

<sup>②</sup>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3年4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

<sup>③</sup>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3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7/c\\_1150554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7/c_115055434.htm)。

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富裕、社会公正、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基本目标。”<sup>①</sup>而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亦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其核心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很显然，中国战略思想上的优势足以让她自豪。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战略思考更显深入，注重通过优化外在环境，为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创造有利条件。”<sup>②</sup>而美国大战略理论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虽然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战略地位最差的，但在大战略的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sup>③</sup>其中，就冷战后中国的大战略而言，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言而喻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sup>④</sup>实际上，在探究中国 21 世纪前期对外战略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主要依据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论述来求得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位学者用这样肯定的口吻说：“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sup>⑤</sup>

### 三、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学者群体

对各国政治家来说，要处理国家面临的多种多样的当代挑战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决策者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

<sup>①</sup>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

<sup>②</sup> Gilbert Rozman,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2.

<sup>③</sup>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439 页。

<sup>④</sup> 例如，在外交部 1995 年 12 月 12 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钱其琛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另可参见 1999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

<sup>⑤</sup> 姜长斌：《试论中国的国际战略》，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 年第 3/4 期。

未来结构和走向，并以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但问题是，“第一，那些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抉择……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作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sup>①</sup> 对此，加迪斯指出，我们需要从目前心无旁骛的关注点折回去，从长远的历史趋势——把我们带至现有位置的历史趋势——出发，去认真思考。<sup>②</sup>

对于一国的大战略而言，“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而不是塑造事态。”<sup>③</sup> 正是因为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对于宏大眼界和把握长远趋势能力的特有要求，学者群体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不仅如此，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关系实践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天然联系，且重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揭示理论和实际事件（包括历史与当今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决定了学术研究 with 政策导向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和融洽的。可见，学者群体的理论贡献不仅有其内在必需，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群体的理论探究，著名学者王缉思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就是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sup>④</sup> 当然，对于学者们来说，“不管其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

---

<sup>①</sup> 默里等编：《缔造战略》，“导言”，第23页。

<sup>②</sup> John Lewis Gaddis, “A Strategic Checkli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resentation to the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October 19-21, 1998, Kongresshouse Zurich, Switzerland.

<sup>③</sup> David M. Abshir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licy: Toward an Agile Strategy,” in David L. Boren and Edward J.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p. 333-334.

<sup>④</sup> 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之现实主义的理解。”<sup>①</sup>

就当今中国的崛起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意义尽管毋庸置疑，但其局限也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学术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不同流派不能以“对”或“错”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们都只代表着关于世界政治的不同见解。在《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编者曾自问自答地说：“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中心议题。但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我们回答问题并寻找答案。”<sup>②</sup>

面对这种两难，作为学者群体又该如何去建构中国崛起所需的理论呢？

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 E.H.卡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曾指出：“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sup>③</sup>所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而且尤其有助于培养大战略意识。

那么，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有哪些呢？一位研究者做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变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

<sup>①</sup> Edward J. Perkins and David L. Boren, “Summary, Observation, and Conclusions,”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 400.

<sup>②</sup> Hans-Henrik and Georg Sørensen eds., *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

<sup>③</sup>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241 页。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素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sup>①</sup>

结果毫不奇怪，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学者群体理论建构的首要切入点，便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学理解读。换言之，在学者们眼中，多极化趋势的终极政治意义在于：21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能为中国提供一次真正崛起的机会。当然，在战略机遇期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困扰。鉴于此，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将不会很快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基本战略不能变，即邓小平同志讲的，除非打世界大战，否则我们横下心来发展自己的决定不能变；第三，要恰当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特别是要不当头，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的位置上；第四，要有所作为，以不失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本质；第五，在外交策略上，要坚持发展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各异。在已有的诸多成果中，既有大理论，又有中观和微观理论；既有纯理论范式的探究，又有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既有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和解读，又有挖掘中国特色理论的有力尝试。尽管学者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却有着基本的共识：

一是渴望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认知高度，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这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指出：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尽管“禅让”并不意味着没有非武力型的斗争和冲突；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

---

<sup>①</sup>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原有的国际体制。<sup>①</sup>显然，这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明示了探究中国 21 世纪外交战略选择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即作为非西方新兴强国的中国，如何处理好与现世界秩序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这类研究深深触动了中国学者此刻的关怀，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学术争鸣。

二是从制度和认知出发，考察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如何用好现有的国际规则。有研究认为，大体上可以把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二是体制性和机制性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三是与人文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国际规范，如人权。对于这些国际规则，中国对其了解和接受既是分层次、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迅速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的过程。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更多于赞成的立场。”<sup>②</sup>尽管有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但用好国际规则无疑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尺，因而学者们给与了持续的学术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

三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即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层次来探究用以指导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形态。在体系层次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推行“搭车”战略，该战略不是指依附于美国和西方，而是强调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sup>③</sup>在国家层次上，学者们一方面认识到发展和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着多项明显的“安全两难”局势，因而战略塑造能力至关重要，为此提

---

<sup>①</sup> 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sup>②</sup> 王逸舟：《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4期。相近的观点还可参见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sup>③</sup> 见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深化睦邻外交等思想；<sup>①</sup> 在决策者层次上，除了强调战略定力和战略创新的意义外，学者们尤为看重优化战略决策机制的重要性。

总之，有关 21 世纪前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问题，中国学术界呈现出热烈的学术争鸣氛围。在成果丰硕的著述中，不仅有对中国外交的政策性解读，更不乏严肃的历史概观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虽然相关学术探究无不遵从国家利益这一核心准绳，但由于视角和倾向各异，其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上，那些对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进行理智、严肃和审慎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探究的著述，都具有一种可贵的情怀，即深刻关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伟大前程，以中国的安全、进步和强盛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首要价值取向，因而格外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 四、对当今中国崛起之大战略理论建构的再思考

如前所述，就当今中国而言，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与之伴随的，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为此，在深入思考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问题时，尤其需要在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

就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研究而言，人们不仅关注那那些令人振奋和激动的重大国际事件及其引人入胜的细节，而且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和命题。其中，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历来为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其中，战争作为一种“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sup>②</sup> 结果使得经由两次世界大战后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能地将国际政治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即

---

<sup>①</sup> 事实上，美国已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形成一个有中国作为主角之一参加的东亚区域或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对东亚的稳定和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宁有同样的意义。参见 Robert A. Scalapino, "Asia-Pacific: Looking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 96; George C. McGhee, "Optimism and Advice about America and the World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ibid.*, pp. 350-351; Richard N.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sup>②</sup>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9 页。

通常所谓的“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前者关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国家的权势、生存与安全，关注于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其中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由此奠定了安全研究的一大传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安全问题。所以，整个冷战时期，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所谓的“高政治”。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还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囊括了除军事、政治和外交议题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海盗以及洗钱等等。显然，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研究并非仅仅肇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早在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观念及其相关研究就已经起步，尽管它还被笼罩在传统安全研究的巨大阴影之下。这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sup>①</sup> 主要由环保主义者大力推动的有关全球性议题的理论探讨，<sup>②</sup> 以及“贸易国家”理论对国家体系的二元划分。<sup>③</sup>

及至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安全在定义上出现了宽泛化的倾向，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宽泛化解释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而这恰恰反映出了冷战后安全研究的一大困境，即作为“焦虑时代的学问”，人们急需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指导解决紧迫的现实安全问题，那些事关国家、民族、国民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像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着的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就是：是

---

<sup>①</sup> R. O. Keohane and J.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sup>②</sup> Lester Brown,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Watch Institute Paper* # 14, Washington, D.C., October 1977;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 123-29; Jessica Tuchman Mat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9, pp.162-177; Michael Clare, *World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Norman Myers, *Ultimate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3.

<sup>③</sup> R.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 1986.

否需要以及如何把非传统安全关切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战略之中？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就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国际治理，使之既保障国家安全，又满足国际社会的安全诉求？

与安全认知紧密关联且意义同等重大的，还有国家利益问题。对此，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曾指出：“国家利益是一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的折中与妥协，它不是一种可以抽象地和科学地予以实现的观念。”<sup>①</sup>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指出：“由于具体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无法给予‘国家利益’一个合理的定义……利益是无法自发地彼此协调的，这些利益的相加也不能构成某种总体利益。”<sup>②</sup>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国家利益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涵盖的内容相当宽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将国家利益主要聚焦于安全、利益和威望三个根本方面。<sup>③</sup>

那么，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国家利益呢？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从眼前利益还是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sup>④</sup> 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利益无比重要，其合理性仍要从人类基本价值出发来加以判断。也即，人类基本价值是国家利益的源泉，是确定国家权力运行方向的指南，比国家利益和权力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基础一些。按照一项研究，这些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sup>⑤</sup>

正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非从属性与合理性双重要求，在具体的国家政策实践中，便有了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就当今中国而言，尤其需要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以便向国际社会明示中国政府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这类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政策取向。为此，中国政府于2011年公开宣布了国家核心利益的

<sup>①</sup> Hans Morgenthau, *The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68.

<sup>②</sup>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p. 91-92.

<sup>③</sup>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2页。

<sup>④</sup>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6页。

<sup>⑤</sup> 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4-8页。

六大领域：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sup>①</sup> 尽管上述阐述的原则性较强，但却符合国家利益界定的内在合理性要求，且有助于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战略解读和战略定性。

无论是就国家安全保障还是就国家利益维护而言，它们最终仍有赖于力量的运用。应当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连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力量运用的限度。尽管 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 4283 美元，排在世界第 95 位，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没有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朝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努力，决定了中国不会也无法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权势大争斗之中，这也决定了中国对力量运用的总体和平性质，即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关切与反应。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西方国家总是线性地妄测中国必然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并据此推断出中国是现世界领导者美国的最具实力和潜能的“挑战者”。换言之，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中国对力量手段运用的关切。<sup>②</sup> 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明确指出，尽管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中国不当“挑战者”。恰恰相反，“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sup>③</sup>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外政策第一”的理念，即不把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置于大战略思考的核心，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不争霸、不称霸。

正是由于力量运用背后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sup>④</sup>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

<sup>①</sup>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载《人民日报》2011 年 9 月 6 日。

<sup>②</sup> 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序言”，第 15 页。

<sup>③</sup>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sup>④</sup> 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一国的权力来自于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而它的威望则来自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实力以及该国运用其力量手段的能力和意愿的认

的中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以统一认识，从而确保力量手段与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为此，中国明确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力量运用原则。对此，西方国家却妄断道，“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国际战略欺骗”，意在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sup>①</sup>显然，这是无端猜疑。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sup>②</sup>

总之，在世纪性崛起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第一，对安全威胁做细致的界定，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的威胁还是地区性质的威胁，如此等等；同时要防止那种对安全威胁做宽泛化解释的倾向，因为这会给人以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如此，将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第二，对国家利益做细致的厘清，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对国家利益不仅需要做细致的厘清，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认同甚至一致，以便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家利益作工具性解释的、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第三，需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做细致的战略评估，其中特别是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只有基于这一标准，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收稿日期：2013-09-06]

[修回日期：2013-09-19]

[责任编辑：张 春]

---

识。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3.

<sup>①</sup> 熊光楷：《中文词汇“韬光养晦”翻译的外交战略意义》，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号。

<sup>②</sup>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

## ——美国的经验

赵可金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

**【关键词】**理论驱动 大国崛起 美国经验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47-18

在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思想崛起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维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学界更多强调美国崛起的力量因素，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上，放在对美国战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考察上，甚至有人将美国崛起看做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sup>①</sup>实际上，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忽视其“理论准备”是不应该的。在国内，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研究员在谈及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时，提及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强调了这一“软件准备”对美国崛起的意义。<sup>②</sup>

作为一国崛起的“必备软件”，理论准备对于一国崛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力量对比结构，挑战既有的利益格局，引发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激烈交锋。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崛起，除了获得必要的物质力量支持外，还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sup>③</sup> 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sup>④</sup>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sup>⑤</sup>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诉求和特殊目的，而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科学意义，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一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思想的崛起既能为国家的崛起提供合法性佐证，也能提供智力支持。本文考察

---

<sup>①</sup> 杨生茂：《“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载《南开大学学报》1965年第1期；梁茂信：《美国对夏威夷的吞并与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第13—20页。

<sup>②</sup>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

<sup>③</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sup>④</sup> Max Weber,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trans. a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Cited in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

<sup>⑤</sup>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理论准备经验，并对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提供启迪和借鉴。

## 一、理论问题：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事实上，人们关于理论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在大陆哲学影响下，欧洲学者在提及理论时，更多指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比如批评理论、后现代理论、现代性理论等。美国学者在提及理论时，更多是一种对现实做出规律性解释的产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谈及理论时，均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性功能。<sup>①</sup> 华尔兹甚至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称其为理论，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超越这些条件，就只能称其为解释学、哲学或历史等。<sup>②</sup> 在中国理论界，理论更多是指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是一种为社会实践提供行动指南的一系列指针。<sup>③</sup> 不管该理论是不是能解释现象，只要能够用来指导实践，就是伟大的理论。然而，在西方国家，作为一种规律和法则集中的知识，理论一般不用来指导实践，而是用来解释现象和回答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强调科学方法的洗礼后，理论在西方国家距离现实就更远了。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柯庆生就认为，国务院绝对不会以某一个理论为指导来制定政策。<sup>④</sup> 因此，在分析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崛起中的角色和影响时，必须准确把握美国人对理论的理解；对美国人而言，理论管不管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能不能解疑释惑，回答问题。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后发国家，美国不愿意卷入国际事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离职之前曾经留给美国人一篇“告别演说”，由于确信欧洲专制国家之间必然进行利益争夺，他警告美国不要介入欧洲大

---

<sup>①</sup> Stanley Hoffman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30;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1-17;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s Influence: A Formal Model," in Rosena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p. 380.

<sup>②</sup> Kenneth Waltz, "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Conducted by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1998, pp. 371-386.

<sup>③</sup> 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转引自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17页。

<sup>④</sup> 笔者在清华一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对柯庆生的访谈，2012年5月，北京。

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免引火烧身。<sup>①</sup> 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渗透的思想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华盛顿的继任者们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论欧洲大陆风云如何变幻，美国人一直避免介入欧洲事务，与法国等欧洲列强相安无事。此后一个世纪内，美国不仅恪守不卷入欧洲冲突，而且坚持不主动跟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强权硬碰硬的“门罗主义”；在西半球事务上，努力对欧洲列强采取和解方法，解决彼此可能的冲突。比如在1868—1878年的古巴危机中，当古巴叛军求助时，美国政府拒绝行动，理由是害怕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当时西班牙的军事力量被公认超过美国。即便与“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发生冲突，美国也坚持不触及底线的原则，在阿拉斯加等问题上倾向于采取试探性立场与和解策略。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战后重建进展迅速，经济快速增长。在经过了“镀金时代”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美国的国内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国力日益强大，在外交上开始突破孤立主义。美国突破孤立主义的历程，从根本上来说与世界大战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战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满腔热情地来到欧洲，向欧洲各国开始推销他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力图在国际上推行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他政策的赌注”。<sup>②</sup> 威尔逊主义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此种秩序方案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开、航海自由、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原则都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外交、殖民统治、海上霸权、肢解德国等特权政治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受打击，但依然是海陆强国，虽然它们表面上同意威尔逊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早已与美国同床异梦。最终，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制度的大角逐，动员了几乎全世界的资源，爆发了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国际联盟治理下的民族自决秩序的破产，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国秩序和霸权政治的持续。

<sup>①</sup>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sup>②</sup> 约翰·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戴瑞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4页。

二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承袭了威尔逊新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思想并汲取了国联的教训，认识到没有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的集体安全是靠不住的，必须努力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大国协调一致。为此，在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在主张集体安全思想的同时，更加强调大国在其中的责任、权力和协调一致。<sup>①</sup> 在美国的积极努力下，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大国否决权这样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的五警察共管世界的秩序，其中美国应该是警长，承担确保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务。在世界经济秩序上，美国和英国主导下建立了有人称之为“嵌入其中的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sup>②</sup> 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以固定价格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从而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 GATT 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和以 IMF 与世界银行为调控的世界金融秩序。总而言之，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大国政治秩序，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门罗主义”，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国际主义取代了孤立主义，与苏联展开冷战并谋求霸权成为美国对外事务的一个重要主题。<sup>③</sup> 在冷战期间，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直面美国外交中面临的遏制、结盟、军控、危机、制裁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很多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方案，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sup>④</sup> 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哪一个地区甚至某一个国家发生了动荡，美国必定出面干预，美国成了冷战后“爱管闲事”的国家。围绕美国冷战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美国理论界直面矛盾，大胆提出相应的理论主张，出现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高潮”。<sup>⑤</sup> 很

<sup>①</sup> 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9 页。

<sup>②</sup>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95, pp. 379-415.

<sup>③</sup>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sup>④</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pp. 35-49.

<sup>⑤</sup> 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载《复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多中国学者非常奇怪为什么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不断抛出一个个理论，自冷战以后就出现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地缘经济论、软实力论、两枝世界论、新帝国论、巧实力论等等，令人目不暇接。<sup>①</sup>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都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这样的悲惨事件会在美国上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家形象、政治修辞、话语权、公共外交、国际政治心理学等问题，推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语言学转向”。<sup>②</sup>

然而，尽管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花样翻新，但很少是出于指导美国外交实践的目的，而是仅仅出于解释冷战后世界政治本质的学术目的。对这些理论而言，其核心都是围绕某一个核心问题，并努力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无论理论出自何种学派，都围绕着国际社会面临的核心理论而展开。比如秦亚青认为，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sup>③</sup> 的确，任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都无法回避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定位问题，美国也不例外。对美国来说，如何从理论上回答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定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定位问题，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层出不穷，关键是牢牢把握美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美国对该问题的回答不同，相应的理论成果也就存在很大差别。回首美国总统主导外交事务 200 年的历程，从孤立主义到理想主义，从国际霸权主义到单边主义乃至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美国实力的增长及其所引起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只要美国的国家实力依然保持世界首位，并且世界范围内仍然缺乏一个与美国实力相近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实施以霸权主义乃至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总统主义外交都是不可避免的。

---

<sup>①</sup> 参阅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②</sup> 刘永涛：《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7 期。

<sup>③</sup>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二、理论使命：新帝国及其目标

在美国大学中，国际关系是组成政治科学学科的主要四个领域之一，其他三个领域是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和政治理论。与早先欧洲大陆强调传统政治学（politics）不同，呼应托克维尔“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sup>①</sup>美国政治学界在19世纪末期开创了现代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它起源于1880年柏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学院，以经验、实证、统计和行为分析为主要特征；到20世纪30年代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维耳的现实主义政治学逐渐成熟，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政治科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sup>②</sup>特别是在经过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洗礼后，美国政治科学强调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阐释严谨性，主张像精密科学那样具体地、科学地研究现实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政治科学应当确立关于驱动政治行动的因果关系的明确假设并以经验的可观察现象来验证它们，<sup>③</sup>最好此种验证运用数字技术使得验证更加复杂，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更加普遍化的理论以解释更多的政治生活问题。<sup>④</sup>行为主义革命植根于法国人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力图对美国政治进行“非政治化”的“纯科学研究”。美国政治科学的此种注重现实，强调科学，甚至重视定量、统计、模型的严格方法，使得它高度独立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面对学术界自成体系的诸多理论和方法，智库和政府在设计、规划时，只能从多种政策中选择，而不能另起炉灶。

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科学方法外，美国在政治哲学基础上也高度一致。早期殖民定居者就确立了“法治而非人治”的原则，意味着即便是英国国王，也无权蔑视法律，或拒绝接受法律实践。<sup>⑤</sup>独立战争后，美国制宪先贤们对人性报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目光，认为“野心只能用野心来对抗”，把共和政

<sup>①</sup>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sup>②</sup>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③</sup> 参阅罗伯特·达尔：《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论》，载詹姆斯·吉尔德和文森特·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5—146页。

<sup>④</sup> Crick Bernard,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sup>⑤</sup> J.艾捷尔：《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郭国良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体作为美国政体的唯一选择，“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sup>①</sup>同时，美国对世界政治具有独特的哲学理念，在美国人眼里，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没有区别，美国人坚定地认为美国的政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托马斯·杰弗逊对美国政治形式十分自信，“在我们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宪法像我们这部一样计算精确，既适应于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又适应于自治政府”。<sup>②</sup>言下之意，美国政治的原则非但可以在国内实现，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发扬光大。在美国还没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时候，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孤立主义立场。随着美国逐步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想就自然而然地被转化为国际政治的改革方案，甚至不惜采取粗暴的单边主义和霸道逻辑。资中筠先生在观察 20 世纪美国时就发现美国的对外战略是一个奇怪的结合：“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sup>③</sup>

自华盛顿以后，无论哪一个总统，其对外战略目标合法性的基础往往源自国内所谓的美国理想和美国精神，源自《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所确定的核心价值原则。美国所有伟大的总统都努力从这两份文件中寻找灵感和力量，比如林肯曾言他所说的每一条政治信念都起源于美国核心价值观，许多总统都把神圣的《宪法》放在嘴边，不停地引用其中的语句和原则，足见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信念”对总统政治的意义。亨廷顿还直接把美国理想视作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sup>④</sup>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写着：将你的疲惫、贫困交付与我，享受自由的呼吸。<sup>⑤</sup>自立国之日起，美国人民便深信必定可以以自己为范例，将自由与社会正义散布给全人类，并且带领着大家，远离邪恶的道路，迈向地球上的新耶路撒冷。因此，长期以来，美国人始终

---

<sup>①</sup>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92—193 页。

<sup>②</sup> 转引自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3 页。

<sup>③</sup> 资中筠：《20 世纪美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79—291 页。

<sup>④</sup> 萨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sup>⑤</sup> 转引自约翰·斯拜尼尔：《当代美国外交史》，方海莺译，台北桂冠政治学丛书 1986 年版。

生活在一种“美国梦”的矛盾情结之中：一方面他们崇拜追求自由，放荡不羁和独来独往的牛仔形象；另一方面认为个人之间应该相互平等，奉行民主的原则。在美国立国初期，在北美广袤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条件下，自由和平等的矛盾还不甚突出；但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在国内表现为民主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经久不息的折冲和制衡，在国外表现为对己和对人的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美国代表着“白天的光亮”，美国一直自诩为是“世界文明的灯塔”和“人类发展的希望”。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美、亚洲则为“黑暗”所笼罩，是一些“道德的荒原”，美国担负着一种把光明和“基督的福音”带给这些民族的使命。

在对外事务中，美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内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关于安全和福利的争论长期存在。在历史上，在二战之前，自由主义的福利优先一直占据上风，最初是要求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奉行孤立主义的道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后，美国处理国内政治的理念和方法就立即转化为处理国际正式事务的原则和方法，现实主义的安全优先开始占据上风，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逐步确立了超级霸主的优势地位，并将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转化为国际范围的“嵌入的自由主义”管制模式，<sup>①</sup> 推动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体系。在长达 40 余年的冷战岁月中，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行事，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提出了一种经典解释，国际政治就是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强权的争斗，国家必须追求利益，利益由权力规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必然表现为“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力”。<sup>②</sup>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批评传统理论的概念缺乏精确性，忽视了定量研究，他们提出了政治体系、一体化、博弈论、层次分析等概念、理论和方法。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将国际政治看做是国家和集团对外行为，精英和领导人往往扮演关键角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完成维持模

---

<sup>①</sup> 有关美国如何将其新政管制理念贯穿于战后世界秩序设计上的最精彩分析见 Anne-Marie Burley, "Regulating the Worl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 In John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5-156.

<sup>②</sup>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式、适应自然和人文环境、实现目标和一体化的任务，目标设置、认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发达的体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础，一旦权力失败，所有功能都可能遭受侵害，因此，国际关系就是寻求、确立和维持力量基础。<sup>①</sup> 多伊奇通过分析发现，决定美国对外行为的往往是少数精英及其强大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的支持决定的，“当代国家领导人的存在状况常常接近于悲剧的边缘。”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和瘟疫，而是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sup>②</sup> 莫顿·卡普兰不同于多伊奇从个体的角度对美国对外行为进行行为主义分析，而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国际政治系统，以此推演国家的对外行为逻辑。他认为，国际系统存在六个宏观模式，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全球体系、等级体系和单位否决体系，在不同的体系下，美国对外行为逻辑不同。<sup>③</sup> 另一位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辛格和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大师华尔兹提出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在国际、单位和个人的不同层次上，国家的行为规律不同。<sup>④</sup> 行为主义对国家行为的研究非常强调精确化和数量化，注重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厄姆·艾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决策模式、政治决策模式和官僚决策模式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sup>⑤</sup> 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提出了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制度问题，认为美国政府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以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sup>⑥</sup>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紧密结合在一起，解释冷战、服务冷战并从冷战中获得理论发展动力。

冷战的胜利为美国“天定命运论”提供了现实的支撑，再加上势不可挡

---

<sup>①</sup>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7页。

<sup>②</sup> 同上，第1—15页。

<sup>③</sup>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sup>④</sup>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sup>⑤</sup>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sup>⑥</sup>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实现了整合，新自由主义、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上开始走在了一起。约翰·埃肯伯瑞在《为什么输出民主》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合流，“美国对外促进民主，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体现了美国对如何创造一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用、渐进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具有对美国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特征之非常现实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并且是统一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向导。”<sup>①</sup> 保守主义虽然赞颂里根赢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战胜利，但口头上却不承认里根是伟大的威尔逊主义者，自由主义强调人权、多边机构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也没有拒绝国家追求权力的合理性和国际结构的地位。总体而言，美国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自由民主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关于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问题，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一股“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思潮。<sup>②</sup> 在战略目标上，谋求一个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是美国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然而，当前的世界并没有像美国想象得那么美好，随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地区冲突、反美主义等诸多挑战的次第出现，美国霸权陷入了困惑之中，<sup>③</sup> 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自身内部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多元社会文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关键，也是决定当今世界政治走向的关键，美国学界面临着新的理论困惑。

### 三、制度保障：谋断分离

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应景之作，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制

---

<sup>①</sup> G. John Ikenberry, “Why Export Democracy?: 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3, No.2, Spring 1999.

<sup>②</sup> 参阅哈特和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不过，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后现代国家》中提到的帝国理论与哈特和奈格里一书中所阐述的帝国是有区别的。See Robert Coo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 2000.

<sup>③</sup>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何向东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度考虑。适应外交事务复杂化、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政府推动了“多谋”与“善断”的相对分离和有机统一。<sup>①</sup>特别是在科学行为主义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流行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领导人逐渐形成了外交对知识的依赖。此种依赖在美国社会环境中与诸多因素的综合和相互作用产生了体制外的公共智库制度和体制内的政策顾问制度。

一是公共智库制度。

在进步主义浪潮推动下，同文官体制的建立一样，公共智库的产生最初也被看做是政府专业化运动的一部分，是政府为应对挑战而寻求的外脑支持。<sup>②</sup>从早期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第一批智库来看，大多从事长期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一批“没有学生的大学”，仍然从事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和对外问题不偏不倚的研究，只不过针对的对象不是学生而是政策制定者，整个政治参与过程都是非政治性的运作，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主要代表。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智库在美国政治中充其量起到“技术顾问”的辅助作用，对美国政治仍然是可有可无的组织，而且大多数智库是私人基金主导，美国政府也不大关注它们的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此后的长期冷战，使智库在美国政治中找到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大批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参与了由政府确定和组织的研究工作，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认识到了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统计专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知识和技能相结合所可能产生的巨大效益。<sup>③</sup>二战结束后，冷战爆发和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推动着美国政府通过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新型政策性智库异军突起，比如兰德公司、赫德森研究所和城市研究所等。许多新成立的智库都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以便向防务分析家与研究人员提供大规模的资助。成立于1948年5月、隶属于空军的兰德公

---

<sup>①</sup> 赵杰：《从谋断分离到多谋善断——论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建设》，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10日。

<sup>②</sup>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s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③</sup> 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和运作机制》，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7期，第18页。

司就是典型，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保护美国在核时代的安全利益。它所发起的关于系统分析、博弈理论以及战略谈判等前瞻性研究，持续地塑造了此后几十年的防务政策与威慑分析。<sup>①</sup> 在这一时期，智库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都意识到智库对于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帮助的重要意义，决策的复杂性和专业化使得美国政府也日益感受到对智库专家的依赖，美国智库已经在美国政治中获得了自己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当时的不足是智库没有获得广大公众的支持和重视，智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主导权仍然操控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手中。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政治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智库在美国政治中奠定了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智库将美国政治知识化和美国知识政治化纳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首先，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来看，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几乎所有社会力量都极力为自己的利益要求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佐证，推动了美国社会对智库的呼唤。同时，越南战争的失利和“水门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度下降，美国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大量问题有待于做出回答，民众对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作出独立客观的回答充满期待，美国国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等权力分散化改革，也刺激了美国政治对智库的大量需求。其次，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美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欧洲和日本等盟国的独立自主倾向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令美国战略界深感忧虑，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求理论阵地和平台占据战略制高点，一浪高过一浪的战略辩论为智库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外，美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所谓的“知识政治”或者“思想政治”，出现了保守主义潮流与自由主义的激烈论战，大量的保守主义智库产生，思想领域中的辩论和竞争如何使智库的声音脱颖而出，成为决定美国政治方向的关键。<sup>②</sup> 在上述历史因素推动下，大量将政策研究同咄咄逼人的推销技巧相结合的游说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智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1962年成立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

---

<sup>①</sup> 袁鹏、傅梦孜主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59页。

<sup>②</sup> David M. Ricc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tanks*,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2.

金会和1977年成立的凯托研究所,1982年成立的卡特中心等。尽管这些智库都标榜自己的跨党派地位,但究竟如何获得并保持独立性,以便能“对当权者直言相谏”,<sup>①</sup>却是一个令人起疑的问题。相反,人们日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智库把大众传媒作为主要平台,彼此争夺媒体的曝光率,影响公众舆论,提高政治影响力。<sup>②</sup>这些智库不仅抓住各种机会在大众传媒、国会听证会、学术研讨会等公开场合表达其声音,而且还创办自己的特殊媒体影响政府意见和舆论,比如咨询报告、政策快报、学术期刊、网站、电邮等,长文短论,不一而足。<sup>③</sup>智库和美国政府之间借助“政治旋转门”频繁的人事往来和信息传递,使得智库已经深深卷入美国政治过程,很难将两者分开。<sup>④</sup>不难看出,智库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看做是“影子政府”或者“编外政府”、“流亡政府”,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sup>⑤</sup>

## 二是情报制度。

智库对美国大国战略的贡献仅仅是提供意识形态的定向和战略政策的规划,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现实还是存在疑问的。情报体系就是总统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实践的重要工具,总统尽管可以在竞选期间毫无顾忌地发表个人看法,但当选总统后则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尊重总统职位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循序渐进地实施自己的政策主张,必要的时候还要对自己原先的立场和主张做出调整。

总统通过信息来做出决策和执掌美国的航舵,情报是美国总统做出决定的重要依据,是总统主义确定的重要原材料。从独立战争开始,华盛顿、富兰克林等美国政治领导人就把间谍、反情报和秘密行动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雇佣和收买了大量间谍、指挥了无数的秘密行动并且还从欧洲国家直接购买

---

<sup>①</sup> Aaron Wildavsky,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The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sup>②</sup> Andrew Rich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5, Issue 4, Fall 2000, p. 105.

<sup>③</sup> Donald E. Abelson, "From Policy Research to Political Advocacy: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25, Issue 1, Winter 1995, pp. 106-108.

<sup>④</sup> 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sup>⑤</sup> Michael G. Bark,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and Patronage: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Ph.D Dissertation, Kansas University, December 1996, p. 6.

情报以帮助殖民地赢得独立，出身行伍的华盛顿坦言：“获取好情报的重要性显然毋庸置疑”。<sup>①</sup> 在华盛顿执政期间，还组建了美国最早的情报网络。但是，像华盛顿这样具有将军背景和战争履历的总统毕竟是少数，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总统们普遍不大重视情报事务，对情报一无所知，甚至认为情报工作是邪恶的。威尔逊的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让我向公民们保证，直到我们卷入这场战争前，当我被告知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秘密情报机构的国家时，我不仅不知道，甚至于不能相信。”<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出于战争的考虑，先后建立了部际情报委员会、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等机构，加强了情报系统的建设，确立了美国中央情报体制的雏形，大大改变了美国总统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二战结束后，为了应对冷战的需要，杜鲁门总统推动国会于 1947 年 7 月 25 日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情报工作进入了总统决策过程，随着后来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办公室、陆海空情报委员会、国防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以及国家情报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美国现代情报体制得以巩固。<sup>③</sup> 尽管现代情报体制建立起来了，但不同总统经历、个性以及执政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并非所有的总统都重视并能够有效地运用情报系统，那些有着从军经历的将军（比如艾森豪威尔），或者对情报工作有体会的行家（比如乔治·布什）总统相对而言更有利于驾驭情报工作，在危险恶劣的国际环境下的总统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总统更重视情报工作。

美国情报体系的分散模式给总统主义设定过程增加了困难，不仅情报机构之间的自我经侦和资源浪费情况十分严重，就连情报机构的协调都由于部门利益而举步维艰，改革美国情报体系成为总统的一个愿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修正案，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高效、更灵活、更精干的情报界，建议加强情报界的集中和中央情报主任的权威。

“9·11”事件为美国情报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特别是“9·11”事

<sup>①</sup> [https://www.cia.gov/cia/kiakids/history/american\\_history.shtml](https://www.cia.gov/cia/kiakids/history/american_history.shtml).

<sup>②</sup> Christopher Andrew,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 1995, pp. 95-96.

<sup>③</sup> 刘宗和、高金虎著：《外国情报体制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批评美国情报体系的所谓“体制性缺陷”，建议建立国家情报局、国家反恐中心等机构，改革情报体系成为普遍的呼声。<sup>①</sup>小布什政府和国会报告的意见都十分欢迎，布什政府下决心改革美国情报体系。2004年12月7—8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2004年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对情报界进行了自194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设立了国家情报局长以统一指挥美国情报机构，隶属白宫并直接向总统报告，监督包括中情局在内的16个情报机构和全国所有情报中心，具有10万工作人员的人事权、400多亿美元预算权和一定管理权，内格罗蓬特成为首任国家情报局长，被称为美国的“情报沙皇”。<sup>②</sup>

美国情报体系改革后，尽管设立了国家情报局长，但内部的矛盾并没有消除，比如16个机构之间的明争暗斗、情报机构之间的自行其是以及基于情报来源不同而产生的自相矛盾等问题，还将持续考验着国家情报局长。尤其是如何协调文官情报体系和军方情报体系之间的矛盾，是摆在国家情报局长面前的最大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依赖于能否获得总统的支持并取决于国家情报局长与总统个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三是顾问制度。

无论是智库系统，还是情报系统，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而言，都是体制外的“公共机构”，这些行为体很少从政府角度思考问题。然而，对于美国外交的决策者来说，外交事务的专业化要求必须建立可信赖的、愿意隐姓埋名的、聪明绝顶的幕僚群体，为美国政府提供专业化的决策咨询服务。据小布莱德利·帕特森介绍，“在白宫中125个助理主导着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中心……他们也是总统行使行政领导的主要支持者部门。”<sup>③</sup>幕僚和总统之间相互信赖、密切配合：总统靠幕僚集思广益，勤于任事，幕僚藉总统发挥个人的抱负与理想，描绘一幅天下为公的美景。

---

<sup>①</sup>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2004.

<sup>②</sup> 叶婷、沈辉：《美国情报界的协调——问题与措施》，载《现代军事》2006年第7期，第67—68页；童锋：《内格罗蓬特这个人》，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6期，第17—19页。

<sup>③</sup> Bradley H. Patterson, Jr., *The White House Staff: Inside the West Wing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1.

相比其他总统助理，为谋划总统主义出谋划策的总统幕僚往往是一些在特定领域经验丰富、富有见地和创意的政策专家，特别是在政治上对总统绝对忠诚，是总统最为信赖的私密至交。比如兼具哈佛大学教授和白宫官员背景的亨利·基辛格和小约瑟夫·奈，兼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背景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都是总统愿意就国策咨询倾听的重点对象。尤其是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外交事务领域可谓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在他建议下，尼克松在外交战略上坚持国家实力至上，超越意识形态，注重国家利益，迷信秘密外交，忽略法定程序；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美苏战略核武器谈判、结束越南战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动作频频，甚至将国务卿、国防部长、国会领袖乃至新闻界都蒙在鼓中；经常突然向世界宣布秘密外交的惊人成果，把毫无心理准备的新闻界和政府领导惊得目瞪口呆。可见，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白宫幕僚班子的地位和权势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毋庸置疑，像基辛格这样的总统幕僚过多地代行总统职权在很多时候也具有严重的弊端。它使得国会的监督几乎没有意义，鼓励总统大权独揽的帝王式总统心态，如果疏于防范，甚至令国家最高权力旁落，很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最终必将殃及总统。

## 结论与启示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崛起，更是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崛起。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实践表明，理论和思想因素扮演了十分显赫的角色。在美国人看来，理论并非是一个指导实践的先验性理论，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经过科学方法和经验研究得出的解释性理论，美国人一切外交理论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理论和战略研究界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答案，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从孤立主义到国际主义，从理想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伴随了美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到地区大国，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过程。

在成长为世界大国后，美国理论界确立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帝国战

略目标，围绕如何缔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帝国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理论辩论和外交实验，为维系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不仅竭力在理论上进行研究，而且还确立了支持理论准备的一系列现代制度，比如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构成理论武装外交实践提供了可能。

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是，在推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理论准备是一个不缺缺少的构成要素。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壮大，中国需要确立牢固的理论自信，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确立明确的大国定位，并紧紧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策略运筹，加强底线思维，努力建设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体系。同时，将理论准备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将周密的理论与复杂的外交结合起来，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作出完善的理论准备。

[收稿日期：2013-04-12]

[修回日期：2013-09-10]

[责任编辑：陈鸿斌]

# 全球金融危机后 美国经济复苏特点及原因分析

王国兴 尹翔硕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并出现了新的特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复苏在持续,但始终不够强劲。宏观上增长率不高,就业率提高不快;行业复苏不平衡,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几乎所有行业都已复苏;微观上企业赢利状态很好,利润总额达到历史水平。美国经济之所以微观基础扎实而宏观表现不佳,其原因在于:供给方面,生产率提高不快,没有新的技术突破;需求方面,由于家庭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还不很乐观,消费和投资需求仍然不旺;政策方面,尽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对复苏起了很大作用,但其边际效用在递减;外部环境方面,受欧债危机等影响,外部条件总体上不是十分有利。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内仍将维持比较缓慢的复苏,达不到其潜在的增长率水平,除非出现较大的技术进步或很好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美国经济 复苏 特点 原因

**【作者简介】**王国兴,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中图分类号】**F1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65-18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美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在经历了 3 个季度的衰退后，于 2009 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自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持续但又有波动的复苏中。经过长达 4 年的经济恢复，美国经济并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进入新一轮扩张和繁荣。考察过去 4 年左右的复苏，可以发现美国经济的这次复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本文将对这些特点予以归纳，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

## 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特点

第一，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够有力。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 2008 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延续至 2009 年第一、二季度，使得这两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 0.3% 和 3.1%（图 1、2）。自 2009 年第三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从衰退中复苏，但总体而言复苏力度比较温和。2010—2012 年的 GDP 年度增长率在 2.0% 左右徘徊，也明显低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数次危机后 GDP 的年度增长率，图 2 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从季度情况看，本次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历了两轮循环：从 2008 年第四季度到 2011 年第一季度为第一轮，GDP 季度年化增长率从 2008 年第四季度负增长 8.9% 逐季加快至 2009 年第四季度正增长 4.0%，再逐季放慢至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0.1%；第二轮从 2011 年第一季度至 2012 年第四季度，GDP 季度年化增长率从增长 0.1% 逐季加快至 2011 年第四季度的 4.1%，再逐季放慢至 2012 年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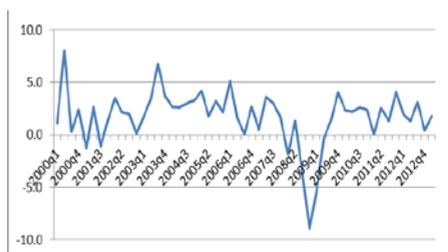


图 1：美国 GDP 季度年化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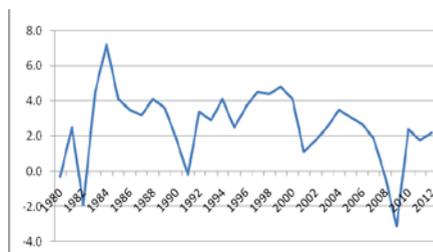


图 2：美国 GDP 年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gdpnewsrelease.htm>，以 2005 年为基数。

季度的 0.4%。目前正在进入第三轮，可能会延续至 2014 年底。由于第一轮循环前低后高，第二轮循环前后一样高，所以第三轮循环 GDP 季度年化增长率摆脱上述循环走势、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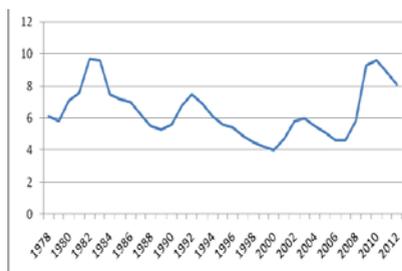


图 3: 美国年度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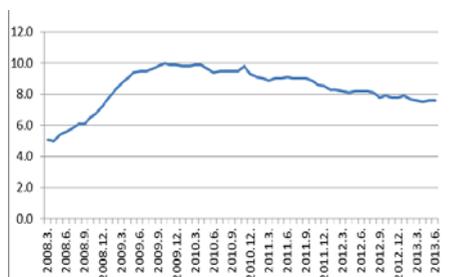


图 4: 美国月度失业率

资料来源: <http://www.bls.gov/web/empsit/cpseea01.htm>。

第二，失业率持续缓慢下降，但距美联储新设定的调控目标仍有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 2010 年的失业率高达 9.7%，创下自 1982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 3）。月度失业率则从 2008 年 1 月起 5.0% 上升至 2009 年 10 月的 10.0%（图 4）。此后，美国失业率持续缓慢下滑，2013 年 6 月已降至 7.6%。与失业率在 22 个月中上升 5 个百分点相比，失业率下降 2.5 个百分点用了 43 个月，失业率下降的速率几乎是上升速率的 1/4。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此速率，美国失业率至少要到 2014 年下半年才能降至美联储的调控目标 6.5%，要到 2016 年底才能降至 5.0%。与此相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 16 岁及以上非机构就业人口总量从 2008 年的 14536 万减少至 2010 年的 13906 万，即有 630 万人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失业。2011 年起美国就业人口开始增加，达 13987 万，接近 2009 年的水平，2012 年进一步升至 14247 万（图 5）。最新统计显示，2013 年 6 月已上升至 14406 万（图 6），即迄今此轮复苏已增加就业岗位 500 万个，但与 2008 年相比还差 130 万个。

第三，通胀趋势仍不明朗，通缩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物价（CPI）同比上涨率曾一路走低，2009 年 3—10 月甚至连续为负值，即持续 8 个月通货紧缩（图 7）。自 2009 年 11 月起，CPI 开始回升并于同年 9 月达到 3.9%，为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此后，CPI 基本呈下滑

态势，至今尚未完全摆脱下行压力，2013年6月仅为1.8%。总体而言，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对CPI的提振作用更大。相比之下，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势相对平稳，基本上围绕着1.75%的中位线上下波动，也没有出现核心CPI为负即通货紧缩的情况。2013年6月的核心CPI最新值为1.6%，低于美联储预订的核心通胀目标调控值。从目前趋势看，美国通胀进一步上行的风险小于下行的风险，未来一段时期即使通胀上行，其风险也不会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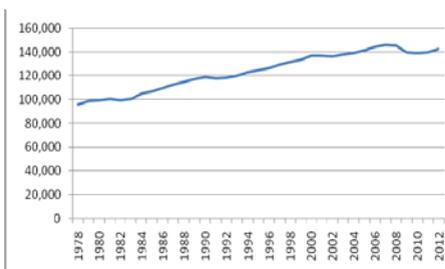


图 5：美国年度 16 岁及以上  
非机构就业人口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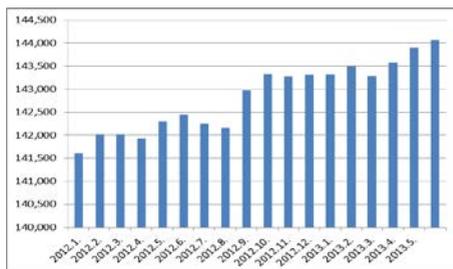


图 6：美国月度 16 岁及以上  
非机构就业人口总量

资料来源：<http://www.bls.gov/web/empsit/cpseea01.htm>。



图 7：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http://data.bls.gov/cgi-bin/surveym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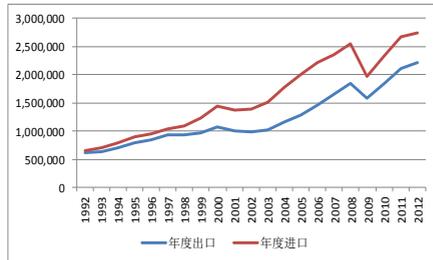


图 8：美国年度进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trade>。

第四，进出口连创新高，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但进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09年美国进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机分别暴跌达22.8%和14.2%，贸易逆差大幅改善（图8）。但自2010年起，美国进出口即转跌为增，且持续增长，其中

2010 年出口就超过了 2008 年的水平，2011 年起进出口更是连创历史新高，2012 年分别达 22106 亿美元和 27452 亿美元，合计近 5 万亿美元。不过 2010—2011 年的贸易逆差又有所扩大，但未超 2006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未达 2008 年的水平，而 2012 年又收窄了 4%。从图 9 所示月度情况看，进出口自 2008 年 8 月起同步下跌，分别至 2009 年 6 月和 5 月止跌回升。其中，月度出口在 2010 年 12 月超过 2008 年 7 月创下的 1656 亿美元危机前最高值，此后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目前稳定在 1800 多亿美元。与之相反，月度进口额仅 2012 年 5 月略高于 2008 年 7 月创下的 2319 亿美元危机前最高水平，其余月份均低于该值，贸易不平衡因此改善。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与 2009 年相比，2012 年出口增长了 40.1%，其中货物出口增长了 46.0%，服务出口 27.6%，贸易逆差对 GDP 的拖累逐步下降。但出口增速却连年连月持续下滑，2010—2012 年的出口年增速分别为 16.9%、14.5% 和 4.6%，而出口月同比两位数增速在维持了 22 个月 after，2011 年 11 月起降至个位数，2013 年 3 月甚至出现 40 个月来首次负增长。因此，实现 2015 年出口比 2009 年的 15782 亿美元翻一番目标已无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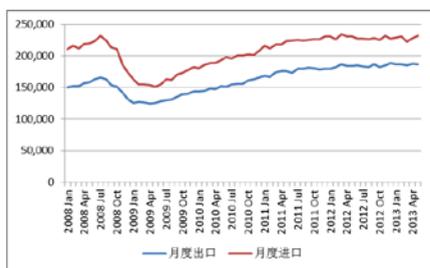


图 9：美国月度进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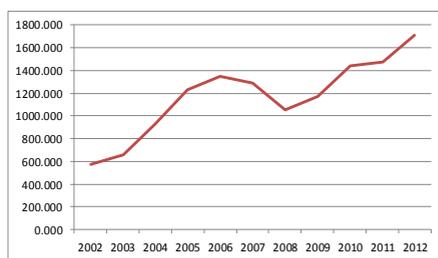


图 10：美国公司年度税后利润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

第五，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 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从上一年 13495 亿美元下降至 12929 亿美元，2008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进一步下降至 10509 亿美元(图 10)。但自 2009

年起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便率先复苏，且恢复了强劲增长之势，2010年即超过2006年创下的50多年来最高额14430亿美元，2011年和2012年又连续刷新历史纪录，分别达14751和17129亿美元；而2012年的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已接近2004年的两倍、2002年的三倍。<sup>①</sup>从季度数据看，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于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阶段性最高额13685亿美元后逐渐下滑，至2008年第四季度6437亿美元见底（图11）。此后，美国公司税后利润开始掉头向上，5个季度后即2010年第一季度便收复危机前的失地，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14341亿美元，后又连续刷新纪录，2012年第四季度创下1773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2013年第一季度略微回调至17495亿美元。可见，美国经济的微观基础相当坚实，如果美国公司税后利润继续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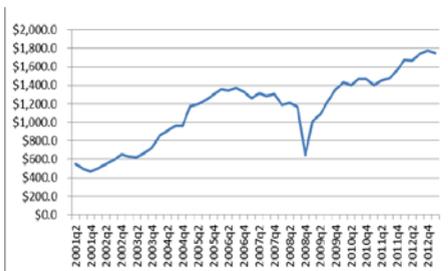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公司季度税后利润 (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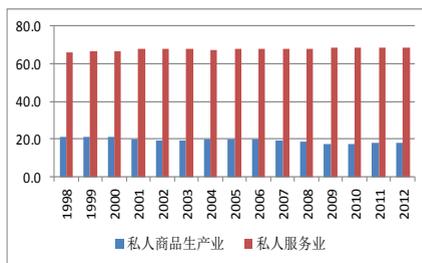


图 12 私人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

资料来源: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第六，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复苏，经济失衡状况依旧。私人服务业复苏较快，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11年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已超2008年水平，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再创新高。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例也比危机前有所上升，2008年为68.0%，2012年为68.7%（图12）。私人服务业中，除了“批发”和“除政府外其他服务业”外，其他八个子行业2012

<sup>①</sup>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rporate Profits, Net Effects of the Tax Acts of 2002, 2003, 2008, 2009, 2010, and 2012 on Selected Measures of Corporate Profits, 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last revised, June 26, 2013.

年增加值也已超过 2008 年的水平（图 13）。出人预料的是，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的增加值不仅继续在服务业中位居第一，而且该值仅 2008 年比 2007 年减少 200 亿美元，2009 年后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危机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股市连创历史纪录，道指、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分别站上 15400 点、1600 点和 3600 点关口。只要美联储继续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美股仍可能再创新高。“教育医疗与社会救助”增加值在私人服务业中位居第三，也未受到危机影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应该说，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对金融监管和医疗保险进行的历史性改革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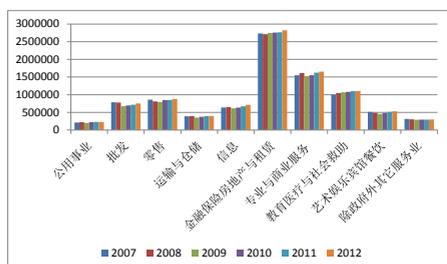


图 13: 美国私人服务业子行业增加值  
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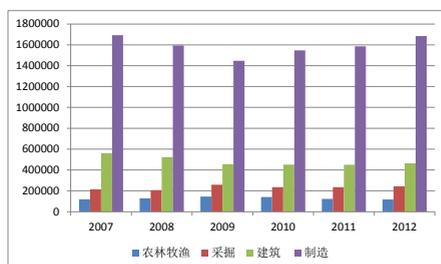


图 14: 美国私人制造业子行业  
增加值，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相比之下，私人制造业复苏较慢，其增加值在 2012 年才超过 2008 年的水平，但尚未恢复 2007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应地，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总额的比例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2 年该比例为 18.4%，而 2008 年为 19.0%。由图 12 可见，上世纪末以来，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迄今未扭转。由图 14 可见，建筑业是拖累私人制造业复苏的主要子行业。按 2005 年可比价格计算，其增加值在 2011 年触及近期最低值 4495 亿美元，2012 年反弹至 4637 亿美元，但距 2008 年的 5240 亿美元还差近 13.0%，低于 2000 年 6552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41.3%。另外，农林牧渔增加值也未恢复到 2008 年水平。不过，制造业已基本复苏，2012 年其增加值已超过 2008 年的水平，接近 2007 年创下的近期峰值，反映了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和出

口倍增计划取得的成果。采掘业几乎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2009年增加值就比2008年增加了25.2%，其中油气开采增加值就比2008年猛增了50.3%，显示了页岩油气革命的成效。但2010年起油气开采增加值下降，与此同时采掘支持增加值上升，前者反映了页岩气革命导致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后者体现了页岩油气开采热对相关设备需求的增加。

私人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制造、专业与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和零售。结合其在GDP中占比变化（图15）和上图12，可以认为，危机后不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上述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包括私人制造业和私人服务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印刷（含软件）、信息和数据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反映了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深化带来的成果。尽管“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在GDP中占比呈逐步上升之势，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冲击到这一趋势，但总体上这个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不如上述五大子行业。

第七，房地产市场呈现更多复苏迹象。2013年4月，美国成屋销售年化为497万套，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成屋销售中间价为19.28万美元，新屋开工年化数升至85.3万套，均为2009年以来最高；房屋营建许可年化数100.5万套，更为2008年以来最高；房价连续16个月上涨，创下自2006年以来的最长上涨周期，2013年3月标准普尔公司衡量美国20个大城市房价的凯斯—希勒（S&P/Case-Shiller）指数同比更上涨了10.9%，是自2006年4月以来最大年度增幅；<sup>①</sup>至2013年3月建筑业支出已连续13个月同比正增长。上述迹象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已触底回升，有助于支撑疲弱的经济增长并增加相关行业就业潜力。2011年房地产相关行业就业人数779万，比2006年的1019万峰值少了240万。<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市场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过程尚未结束，不仅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止赎房产，还有1110万户住房按揭贷款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其次，美国

<sup>①</sup> “Home Prices See Strong Gain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3: According to the S&P/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ices,” S&P Dow Jones Indices, New York, May 28, 2013, <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indices/articles/en/us/?articleType=PDF&assetID=1245352206402>.

<sup>②</sup>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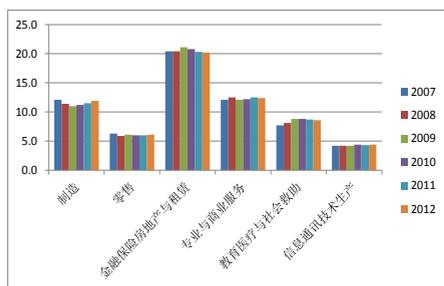


图 15: 美国主要子行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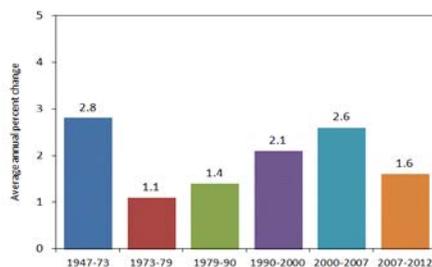


图 16: 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  
年均增速, 1947—2012 年

资料来源: <http://www.bls.gov/lpc/prodybar.htm>。

住宅建筑商人气指数 2012 年底升至 47<sup>①</sup>，为 2006 年 4 月以来最高值，但尚未突破荣枯线；第三，美国银行业 2013 年起面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势必收紧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标准，抵押贷款利率有上升的压力；第四，与以往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由家庭和个人刚性需求推动不同，本次复苏投资需求推动成分居多，投资者或投机者获利离场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复苏出现波动。

## 二、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分析

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复苏过于温和，失业率下降缓慢，通货紧缩的风险挥之不去，经济失衡状况并未改善，但出口表现良好，尤其是货物出口增长强劲，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从微观上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税后利润创历史新高，微观经济基础非常扎实；从行业上看，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总体上看，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在复苏。微观经济基础如此扎实，宏观经济复苏却步履蹒跚，其原因主要可从供给、需求、外部因素及政策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供给因素。首先应考察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

<sup>①</sup>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4 月 NAHB 指数分别为 41、45、47、47、46、44 和 42，<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MktNews/idCNL3S0EM17520130610>。

率增速近年来显著放缓（图 17）。<sup>①</sup> 由图 16 可见，次贷危机以来 6 年里，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速仅为 1.6%，远低于战后年均 2.25% 的水平，是战后第三低增长期。这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劳动生产率通常呈现出顺周期性，即劳动生产率增速随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随经济复苏而上升。另一方面，非商业周期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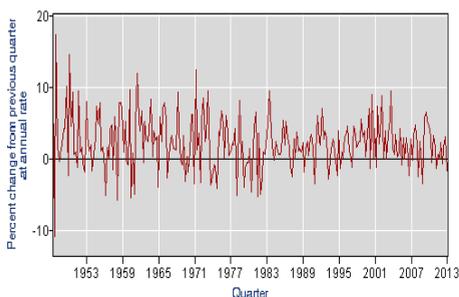


图 1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  
季增速，1947-2013 年

资料来源：<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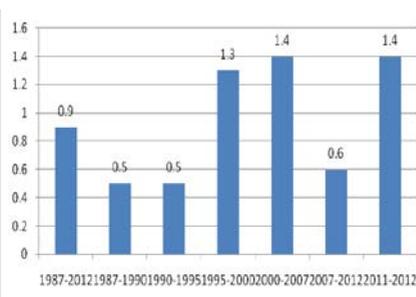


图 18：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  
年增速 1987-2012 年

资料来源：News Rel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June 28, 2013。

其次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 2005 年起即显著放缓。<sup>②</sup> 图 18 显示，2007—2012 年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 0.6%，比 2000—2007 年下降了近 60%。<sup>③</sup> 原因一是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红利至 2004 年前后已基本耗尽，<sup>④</sup> 二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进步步伐放缓，促使高科技企业放慢了资本深化进程。好消息是，2012 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比上年

<sup>①</sup> Economic Research Note, “US: Looking Back on an Unproductive Few Years,” *Global Data Watch, Economic Research*, J. P. Morgan, June 14, 2013.

<sup>②</sup> John Fernald, “A Quarterly, Utilization-Adjusted Seri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2012.

<sup>③</sup> 从美国劳工部网站只能查到多要素生产率，而根据一项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与多要素生产率相关系数高达 0.97。Ibid.

<sup>④</sup> Robert J. Gordon,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Working Paper*, No. 183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ugust 2012.

提高了 1.4%，是 2007 至 2012 年平均年增速的 2 倍多，可能预示着高科技企业资本支出增速加快，技术进步也可能因此加快。

第三是资源尤其是能源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传统能源行业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因天然气价格自 2008 年以来下跌超过 60%，企业经营成本下降，带动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在就业方面新增了逾 170 万个工作岗位，到 2020 年可望由此增加 300 万个就业岗位，并且这些岗位的薪水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四是石油进口减少，天然气出口正在推动中，对平衡贸易收支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需求因素。总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者又都可以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两方面去分析。

政府部门方面。从图 19 可以看到，2009 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增加了投资，表明奥巴马政府 2009 年 2 月启动的 7870 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 35% 用于减税，65% 用于政府投资）发挥了作用，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美国债务急剧膨胀，政府继续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力不从心，所以自 2010 年以来的 13 个季度中，有 11 个季度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负。同时，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缓慢下降。在过去 9 个季度中，该比例已从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20.6% 下降至 2013 年第一季度的 18.9%（图 19）。展望未来，由于每年 850 亿美元的自动减赤机制于 2013 年 3 月 1 日启动，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削减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私人部门方面。个人消费支出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除了 2009 年第一、二季度继续受到危机冲击外，此后 15 个季度个人消费一直是 GDP 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且贡献率相对起伏较小，GDP 占比始终在 70% 以上（图 20）。但 2012 年个人消费支出季度环比和同比增幅均有所放缓（图 21），原因在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美国商务部 2013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由图 22 可见，按 2005 年不变价格，2013 年一季度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为负增长，同比增速则大幅下滑。由于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下降，人们不得不动用储蓄，致使美国人的储蓄率

从 2012 年第四季度的 5.3% 迅速下降至 2013 年一季度的 2.3%，<sup>①</sup> 为 2007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点，回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就私人投资而言，除 2009 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机冲击大幅下降外，此后 15 个季度中，有 13 个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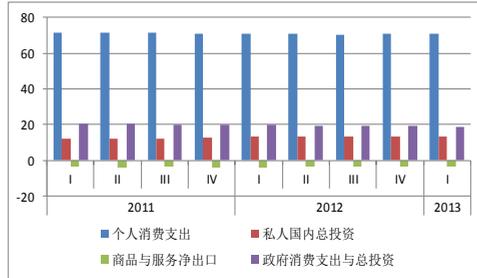


图 19: 2011-2013 年各因素占美国实际 GDP 之比

资料来源：“National, Corporate Profit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Table 1.1.10. Percentage Shar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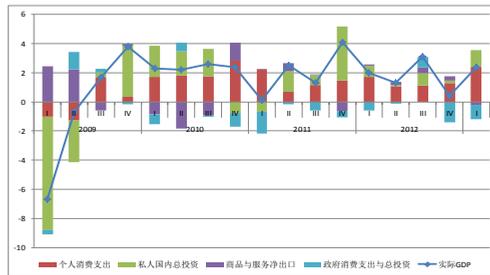


图 20: 2009—2013 年第一季度各因素对美国实际 GDP 增长变动的贡献率, %  
注：图中实际 GDP 增长率是按 2005 年美元价格计算的百分比变化，各季数据按年率调整。

资料来源：“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Table 1.1.2. Contributions to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Last Revised on April 26, 2013。

<sup>①</sup> “News Release: Personal Income and Outlay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June 2013,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pi/pinewsrelease.htm>.

表 1: 美国私人国内总投资总值变化, 2004—2011 年, 亿美元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
| 19686 | 21723 | 23271 | 22952 | 20876 | 15493 | 17373 | 18549 |

图 21: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情况  
十亿美元, %图 22 美个人可支配收入情况  
十亿美元, %

资料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私人国内总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与此同时,私人国内总投资占 GDP 的比例也缓慢上升,从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11.9% 上升至 2013 年第一季度 13.4% (图 19)。但是,私人国内投资总值处于极低水平,迄今尚未恢复到 2008 年及之前的水平(表 1)。由于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私人部门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

第三,外部因素。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了负面影响。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欧出口增速最慢。与 2009 年相比,2012 年美国对欧出口仅增长了 21.8%,与同期美出口总额增长 39.0% 相距甚远,也远低于同期美国对美洲、亚太、中东和非洲的出口增长水平(图 23)。表现之二是相互投资出现疲软迹象。2012 年美对欧直接投资流量甚至低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 2008 年(图 24),而欧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在金融危机后几乎连年持续下降(图 25)。不过,美欧相互直接投资的存量仍然十分可观,互为首位(图 26、图 27)。

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多年来,美洲始终是美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图 23)。2012 年美国对美洲地区的出口与 2009 年相比增长达 49.1%,进

一步与美对亚太和欧洲出口拉开了距离。美洲也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重镇，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美洲一直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图 24、图 26）。美国签订的 20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有 12 个伙伴国在美洲（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占 60%。在美国签订的 41 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有 9 个伙伴国在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格林纳达、洪都拉斯、牙买加、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占 22%。正是多年来苦心经营美洲经济一体化战略，造就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对美洲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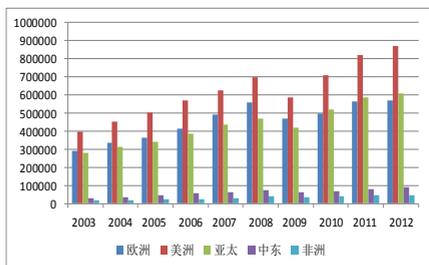


图 23: 美国对主要地区出口值  
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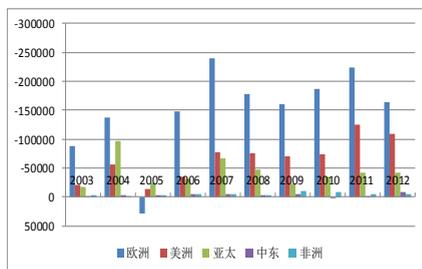


图 24: 美对主要地区直接投资流量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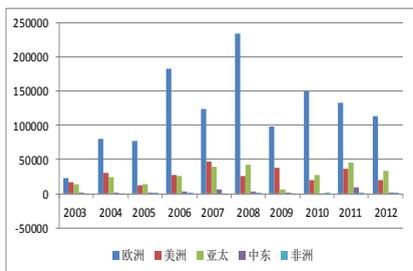


图 25 主要地区对美直接投资流量  
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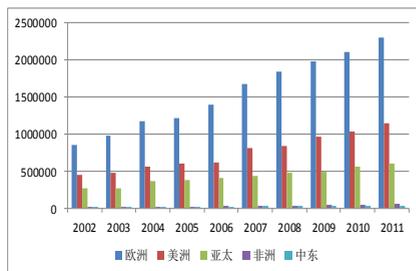


图 26 美对主要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亚太对美国对外经济的重要性正进一步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亚太依然保持着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且美国对亚太出口的增长率高于美国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同时，亚太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一直高于美洲，且亚太与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图 28）。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超过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美国在亚太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动员参与谈判的国家既包含了亚太国家，也包含了美洲国家，其目的之一就是把美国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向亚太地区延伸，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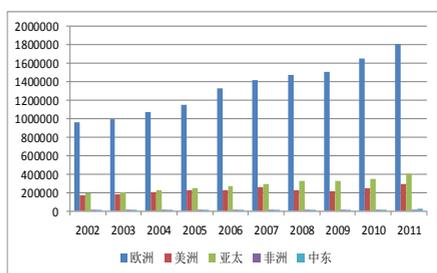


图 27 主要地区对美直接投资存量  
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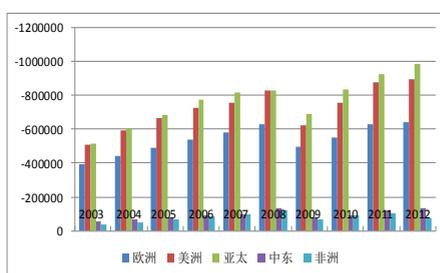


图 28 美国自主要地区进口值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第四，政策因素。从货币政策看，除了将利率维持在 0—0.25% 的超低水平外，美联储从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实行了首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作用明显。从 2008 年第四季度到 2009 年第四季度，GDP 从下跌 8.9% 转为增长 4.0%，实现了从止跌企稳到强劲复苏的急剧转变。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于 2010 年 11 月出台，至 2011 年 6 月结束，使美国经济避免了在 2011 年第一季度陷入衰退，GDP 增速勉强维持在 0.1%，并在当年第四季度提升至 4.1%，但刺激作用明显不如上一轮。美联储于 2012 年 9 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购买 400 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但效果不理想；美联储于当年 12 月决定每月再购买 450 亿美元长期国债，以替换原有的扭转操作（OT）措施，使量化宽松规模达到每月 850 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确立了失业率高于 6.5%、通胀率预期不超过 2.5% 情况下 0—0.25% 的超低

利率保持不变的新目标，使美国经济在 2012 年第四季度避免了衰退，GDP 增速勉强维持在 0.4%，2013 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推高至 1.8%。可见，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体上与复苏进程的三次波动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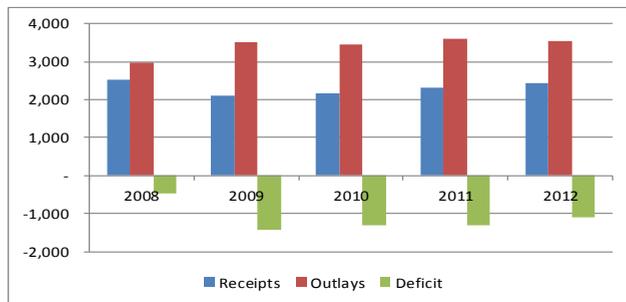


图 29 美国历年财政收入、支出和赤字，2009-2012 年，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从财政政策看。自 2008 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采取了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致使 2008 至 2012 各财年赤字分别高达 0.455、1.416、1.294、1.297 和 1.089 万亿美元（图 29），<sup>①</sup> 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 3.1%、10.0%、9.0%、8.7% 和 7.0%，其中 2009—2012 财年每年超过 1 万亿美元的赤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各种减税、政府投资、金融监管改革、医疗保险改革、救济等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的法案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法律基础。<sup>②</sup> 但从 2013 年起，美国财政政策逐渐转向中性，强调促进增长与减少赤字的平衡，税收增减和开支增减相结合，标志是财政悬崖法案，内容包括从 2013 年 1 月起调高年收入 40 万美元以上个人、45 万美元以上家

<sup>①</sup> “Joint Statement of Secretary Geithner and OMB Deputy Director for Management Jeffrey Zients on Budget Results for Fiscal Year 2012,”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ctober 10, 2012,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tg1734.aspx>.

<sup>②</sup> 包括 2009 年的复苏与再投资法案（7870 亿美元）、减税和延长救济法案（240 亿美元）；2010 年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十年内 9380 亿美元）、延长失业救助法案（339 亿美元）、金融监管改革法案（102 亿美元）、抵押贷款救助（6 亿美元）；2011 年的延长薪资税减税<sup>③</sup>和长期失业者救济金法案、雇佣退役军人税收优惠法案；2012 年的延长薪资税减税和长期失业者救济金法案，等等。

庭的个税税率、取消薪资税减税优惠、维持其他减税政策、延长一年长期失业救济金、2013年3月启动每年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等。可以预计，实施中性财政政策后，美国财政赤字将趋于下降，但公共债务总额仍将维持在高位。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累计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90%的警戒水平，<sup>①</sup>相隔半年后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进一步突破了100%，对美国经济增长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债务最新值为16.739万亿美元；<sup>②</sup>好消息是该值比上个月下降了0.54%，为2011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尽管如此，未来数年美国公共债务状况恐难显著改善，因为医疗、社保等福利开支是政府开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2011年其占GDP的比例已高达65%。由于福利开支在美国被定义为“强制性开支”，削减的难度很大。

从对外经济政策看，奥巴马政府围绕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提升美国竞争力，调整并实施了相关对外经济政策：一是在更高标准（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服务业市场准入等）基础上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括：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就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3个自贸协定部分内容重新谈判，然后予以批准生效；主导跨TPP谈判并推动更多国家加入谈判；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协定谈判；启动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等。二是大幅提升投资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为此修订出台了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并在美韩等双边自贸区协定重新谈判和TPP、TTIP等区域自贸区协定谈判中把投资列为重要内容。三是启动出口管制改革。2011年11月7日发布的《美国军品清单》第8类“军用飞行器及相关零部件”草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对敏感技术进行更恰当出口管制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 三、基本结论

第一，美国经济温和复苏趋势仍将继续。由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将

---

<sup>①</sup> Carmen M. Reinhart & Kenneth S.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882, March 2008.

<sup>②</sup> "Monthly Statement of the Public Debt and Downloadable Files, May 2013,"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y 2013, [http://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mspd/2013/2013\\_may.htm](http://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mspd/2013/2013_may.htm).

维持较长时间，私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将继续在美国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房地产市场复苏预示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可能逐步加快，因其不仅会助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还可带动建筑业。公司营运情况良好和税后利润增长之势可望延续。

第二，美国经济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条件尚不具备。首先是技术进步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放缓，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并呈长期化趋势；其次是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制造业复苏滞后，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一直存在；第三是尽管企业赢利情况很好，但未来预期并不乐观，投资意愿低下，制约了就业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加上政府消费支出与投资因自动减赤机制而削减以及薪资税优惠取消，威胁到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

第三，美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和对外贸易与投资。奥巴马政府正实施以生物科技带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加速生物科技取得突破，使美国国民更健康、生物能源产出更多、制造业转型加快和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仅使美国国民更健康一项，就有助于大幅降低政府福利开支，破解公共债务高企之难题。同时，奥巴马政府正通过推进 TPP、TTIP 和 PSA 谈判，并于 2012 年推出了双边投资协议新版本，试图用所谓高标准的贸易和规则来帮助美国公司开拓全球市场。

总的来说，美国经济实现了较缓慢但持续的复苏，这得益于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推动，也得益于美国微观企业的活力；但是由于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生产率提高不快，技术进步缓慢，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也不快，加上外部条件总体上并不看好，美国经济在近期难以有较快的增长。

[收稿日期：2013-07-20]

[修回日期：2013-09-20]

[责任编辑：杨立]

# 新时期中非金融合作<sup>\*</sup>

## ——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

张小峰

**【内容提要】**2010年国新办《中非经贸白皮书》指出，中非金融合作将成为中非合作的新领域、新亮点。本文从银行业、保险及资本市场合作入手，在厘清中非金融合作基本情况及特征基础上，分析影响中非金融合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而研判中非金融合作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中非金融合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合作潜力巨大；中非金融合作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点，尚不具备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条件。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非洲国家深刻反省自身发展路径且与中国合作愿望增强，金融合作空间广阔。未来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业务、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等方面将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中更是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重点展开。

**【关键词】**中非金融合作 现状 影响因素 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张小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1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83-19

---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当代非洲金融发展趋势对中非金融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3AGJ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危机时期中非金融合作发展趋势、路径及中国战略》(11YJAG017)、浙江师范大学重点课题《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合作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中非双方共同利益和诉求进一步增多，双方既面临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如何挖掘中非投融资领域合作潜能，把握彼此战略发展机遇，是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非洲大陆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把现有资源转化成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言而喻，金融市场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非金融合作的战略升级有助于双方互利共赢。更为重要的是，危机后美元面临长期贬值风险，为降低对外贸易投资风险，中国有必要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非洲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标选择之一。伴随着非洲国家金融业和对外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非金融合作必将日益深化。中非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中非双方主要以银行业间合作为主，今后双方将积极推进在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合作，继而实现宏观金融合作。

## 一、中非金融合作现状

### （一）银行业合作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及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利用多边开发银行机制，不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合作方式多以捐资、参股、低息贷款和举行商机研讨会等方式进行；中资银行在非不断推出金融产品和服务。

当前，中国已成为非洲发展银行集团（以下简称“非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开发银行成员（以下简称“东南非贸发行”）。中国于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基金和非行。<sup>①</sup>截至2007年底，中国在非行持股24230股，占非行总股份的1.117%；<sup>②</sup>2000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非贸发行，占该行总股份的6.28%，是非洲国家以外的最大股东，拥有独立董事席位。<sup>③</sup>2004

<sup>①</sup> 《2003年金融年鉴 国际金融与对外金融往来篇》，中国人民银行网，2004年7月6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yanjiuju/703/1480/14803/14803.html>。

<sup>②</sup> 《非洲开展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网，2007年12月31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750/1122/11224/11224\\_.html](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750/1122/11224/11224_.html)。

<sup>③</sup> 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2007年12月31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750/1122/11223/11223\\_.html](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750/1122/11223/11223_.html)。

年中国入股西非开发银行，以 80 亿西非法郎（约合 1700 万美元）认购西非行股本 160 万股，成为该行 B 类（区外）最大股东。<sup>①</sup>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及开发型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非合作。在承办对非洲国家优惠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一直担当“开路先锋”的角色。2010 年进出口银行在非洲承担了大量贷款项目，包括对加纳的 104 亿美元、对赞比亚电站项目超过 3 亿美元、对莫桑比克政府通信设施项目 2140 万美元贷款。<sup>②</sup> 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截至 2011 年 10 月，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承诺专项贷款项目 24 个，涉及贷款金额 6.3 亿美元，已签合同项目 15 个，贷款金额 4 亿美元，累计已发放贷款 6783 万美元。<sup>③</sup>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结合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实际需求，支持了埃塞俄比亚电信网、加纳燃气电厂、马拉维棉花种植、肯尼亚中低收入住房、埃及泰达工业园区等一大批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农业以及民生领域的项目建设。国家开发银行与东非开发银行、东南非贸发行签订框架合作协议，通过与东道国政府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沟通和谈判，建立了“乌干达财政合作模式”、“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间授信合作模式”、“埃及中小企业合作平台”等银企、银银合作模式。<sup>④</sup>

第三，其他中资商业银行业也积极参与中非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2009 年 5 月，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携手的首个大型融资项目——博茨瓦纳“莫鲁卜勒 B”（Morupule B）发电站扩建融资项目，为该项目提供总价值 8.25 亿美元，为期 20 年的贷款。<sup>⑤</sup> 2009 年 8 月，中国银行、南非联合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牵头，组织南非 CIC 能源集团公司（CIC Energy Corp）在博茨瓦纳开发的大型电站玛玛布拉（Megawatts）电站项目外币及南非本币的项目融资款，中国银行主要负责组织为该项目融

<sup>①</sup> 《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多边开发银行推动中非金融合作深入发展》，载《中国金融》2007 年第 2 期，第 67 页。

<sup>②</sup> 《逐鹿非洲金融：欧美领跑 VS 中国迅猛》，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10 年 11 月 19 日。

<sup>③</sup>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经贸成果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11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focac.org/chn/zt/somAfrica2011/t870189.html>。

<sup>④</sup> 《金融合作成为中非经济合作新热点》，新华网，2007 年 5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15/content\\_6104203.htm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15/content_6104203.html)。

<sup>⑤</sup> 詹向阳、邹新、马素红：《中国工商银行拓展非洲市场策略研究——兼谈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非金融合作》，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11 期，第 26 页。

资外币贷款部分。<sup>①</sup>

自加入非行集团以来，人民银行每年均派副行长级领导率团出席非行集团理事会年会，并积极推动非行来华举办研讨会。截至2007年底，非行共来华举办五届研讨会。2011年6月举办的第46届非行年会上，中国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协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等方面。<sup>②</sup>

中资银行积极拓展在非洲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不断推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其一，现金管理。2010年10月工商银行正式推出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研发的中非跨境现金管理平台以及非洲服务方案，这是国内首个服务于中国与非洲间跨境现金管理的金融产品，开启了现金管理中非跨境直连的新模式。<sup>③</sup>其二，跨境人民币结算。2010年1月中国银行在南非成功办理非洲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sup>④</sup>2010年10月，南非标准银行与工商银行合作，开始为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向16个非洲国家的进出口商推销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同时向这些国家政府推销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sup>⑤</sup>截至2011年上半年，经标准银行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已超过5亿元，业务涉及17个非洲国家。<sup>⑥</sup>其三，银联卡业务。2008年12月南非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简称FNB）与中国银联（China UnionPay）合作开通银联卡在南非的商户受理业务，这是南非银行界此类服务的首例。<sup>⑦</sup>2010年7月，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在卢萨卡正式发行非洲首张人民币预付卡。该项业务的开办，将有利于促进中非间商务往来。<sup>⑧</sup>其四，中间业务。2010年11月，中国

---

<sup>①</sup> 《中国银行牵头南非CIC集团50亿美元电站项目融资》，人民网经济频道，2009年8月18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9883449.html>。

<sup>②</sup> 《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葡萄牙首都召开》，财经网，2011年6月10日，<http://www.caijing.com.cn/2011-06-10/110742435.html>。

<sup>③</sup> 《中国工商银行中非跨境先进管理平台开通》，人民网，2010年10月14日，<http://hb.people.com.cn/GB/194086/194177/12952432.html>。

<sup>④</sup> 《中行成功办理非洲地区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金融网，2010年1月25日，<http://www.cnfinance.cn/articles/2010-01/25-5722.html>。

<sup>⑤</sup> 《博茨瓦纳的银行推出人民币结算业务》，新华网，2011年3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3/18/c\\_121203803.html](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3/18/c_121203803.html)。

<sup>⑥</sup> 《推动人民币进入非洲正当其时》，中国经营网，2011年9月5日，<http://opinion.cb.com.cn/12714523/20110905/268303.html>。

<sup>⑦</sup> 《南非第一国家银行（FNB）推出中国银联卡方案，方便中国游客南非之旅》，凤凰网，2009年11月17日，<http://finance.ifeng.com/usstock/realtime/20091117/1472669.shtml>。

<sup>⑧</sup> 《中国银行在赞比亚发行非洲首张人民币预付卡》，中金在线，2010年7月14日，

银行赞比亚分行与中国有色集团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向其下属五家企业提供授信额最高达 100 亿元人民币的全面金融服务。同时提供融资、债务动态管理、现金管理、财务顾问、保险、咨询与培训等一系列服务。<sup>①</sup> 2011 年 4 月，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与两家非洲保险经纪公司合作，为在赞中资企业提供全面金融保险服务。<sup>②</sup>

## （二）保险市场合作

中非银行业合作在朝多层次发展的同时，双方在保险市场的合作也逐步展开。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同时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

伴随中非经贸的发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将非洲市场作为其业务重点。数据显示，2011 年 1—11 月，中信保向 29 家在利比亚战乱中受损的企业支付了 4.9 亿元人民币赔款。<sup>③</sup> 2012 年前 11 个月，中信保在非洲承保金额分别为 146.2 亿美元。<sup>④</sup> 在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收汇风险保障功能的同时，该公司积极进行产品模式创新。随着中小企业日益成为中国投资非洲的主体，该公司推出专门为出口额在 200 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设计的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sup>⑤</sup> 与多家银行合作推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业务”，帮助出口企业在规避收汇风险的前提下获得银行的贸易融资；充分利用项目险，实施境外经贸区统保的全新模式。2011 年 4 月，埃及苏伊士经贸区 11 家企业委托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向中信保投保了海外投资险。这是中国首个集体获得海外投资

---

<http://yhcs.bank.cnfol.com/100714/138,1398,8021080,00.shtml>。

<sup>①</sup>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签署 中行力挺中国有色拓展非洲业务》，和讯网，2010 年 11 月 23 日，<http://bank.hexun.com/2010-11-23/125764817.html>。

<sup>②</sup> 《走进非洲：中国信保为中小企业出口服务——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许复兴》，载《中国外汇》2007 年第 7 期，第 67 页。

<sup>③</sup> 《中信保赔偿利比亚受损企业近 5 亿》，新浪网，2011 年 12 月 15 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111215/203011001502.shtml>。

<sup>④</sup> 《全球风险居高不下 中信保调降 17 个国家评级》，中国贸易金融网，2013 年 1 月 7 日，<http://www.sinotf.com/GB/Risk/1132/2013-01-07/3OMDAwMDEzNjQ3OA.html>。

<sup>⑤</sup> 《走进非洲：中国信保为中小企业出口服务——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许复兴》，载《中国外汇》2007 年第 7 期，第 67 页。

保险保障的境外经贸合作区。<sup>①</sup>

非洲保险机构也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南非安博保险集团于1996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保险机构;南非和德保险公司于2007年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2010年8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和南非最大的健康险公司发现(Discovery)签署合作协议,购买平安健康险20%的股份,共同开发中国健康险市场。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2011年4月,中国银行下属全资机构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中银保险)宣布与非洲尼克(NICO)保险公司和萨瓦纳(SAVANNA)保险经纪公司合作,向设在赞比亚等非洲国家中资企业提供金融保险服务。<sup>②</sup>

### (三) 资本市场合作

中非双方资本市场发展总体水平都不高,现阶段市场融资结构均以银行信贷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合作发展较为缓慢且实质性合作较少;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积极活跃。

目前,中国证监会与非洲国家签署了意在加强双方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的《谅解备忘录》,但实质性合作较少。2000年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与埃及资本市场委员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与非洲国家签署该项协议。此后,中国证监会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与南非和尼日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

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渐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地区证券总市值大幅增值,市场投资回报率高居发展中地区之冠,吸引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资本市场,购买当地高利率债券产品。<sup>③</sup>但中国基金尚未涉足,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的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

与中国相比,非洲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

<sup>①</sup> 《发挥信保专业优势 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中华英才网,2011年7月5日, [http://page.chinahr.com/2011/bj/sinosure\\_0705/about07.aspx](http://page.chinahr.com/2011/bj/sinosure_0705/about07.aspx)。

<sup>②</sup> 《中国银行扩大在非保险业务》,中国保险学会网,2011年4月24日, [http://121.52.210.148/D\\_newsDT/newsDT\\_read.php?id=59041](http://121.52.210.148/D_newsDT/newsDT_read.php?id=59041)。

<sup>③</sup> 《非洲市场是否值得中国资本冒险》,新浪网,2006年11月8日,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zx/20061108/00003058614.shtml>。

易所（JSE）允许境外公司在该交易所上市，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推出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sup>①</sup> 香港成为非洲公司上市的首选。南非煤矿开采商兰斯煤业（Lontoh Coal）和塞拉利昂钻石开采商克度控股（Koidu Holdings）已在香港上市，成为首批香港上市的非洲公司。2011年9月，尼日利亚宣布将人民币纳入该国央行外汇储备之中，主要渠道就是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购买银行间债券。可见，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积极活跃。随着中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以及中国颁布的《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将对非洲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和国内资本到非洲资本市场上市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金砖五国”（BRICS）的7家交易所<sup>②</sup>宣布合作计划并组建联盟，于2012年推出互挂投资产品。<sup>③</sup> 这一举措有望深化中国与南非间资本市场合作。

由此可见，现阶段中非金融合作具有明显的双边特性、非制度性、松散性、单一功能性，缺乏统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合作方式表现为简单的信息交流、沟通、磋商，以及为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建立支付清算体系和开放性金融机构等。总体而言，中非金融合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点，尚不具备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条件。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非洲国家深刻反省自身发展路径且与中国合作愿望增强，金融合作空间广阔。

## 二、中非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 （一）有利因素

第一，良好的政治基础。

---

<sup>①</sup> 《上交所否认近期推出国际板》，新浪网，2011年12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111201/025010912706.shtml>。

<sup>②</sup> 参与这项计划的交易所包括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俄罗斯MICEX（现正与RTS Exchange合并）、香港交易所（中国于联盟成立初期的代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以及孟买证券交易所。

<sup>③</sup> 《“金砖五国”七交易所明年推互挂产品》，和讯网，2011年10月14日，<http://news.hexun.com/2011-10-14/134201933.html>。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双方在政治上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新形势下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领域，西方国家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与对非援助直接挂钩，而中国一直恪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承诺。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按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及之后定期举行的论坛部长级会议，充分显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

第二，对非援助，为中非金融合作提供助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共同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在2000—2011年期间共为51个非洲国家的1673个项目提供援助，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报告表示，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非援助几乎遍布非洲大陆，且可能继续增长。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非洲共有54个国家，这意味着仅有3个非洲国家未接受中国援助。<sup>①</sup>近年来，中国在对非援助等“输血”方面加大了力度，为非洲援建了大批学校、医院、公路、铁路、桥梁、供水等民生工程 and 基础设施项目。中国还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与毛里塔尼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加蓬、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分别签署了《南南合作三方协议》，向上述国家派遣援外专家，加强非洲国家发展能力建设。2013年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同非洲国家团结互助，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对非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风险和困难带来的挑战。

第三，增长的贸易额和外来投资，客观上为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对非洲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利机会，夯实了中非金融合作基础，拓展了合作空间。

中非经贸合作潜力巨大，这为金融合作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新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发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当年中非贸易额仅

---

<sup>①</sup> 《中国援非750亿美元 美国对非援助总额约900亿美元》，中国资本证券网，2013年5月8日，<http://www.ccstock.cn/shishiywen/2013-05-08/A1171623.html>。

100 亿美元。2010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1269 亿美元，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2010 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额达 10 亿美元，非洲由此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sup>①</sup>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外来资本投资国。2009 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2 年，中非贸易额达 1984 亿美元。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双向投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方对非投资增长较快。至 2012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近 200 亿美元，仅 2012 年对非洲直接投资就达 29 亿美元。在为急缺资金技术的非洲解困方面，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②</sup>

值得一提的是，中非经贸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国加大对非投资的同时，非洲对华投资亦稳步增长。至 2011 年底，非洲国家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达 129 亿美元，涉及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交通通讯等领域。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丰富了非洲民众的生活，更使非洲国家贸易结构得以优化。<sup>③</sup>

第四，中非经贸合作的大力加强和中非同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强劲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但为深化中非金融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提升了中非金融合作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对非洲金融系统影响十分有限。正如非行行长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指出，由于非洲银行缺乏金融衍生品，而且与全球市场的融合有限，金融危机对非洲银行影响非常小。2012 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状况不佳，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近年来表现良好。过去 10 年，全球 10 个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非洲国家占据 6 席。<sup>④</sup> 近日联合国《201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WESP）预测，2013 年非洲经济将实现 4.8% 的增长，虽较 2012 年的 5.0% 增速略有下滑，但高于全球经济 2.4% 的增长。带动非洲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有：石油出口国经济发展强劲、

---

<sup>①</sup> 《2010 年中非贸易额达 1269 亿美元》，凤凰网，2011 年 5 月 13 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0513/4015815.shtml>。

<sup>②</sup> 《2012 年中非贸易额 1984 亿美元 加深合作大势所趋》，中新网，2013 年 3 月 26 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3-26/4676572.shtml>。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2013 年 非洲形势如何看》，新华网，2012 年 12 月 28 日，[http://intl.ce.cn/qjss/201212/28/t20121228\\_23985111.shtml](http://intl.ce.cn/qjss/201212/28/t20121228_23985111.shtml)。

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大以及同亚洲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等。<sup>①</sup> 南非标准银行预测，到2015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将翻一番，从目前的1.5万亿美元增至约3万亿美元。<sup>②</sup> 随着非洲呈现出更强的增长趋势，加之非洲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严重低估，非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正在上升。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指出，如果非洲经济主导产业稳步发展、外来投资持续增加，非洲经济危机后有望迎来长达20年的增长期。<sup>③</sup> 渣打银行预测，未来20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稍高于中国的增速。总体而言，非洲的经济增长预期依然看好。

第五，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深化双边金融机构合作。

近年来，非洲国家为吸引外资，制定了系列优惠政策。如取消准入限制、降低土地使用等。如加纳、博茨瓦纳、贝宁、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纷纷建立起投资促进机构，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2007年，非洲有10个国家实施了新政策法规，其中多数措施有利于外资和跨国公司。如佛得角简化了绿地投资的批准程序，所有部门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埃及简化在特区新建投资的手续；肯尼亚出台了推动风险资本发展的条例，降低了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银行业的要求；利比亚允许外国投资者汇回利润和向国外转让清算外汇结余，并为投资者提供长达5年的减税。

同时，中国政府也为到非洲投资的企业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打通“绿色通道”。为协助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目前中国已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自2005年起，逐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并承诺逐步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5%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促进非洲商品对华出口增长；与33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11个非洲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中非企业合作创造条件。人民银行牵头与外交部、商务部、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建立了对非工作协调机

---

<sup>①</sup> 《联合国报告预测：2013年非洲经济将实现4.8%的增长》，国泰君安证券网，2013年1月9日，<http://www.gtja.com/>。

<sup>②</sup> 竹子俊：《“雄狮”舞步：非洲经济稳步复苏》，载《中国对外贸易》2011年第4期，第63页。

<sup>③</sup> 《世行经济学家认为非洲经济将迎20年稳定增长期》，中国保险网，2010年12月23日，<http://www.china-insurance.com/news-center/newlist.asp?id=164231>。

制，引导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合作。<sup>①</sup> 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中国已经在非洲设立了 7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集群式引入中国企业投资；中国还专门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对到非洲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和项目予以参股支持。所有这些便利措施都必将深化中非间的金融合作。

## （二）影响中非金融合作的不利因素

第一，非洲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定成为金融合作所面临的重要障碍。

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推进金融合作的坚强后盾。在非洲大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无疑是最紧迫的问题。尽管在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非洲大陆政局趋于稳定，但是局部地区政局还是比较动荡。如突尼斯、埃及的政局变动、西非科特迪瓦大规模暴力事件以及北非利比亚的内战，都给中国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甚至因投资项目停工给我方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损失。此外，社会不安定也是中非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副主席阿德玛苏·塔得西（Admassu Tadesse）认为，投资项目所在地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都有可能引燃导火索，最终发展成阻碍投资的政治问题。<sup>②</sup> 一些国家由于失业人口上升，经常发生抢劫、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中国近年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社会治安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犯罪率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抢劫杀人等恶性治安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我国投资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二，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的影响。

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受外界冲击的非对称性。外界冲击分为对称性冲击和非对称性冲击。对称性冲击是指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相同或类似的影响；非对称性冲击是指对不同特征的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冲击是否对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按照一般的金融合作理论，经济发展

---

<sup>①</sup> 黄迪、李昌宇：《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动态分析》，《科技与经济》2007年第5期，第50—51页。

<sup>②</sup> 《逐鹿非洲金融：欧美领跑 VS 中国迅猛》，和讯网，2010年11月19日，[http://bank.hexun.com/2010-11-19/125707342\\_2.html](http://bank.hexun.com/2010-11-19/125707342_2.html)。

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更容易开展金融合作,甚至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在经济上,中国与有合作关系的非洲主要国家,如南非、尼日利亚、埃及、赞比亚等,在经济上显示出较大的层次性。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的经济总量占非洲经济总量的1/4,其2010年GDP总量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也是金砖国家中唯一经济总量未突破万亿美元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数据,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共有48个,其中33个在非洲大陆,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还在扩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看,据IMF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83美元,排世界第95位。在非洲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人均GDP低于中国。中非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极大影响双方深入开展金融合作。从经济结构看,非洲经济长期严重依赖生产和出口农、矿初级产品,多数国家工业水平相当落后,即使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传统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中仍占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一经济结构使非洲国家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自我保护能力,非洲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从GDP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仍然来自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9.8%,出口产品也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类产品转变。<sup>①</sup>目前中国正实行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总之,中国与非洲国家不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结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层次性,中非双方开展深层次的金融合作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中金融深度不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也是制约中非金融合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主导地位,是储蓄和投资的最基本渠道,其他诸如保险和养老基金处于欠发达状态。金融工具的欠多样化总体上削弱

---

<sup>①</sup>《中国经济结构还可进一步调整》,人民网,2011年11月2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6114770.html>。

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制约了长期融资的供给。非洲金融体系具有高垄断性特征，这使得银行享受高利率回报（平均利润率达 6%，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4% 的水平）。<sup>①</sup> 由此金融体系缺乏创新动力。非洲银行极不愿承担风险，它们更乐于持有现金，而非向私营部门贷款。非洲国家在国内债券市场和资本账户交易方面的监管一直以来都比较谨慎。在某种程度上，谨慎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有限融入全球一体化，使得非洲金融市场规避了金融危机首轮的影响。特别是在采用新巴塞尔协议后，非洲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尽管如此，一些非洲国家，如乌干达、赞比亚和肯尼亚仍高度开放了其资本账户。最近，由于高利率，致使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其国内债券市场。非洲金融体系深度的不足也严重制约了其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非洲大陆银行的平均储蓄率为 29%，远低于其他国家 65% 的水平。尽管在保险储蓄流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仅占 GDP 的 0.03%。另外，非洲国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落后也制约了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公共和私人债券资本化占 GDP 比重仅为 42%，远低于其他国家 76% 的平均水平。<sup>②</sup>

#### 第四，国际和非洲国内负面舆论的压力。

中非经贸关系的强劲发展，不但带动了双方经济发展，而且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也带来了冲击。欧美等非洲传统经贸合作伙伴对日益密切的中非关系感到了不安甚至恐惧。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延续以及非洲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导致一大批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某些政客对于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横加指责，大肆宣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漠视人权论”等论调，质疑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否完全出于商业因素，甚至认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不断扩张已经威胁了非洲社会的环境、经济和政治稳定。<sup>③</sup> 在非洲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看法和论调。某些非洲政客、学者和媒体或受西方媒体舆论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或是与西方有着政治利益关系，鼓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非洲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制约。

<sup>①</sup> Mobolaji Hakeem I., “Banking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SSA),”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5, 2010, p. 15.

<sup>②</sup> Karim Dahou, Haibado Ismeal Omar, Mike Pfister, “Deepening Financial Markets for Growth and Investment,” *OECD Africa Investment Initiative*, 2009, pp. 11-12.

<sup>③</sup> 冯兴艳：《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中非投资合作的战略选择》，载《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4期，第26页。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资源富集国投资,还通过官方援助方式加强与资源匮乏国家和穷小国家的合作,中国甚至是第一个向中非提供金融或货币援助的国家;中国在非洲外来资本中只占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西方资本,而在资源富集国,西方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是中国企业的数倍。<sup>①</sup>中国学者舒运国指出,中非经贸关系是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它完全不同于殖民主义控制下的经贸关系,因此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中非经贸关系更不带“新殖民主义”的色彩,它不以损人利己为目的,不以掠夺对方资源为手段,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sup>②</sup>

### 三、中非金融合作发展趋势

尽管中非金融合作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金融合作必将成为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的新领域。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指出,中国将扩大同非洲在投资和融资领域的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加强同非洲开发银行及次区域金融组织合作,探讨合作新机制,支持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和非洲国家能力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0多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美国高盛集团曾预测,到2025年,全球金融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将是非洲,其银行业收益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伴随着非洲国家金融业和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与非洲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深化。

第一,以多边开发金融为平台,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的“功能性”合作,形成“以点带面,以面带点,点面互动”的多层次合作格局,为非洲发展发挥协同作用。

中非间多边开发金融平台机制日臻完善。中国目前已与非洲开发银行和开发基金、东南非开发行及西非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并成为上述区域性

---

<sup>①</sup> 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 <http://www.focac.org/chn/zfgx/zfgxdfzc/t869930.html>。

<sup>②</sup> 舒运国:《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前景广阔》,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3页。

金融组织成员。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具体做法是：其一，在战略上“先取两头，后取中间”，即与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区域性金融机构深化合作，以此为“根据地”，借用其本土网络的辐射功能，推进与中东非、西非区域性和次区域性金融组织合作。其缘由在于上述两个地区经济、金融业发展较非洲其他地区发达，营商环境较好，有利于开展深层次金融合作；其二，推动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对非开展多层次金融合作。支持利用进出口融资、援外优惠贷款和对外投资贷款等金融服务，促进事关非洲长远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把开发性金融业务延伸到非洲，推动其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合作，在双赢和多赢的前提下建立融资新机制，开展出口信贷、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等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中具有衔接保险、贸易、融资等多方面的优势，提供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

## 第二，继续深化中非银行业合作。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非洲国家的金融体系中，银行都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业发展领先于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及开发性金融机构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机构互动较为频繁。因此，新时期以银行业为主体的、涵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层面的金融机构间合作将是中非深化金融合作最可行的路径之一。

当前，中非中央银行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目前，中国分别加入了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非双方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平台，积极探讨在多边金融合作框架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及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发展的措施，大力推进非洲大陆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在非洲区域、次区域及主要国家推进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未来，中非央行应以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金融合作论坛为主要平台，加速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就有关金融、外汇、税收和双边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展开交流和沟通，就双方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变化情况进行及时通报，增加双方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对两国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就已经开展的合作业务加强针

对企业的宣传和咨询。在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内，推进与非洲开发银行、西非银行等区域性金融组织及南非等非洲主要国家的货币合作。中非央行之间应建立常设机构和定期对话机制，就全球及双边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和金融信息、汇率政策等交换意见，保持及时沟通和协调。

中非商业银行之间往来互动也较为频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及中国交通银行等7家银行均已与非洲银行业开展合作。截至2011年末，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在非洲地区的贷款余额分别为394亿美元、94亿美元、42亿美元，进出口银行发放力度位居同业首位。当前，非洲国家正着手进行侧重于私有化和其他国有银行重组形式的金融改革，以提高银行管理运营、服务质量。这一方面使得其在非洲银行业中所占份额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非洲市场的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引进。未来，商业银行在积极进入对方市场时，应加大与对方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

第三，中非银行业合作在朝着多层次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双方在保险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合作也将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

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同时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资本市场上，中非双方合作发展较为缓慢，并且非洲国家显得更为活跃；而中国对于非洲资本市场涉足不深，主要是通过非洲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双方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以及购买非洲优质企业股权的方式进入非洲资本市场等。

第四，中资银行进入非洲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

其一，早期中资银行主要采用新建方式进行投资，首先设立代表处，然后增加分行，最后建立独资银行。2000年以来，并购战略最终成为中资银行进入非洲国家的新方式。2008年3月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则是典型案例。这起并购案不但是工商银行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并购，<sup>①</sup>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对非投资额最大的金融类投资项目。对南非而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国直接投资。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包括贸易融资、国际结算、投资基金、大宗商品、全球市场、投资银行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有理由相信，

---

<sup>①</sup> 詹向阳、邹新、马素红：《中国工商银行拓展非洲市场策略研究》，第26页。

未来的中资银行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方式进入非洲。

其二，寻找非洲本地金融合作伙伴也成为中资银行未来进入非洲的重要方式。

2009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南非第一兰特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为在非洲寻求投资机会或经营业务的中国建设银行中资客户提供咨询及融资服务。<sup>①</sup> 2010年11月，中国银行与葡萄牙投资银行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搭建金融服务平台，特别是为葡萄牙及非洲葡语国家的中资企业、华人华侨及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支持。<sup>②</sup> 2011年4月，中国银行和生态银行（Ecobank）开展战略合作，在后者内部设立“中国业务柜台”，通过直接派驻工作人员，利用当地代理行的全面银行牌照和广泛网络，满足中资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为中资企业提供方便、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sup>③</sup> 除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政策性银行也积极在非洲寻找当地运营伙伴。2007年5月，作为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与肯尼亚客户数量最多的银行股权银行（Equity Bank）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肯尼亚学习和借鉴小额信贷方面的经验。<sup>④</sup> 2007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尼日利亚的非洲联合银行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该笔交易被境外媒体视为“中国进军非洲金融服务领域新的转折点”<sup>⑤</sup>。2011年4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埃及商业国际银行、埃及商业国际投资控股公司共同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拟在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进行合作<sup>⑥</sup>。

第五，人民币在中非贸易结算中作用加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在非洲的崛起毋庸置疑。从

<sup>①</sup> 《中国建行与南非第一兰特银行联手拓展非洲业务》，中国经济网，2009年8月4日，[http://paper.ce.cn/jjrb/html/2009-08/04/content\\_75789.html](http://paper.ce.cn/jjrb/html/2009-08/04/content_75789.html)。

<sup>②</sup> 《中行与葡萄牙投资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中国银行网，2010年11月8日，[http://www.bankofchina.com/bocinfo/bi1/201011/t20101108\\_1192748.html?keywords=非洲](http://www.bankofchina.com/bocinfo/bi1/201011/t20101108_1192748.html?keywords=非洲)。

<sup>③</sup> 《中国银行在加纳推出“中国业务柜台”》，中国银行网，2011年4月12日，[http://www.boc.cn/bocinfo/bi1/201104/t20110412\\_1354122.html](http://www.boc.cn/bocinfo/bi1/201104/t20110412_1354122.html)。

<sup>④</sup> 《国家开发银行将于肯尼亚银行开展战略合作》，新华网，2007年5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04/content\\_605652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04/content_6056526.htm)。

<sup>⑤</sup> 《携手非洲联合银行 国开行商业化再下一单》，东方财富网，2007年11月3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071103,712243.html>。

<sup>⑥</sup> 《携手非洲联合银行 国开行商业化再下一单》，东方财富网，2007年11月3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071103,712243.html>。

经济学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将大幅降低非洲的融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非洲经济发展。人民币结算会给中非双方企业都带来明显的优势。对非洲进口商来说，进口价格将更加优惠；而对中国出口商来说，则既可避免应收款套期保值，也无需在价格中预留币值波动空间，还可以在国内更快享受到出口退税优惠。自2009年7月中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增长迅速，2011年的增长势头尤其迅猛。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源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如2011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港宣布允许香港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同时人民银行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正因为看好人民币结算业务在非洲的发展潜力，众多非洲银行和国际性银行大力推动这块业务的发展。作为非洲资产和收益规模最大的南非标准银行2010年底启动人民币结算业务，目前正在其运作的所有非洲国家大力推进。标准银行已在非洲的16个国家全面开展人民币账户和贸易结算等全套服务。标准银行报告称，2011年上半年，该行人民币贸易结算金额已达到5亿多元，业务增速如此之快始料未及。在非洲推广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渣打银行中国非洲业务最重要的策略之一，也是首家为中国试点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服务的国际银行之一。目前，在渣打银行分布的14个非洲国家中，除安哥拉以外，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13个国家都能使用人民币结算。2011年，尼日利亚将人民币列入可用于在国内外汇市场进行贸易结算的货币之列，并将人民币作为该国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随着中非贸易投资不断拓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将为非洲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广泛的业务平台。据南非标准银行201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人民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该行预计到2015年，非洲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占中非贸易的40%，以人民币结算的投资额将超过100亿美元。<sup>①</sup>

第六，未来中非证券市场层面合作将成为中非金融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政府层面的证券监管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2012年5月，中国证监会已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3个监管合作备忘录。<sup>②</sup> 在与非洲

<sup>①</sup> 《标准银行：2015年中非贸易四成将用人民币结算》，载《上海证券报》2011年9月2日。

<sup>②</sup> 《中国证监会当选IOSCO新理事会成员》，中国证券网，2012年5月19日，<http://www.cs>。

国家合作方面，2000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埃及资本市场委员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与非洲国家签署该项协议，意在加强双方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此后，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与南非和尼日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

第七，人民币债券合作是中非金融合作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于2005年2月颁布了《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为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供了政策框架。2007年12月，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出席财资市场峰会时表示中国将接受包括私人机构在内的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一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一些外资银行相继获准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除了开辟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外，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虽然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迄今为止非洲还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公司在中国境内或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此外，目前也没有出现在非洲证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的情况。

总之，未来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业务、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等方面将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中更是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重点展开。中非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中非双方主要以银行业间合作为主，今后双方将积极推进在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合作，继而实现宏观金融合作。

[收稿日期：2013-07-31]

[修回日期：2013-10-20]

[责任编辑：樊文光]

# 后金融危机时期 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sup>\*</sup>

卢 静

**【内容提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催生金砖合作机制。但随着危机延续，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世界经济正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尽管如此，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正进一步彰显金砖机制的影响力，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关于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决定，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本文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的合作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正确定位金砖机制；第二，建立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第三，完善“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包容性合作机制；第四，推动金砖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建设，实现金砖国家产业演进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也需要借助金砖平台，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探索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强化金砖国家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作用，同时金砖合作中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原则。

**【关键词】**金砖国家 后金融危机时期 务实合作

**【作者简介】**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102-15

---

<sup>\*</sup> 本文为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学术研究中心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的巨大冲击催生了金砖合作机制。尽管金融危机尚未真正结束，全球增长仍处于疲弱水平，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分化。可以认为，世界经济已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在此背景下，金砖合作机制将如何发展？金砖国家如何在后危机期间保持危机时期的良好势头，如何借助金砖合作平台解决自身发展困境？国际社会对此既有希冀也有质疑。有西方媒体称“金砖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桥梁”；<sup>①</sup>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也认为金砖“有着远大前程”；<sup>②</sup>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则称金砖为“没有泥浆的砖”；<sup>③</sup>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门主管新兴市场的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则称之为“破碎的金砖”；<sup>④</sup>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舞台上“既无足轻重，又畏首畏尾”；<sup>⑤</sup> 就连最早提出“金砖”概念的美国高盛公司现在也开始看淡金砖国家的前景，并建议投资者停止购买相关美股。<sup>⑥</sup> 由此可见，无论国际社会评价如何，金砖国家在后危机时期的合作都不仅对其本身而且对世界具重大战略意义。

2013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第五次领导人会晤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也体现了金砖五国寻求共识的积极作为，反映出国际格局调整变革时期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趋于活跃和成熟的现实。同时，峰会成果也集中表明，增强合作机制的务实性是金砖国家的历史使命，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合作是金砖机制的特质与创新所在。

---

<sup>①</sup> 《西媒：金砖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桥梁》，人民网，2013年3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324/c57507-20894978.html>。

<sup>②</sup> 《不是反对，而是绕过西方》，载俄罗斯《生意人报》，2013年3月19日，<http://www.komersant.ru/doc/2148773>。

<sup>③</sup> Joseph S. Nye, Jr., “Despite All the Confidence, the BRICS are Without Mortar,” *Daily Star*, April 10, 2013.

<sup>④</sup> Ruchir Sharma, “Broken BRIC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Issue 6, Nov/Dec 2012, pp. 2-7.

<sup>⑤</sup> Dani Rodrik, “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the BRICS,” *Social Europe*, April 11, 2013, <http://www.social-europe.eu/2013/04/what-the-world-needs-from-the-brics/>.

<sup>⑥</sup> 《高盛看淡中国等金砖国家前景 建议停买相关美股》，证券时报网，2013年7月3日，<http://overseas.stcn.com/2013/0703/10577306.shtml>。

## 一、金融危机催生金砖合作机制

12年前,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创“金砖”(BRIC)一词,以形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并表达其商业投资的价值。随后,“金砖”一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并被赋予了新兴经济体代表的头衔。同时,发展阶段的相同和发展议题的类似也使得金砖四国在许多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上看法十分接近,由此导致了金砖四国的对话合作不断加强。2006年9月,金砖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碰面。2008年7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日本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也举行会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尽管发展势头良好并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但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持续恶化、全球通胀压力增大、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而严重恶化了国际经济环境,使“金砖四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并呈现“危机过敏症”。<sup>①</sup>为应对危机,金砖国家加强了彼此间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蔓延,金砖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空前增长。2009年6月,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标志着金砖四国合作机制诞生。

叶卡捷琳堡会议后,金砖国家轮流举办正式峰会,不断完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2010年12月,南非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使得金砖四国演变为金砖五国。金砖国家的合作也形成了包括领导人定期正式会晤、部长级会谈、不定期非正式会谈、工商论坛和智库论坛等在内的一系列机制,合作领域从投资和贸易逐渐扩展到教育、会展、服务业、文化交流等方面,合作内容日趋多元化。同时,合作机制的建立也为金砖国家协调立场、发出新兴经济体更统一有力的声音从而捍卫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平台。

2013年3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决定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等,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该决定也顺应了国

---

<sup>①</sup> 林跃勤:《金融危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12期,第31页。

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趋势，并反映出金砖国家自身发展的战略诉求。

首先，传统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已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发展要求。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虽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有所改革，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是西方国家新现实主义理论支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即由西方大国主导、控制并体现其利益偏好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机制。这种传统国际机制随着美欧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它表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的公共产品，因为所有西方国家几乎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全球公共产品的短缺，使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的做法，不仅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备受国际货币波动和美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转嫁危机之苦，而且使全球进入国际货币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又迫切需要完整而稳定的国际货币，仅以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无法克服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困境，也不可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其次，全球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治理结构转型，需要和期待金砖国家实施金融合作。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传统国际金融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的提升，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也发生变化和转型。这些都促使金砖国家更广泛深入地参与这场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份量和话语权，使其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金融危机也昭示了建立在不公平主权货币基础上的世界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随着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的绝对优势，严重影响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和话语权成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共同要求。同时，金融危机也凸显了没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能发挥重要的国际金融工具的作用，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这就导致

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在部长级会议上批准新的配额和表决权分配系统，提出了把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实，美国国会尚未批准成为其最大阻力。由此导致目前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缺乏实质性影响。因此，不改变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格局，即使再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和表决权，也难改西方大国主导国际金融的实质。

最后，深化务实合作满足了金砖国家自身发展和战略合作的要求。“展望未来、共同繁荣”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本质内涵，发展、包容、稳定的金砖理念，集中反映了金砖国家具有强烈的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德班峰会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金砖国家”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金砖国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并使合作机制建设的步伐稳步推进，其原因就在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基础相近，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在许多领域中也具有共同利益，尤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愿望更加迫切。这就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和金砖银行设立的共同基础。正如有评论称，“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能有此出众表现，绝非仅凭内部经济发展因素使然，也非相关国家心血来潮的一厢情愿，更非来自于外部威胁的强大压力的结果。而是有着强大的价值驱动力，它是一些国家谋求走出危机之路的新探索，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拓展了国际秩序的新价值，代表着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重建的新模式。”<sup>①</sup>由此我们可以说，金融危机催生的金砖机制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经济格局和实力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新兴经济体公平、公正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促进全球化进程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正当诉求。

## 二、务实合作彰显金砖机制影响力

综上所述，金砖机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在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衰退中，金砖国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对平衡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

---

<sup>①</sup> 赵可金：《发展、包容、稳定是一种金砖精神》，载《环球时报》2011年4月20日。

献，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据《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 年，在全球经济总体低迷的情势下，金砖五国经济仍保持了整体较快的增长态势，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继续上升。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也是稳中有升。<sup>①</sup> 尽管如此，金砖国家的地位和未来发展却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质疑，“金砖失色”的舆论不时发酵，这也反映出西方一些人士对金砖机制的担忧和疑惑。

实际上，金砖机制的产生反映出的是金砖国家追求发展、维护发展权益的自觉行动，无意也不会争夺什么霸权。金砖国家意识到，在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下要实现自身发展，不加强彼此的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不实现金砖概念向利益认同体的转变，就既不可能实现发展和共赢，也不可能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因此，金砖国家致力于将合作机制提升为促进发展的机制，努力寻求合作的共同点。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和诉求，才产生了金砖机制的成果和生机。事实上，金砖五国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互补性，可充分发挥相互间的优势互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层面，金砖国家对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国际经济政治利益诉求基本一致。这些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坚实基础。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金砖国家在经贸领域更需要密切协调，加强合作，推动金砖机制务实化，提升制度化水平。这就是德班峰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本原因。德班峰会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既顺应了各国合作发展的愿望，也把金砖机制推向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决定一经宣布，便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和高度关注。德国《新奥斯纳布吕克报》发表评论说，西方的魅力的确消失了，金砖五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心脏”。<sup>②</sup>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世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计划联合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事务中挑战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机构。<sup>③</sup> 加拿大《国际工商时报》引用

---

<sup>①</sup> 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转型与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sup>②</sup> 《金砖组织“不再是纸老虎”，西方极力打入“楔子”》，载《环球时报》2013 年 3 月 28 日。

<sup>③</sup> 同上。

加前总理马丁的话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全世界的地区银行来说都是一个威胁。<sup>①</sup>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仅是金砖国家机制化成果的国际反响和展示，也标志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该行将在推动成员国基础建设、抵御经济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以及互助机制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打破国际金融旧格局，为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提升话语权。一直以来，不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亚洲、非洲、欧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和主导的。而由金砖五国发起并出资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自己“做主”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将打破国际金融旧格局，促进国际金融体系转型，而且将提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 and 话语权。

其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解决金砖国家的中短期融资问题，有利于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美欧相继爆发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重创各自国家的经济，并拖累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不得不紧缩现有的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导致世界银行最近几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为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发项目提供融资，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可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再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可以减少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依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相继推出本币贬值的“杀手锏”以促进本土经济发展，使得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饱受痛苦。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选择成员国中的货币作为主要媒介行使其职能，无疑是对现在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改变，亦将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在德班峰会期间，金砖国家互签多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采矿、教育、科技、运输、国防等不同领域。尤其中巴首签金砖国家间货币互换协议，凸显了彼此认同对方的

---

<sup>①</sup> 同上。

发展前景，深化了双边金融合作，降低了国际汇率波动给本国双边贸易带来的风险。标志着金砖国家将逐步摆脱以美元进行结算的金融体系，朝着改变传统贸易流通方式迈出了坚实步伐，将预示着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这种合作不仅将拉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也将对以金砖五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不可否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成为世界金融新格局重要的“一块砖”，必将打破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但需要强调的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绝不是传统国际金融体系的对立者，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个有益补充，这块“金砖”将让世界金融格局更加完整、更加稳固。世界银行 2013 年 3 月 26 日也表示，欢迎金砖五国宣布设立开发银行，世行将以可能的方式尽量帮助这个全球开发的新参与者。<sup>①</sup>

### 三、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选择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表现出难得的合作精神，联手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和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即危机走向缓和而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各主要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世界经济处于脆弱性复苏阶段中，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自 2012 年底随着各主要国家政府换届或领导人更迭，世界进入新的政治周期，大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已发生明显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恢复增长，不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加大市场保护措施。比如，美国在 2012 年 12 月宣布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欧洲央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也多次降息，2013 年 5 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继续将存款利率保持为零不变，并强调只要有需要，

---

<sup>①</sup> 《世界银行称支持金砖五国设立银行 愿与其合作》，中国网，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3/27/content\\_19270402.htm](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3/27/content_19270402.htm)。

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就会保持宽松。<sup>①</sup> 而日本在 2013 年 1 月宣布实施“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至今仍然沉醉在量化宽松的狂欢节情绪之中。<sup>②</sup>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提振本国经济增长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呈现好转，但导致了全球低息环境和充裕的流动性，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承受热钱大量流入、本币升值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等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而且，一旦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价格会面临大幅波动，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资产大量撤出的风险。面对严峻的外部金融形势、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调整转型压力增大。

新形势为金砖国家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面临近似发展问题的金砖国家来说，强化战略合作的意义更为重大，而新形势也为金砖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在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的合作战略应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金砖机制正确定位有利于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国际认同。

金砖合作机制要成为有行动能力的国际机制，必须首先定位正确，并且要与金砖国家的实力地位和利益偏好相适应。机制定位是合作机制化建设中的基本要素和重要考量。机制定位又与其身份定位密不可分，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实力象征，其身份和性质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表。这就决定了金砖机制是 G20 框架下的一个协调机制。金砖国家必须认识到，金砖机制的意义除了促进金砖国家的合作外，还利用 G20 平台协调新兴国家的立场。俄罗斯一直希望金砖国家以统一的立场参加 G20 峰会，并认为这将巩固金砖的地位，并对 G20 提供帮助。同时，金砖国家也要认识到，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经济贸易规则，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金砖国家自身无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因此，金砖机制不是一个寻求与发达国家对抗的国际机制，而是一个寻求与发达国家实现更有效合作的机制。同样，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目的并不在于削弱业已存在的多边

<sup>①</sup> 吴家明：《欧洲央行再度打开降息之门》，载《证券时报》2013年5月3日，第4版。

<sup>②</sup> 《李稻葵：如何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全景财经网，2013年9月2日，[http://www.p5w.net/news/gncj/201309/t20130902\\_293791.htm](http://www.p5w.net/news/gncj/201309/t20130902_293791.htm)。

金融机构，而是要成为这些机构的有益补充，使金砖国家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中。同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建立和运行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其他国际或区域性金融治理过程中已有的探索成果，汲取教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第二，建立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是协调金砖国家利益、凝聚金砖合力的现实选择。

金砖机制是金砖国家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也是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合作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金砖国家间战略合作的良性互动。尽管金砖国家有着相似的身份和目标认同，有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与空间，但金砖国家的合作存在许多问题，如相互之间贸易合作还不多、相互依赖度不高。同时，在追逐自然资源、竞争市场份额和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权力以及许多共同发展议题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利益冲突。加上金砖国家在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其缺乏共同价值观基础。尤其是金砖各国均面临艰巨的现代化挑战，也对其合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晌。就连在机制建设的出发点上也还是存有差异。国家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建设一种软约束合作机制成为现实的选择。为避免金砖国家之间矛盾激化使合作受损，以推进机制合作的合理性及有效性，需要定期就某些重大事务进行对话、协调、协商，形成一致立场和政策，也就是说，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这是金砖国家机制建设和战略合作的基本要求，也是金砖国家最有可能促进合作务实化的路径选择。

第三，完善“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包容性合作机制，增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内在动力。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基于全球治理时代主题的全新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今时代各国普遍追求发展条件下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新思路。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包容性发展致力于克服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差异带来的障碍，真正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共享发展成果。把包容性发展作为金砖机制中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兼顾政治信任累积，通过不断积累政治互信，逐步化解矛盾和分歧，以包容性合作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同时，包容性合作还是开放性合作的思想基础，因为金砖国家的组合本身就是

亚非拉地区开放性合作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开放与竞争使各国从各自发展走向互利互赢的共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与外部国际环境的矛盾与协调。把包容性合作理念植入开放性合作中，就是重视金砖国家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包容性，加强与全球各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注重与金砖国家以外的经济体参与合作。包容性合作不是利益交换与平衡，而是共同应对与解决金砖乃至全球治理中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

完善包容性合作机制还要以合作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为保证，即“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逻辑为指导方针。首先，金砖国家需要通过实质性合作为各自发展创造空间和条件。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克服市场壁垒，提高需求的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扩大金砖国家市场的整体规模，为各国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提高合作服务水平。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多边机构代表为辅助，以务实合作为目标的论坛作为合作平台，以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为基础，循序渐进，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把疏通彼此间市场壁垒和障碍作为合作机制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品，通过发展专业化的组织和团队，培育合作文化与制度，不断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进而提升合作机制的可靠性和实用性。最后，中国作为金砖国家联结全球分工体系的枢纽，需要在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是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完善的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

第四，推动金砖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建设，实现金砖国家产业演进和可持续发展。

网络化这一新兴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实现更大范围内经济主体的社会联结，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网络化机制的发展表明，在扩大需求规模、促进生产分工细化、提高专业化水平、强化生产流程各环节以及生产与消费间联结的过程中，网络化将成为自我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但是，在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网络化运作中，发达国家因吸聚高端生产环节而不断拉升消费力，并拉动全球产业链运转；发展中国家则因聚集中低端生产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在国际竞争机制下被大量转移。作为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具备较强的工

业化实力和差异化发展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网络化机制既是必须也是可行的。网络化的运作和联结模式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造了发展空间，通过专业化提升生产效率和收益，并转化为驱动网络化的消费力，从而促进整体市场的响应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事实上，近些年金砖国家一直在探索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挖掘合作潜力，提高经贸合作水平。2011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达到了十年前的6倍。<sup>①</sup>相信通过网络化机制建设，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将更牢固。德班峰会决定建成2.4万公里的海底光缆直通网络连接五国，打破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对金砖合作的网络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总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并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单一显示，而是在新型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兴起背景下，发展中大国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通过自觉合作，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分工体系重构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重要举措和切实路径。<sup>②</sup>

#### 四、中国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思考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中的重要成员，不论是从经济规模、增速和世界占比，还是从全球竞争力等方面，中国都在金砖国家中占据领先地位。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为第29位，与上年持平，而其他四个金砖国家，除俄罗斯（第64位）排名有所上升外，南非（第53位）、巴西（第56位）和印度（第60位）均有下降，其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从2006年的8位扩大到了当前的31位。<sup>③</sup>“金砖”概念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指出，“金砖国家整体增长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sup>④</sup>尤其是考虑到近期金砖其他国家经历

---

<sup>①</sup> 《金砖国家间贸易总额超3200亿美元》，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6日，第22版。

<sup>②</sup> 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60页。

<sup>③</sup>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第29位继续领先金砖国家》，新华网，2013年9月4日，<http://news.hexun.com/2013-09-04/157711098.html?fromtool=roll>。

<sup>④</sup> 《“金砖之父”：金砖国家的黄金时期并未结束》，上海证券报，2013年9月10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30910321567581.html>。

的经济困境，奥尼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能修改，（金砖四国 BRIC 里）我只会留下 C（China）”。<sup>①</sup> 南非《独立报》也曾称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非正式领导人”。<sup>②</sup> 对于在金砖国家中地位如此突出的中国来说，应该如何利用金砖合作这个平台，又该在金砖合作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也一直在积极推动金砖合作从松散的对话论坛向更加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发展，并将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金砖合作也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首先，借助金砖平台，助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随着开放型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2008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弊端，中国政府一直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然而，虽然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大幅提升，但仅靠自身力量去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代表权的不平衡问题，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金砖国家是具有最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的五大新兴经济体的集合，也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有共同的强烈诉求。随着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它必将成为东西沟通的桥梁、南北合作的纽带，促进整个世界治理更加开放、透明和公正。<sup>③</sup> 因此，金砖国家既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的舞台，也是参与像联合国和 G20 等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平台。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G20 圣彼得堡峰会前，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提出，金砖国家在当前形势下要共同应对好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主张。<sup>④</sup> 这些主张既进一步凝聚了金砖国家的共识，也得到了 G20 与会国家的接受和认同，

<sup>①</sup> 《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目前仅中国称得上金砖国家》，观察者网，2013 年 9 月 9 日，[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3\\_08\\_26\\_168119.shtml](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3_08_26_168119.shtml)。

<sup>②</sup> 《金砖组织“不再是纸老虎”，西方极力打入“楔子”》。

<sup>③</sup> 赵杰：《“金砖国家”的世界分量》，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 年第 13 期，第 14 页。

<sup>④</sup>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纪实》，载《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7 日，第 2 版。

体现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其次，通过金砖合作探索新时期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为摆脱发达国家控制、发展民族经济而开展的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南北对话走向僵局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南南合作虽然呼声高但成绩有限。进入 21 世纪后，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但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挑战。在此形势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加强南南合作、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会，还可以减弱世界经济的系统风险，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因此，新形势与新挑战使南南合作的战略重要性再次突出。由五个新兴发展中大国组成的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是新形势下南南合作的代表，并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有西方学者指出，金砖合作“是一次‘和命运的约会’（tryst with destiny），第三世界国家过去为此斗争和团结多年却不能实现，而现在却开始复兴了。”<sup>①</sup>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部分。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因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明显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在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径。金砖合作机制是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一个沟通与合作的核心平台。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有利于突破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堵。同时，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也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是新形势下南南合作的新内容。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我们要用伙伴关系把金砖各国紧密联系起来，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sup>②</sup>

---

<sup>①</sup> Joseph Ingram and Daniel Poon, “Brics: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March 22, 2013, <http://www.nsi-ins.ca/newsroom/brics-a-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 “Tryst with Destiny”一词来自 1947 年 8 月 14 日，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日前夜的演讲《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We Made a Tryst with Destiny）。

<sup>②</sup>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主旨讲话》（2013 年 3 月 27 日），载《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

这指明了金砖国家的战略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再次，应始终强调金砖国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虽然是由当前五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构成，体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定位，但是，金砖国家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反映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诉求，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是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依托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发出反映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与诉求的呼声，才能使自己的政策与主张具有更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而如果想借助金砖平台实现一己私利则会严重损坏金砖合作。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与道义支持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可信赖的朋友。因此，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在金砖合作中，中国要始终强调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代表，这样才能使金砖国家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最后，在金砖合作中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原则。金砖国家间因资源禀赋、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在一些具体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不同；而且金砖各国均为新兴大国，随着其国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也均有宏大的民族抱负和大国战略，在追求大国之路中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加上个别国家间因历史原因还存在着猜忌甚至怨恨，这些都给金砖合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但金砖合作的战略意义已是各国共识，为此，必须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切实推动金砖合作。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地位突出，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其他国家的猜疑和防范，但任何形式的合作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能长久。因此，在金砖合作进程中，中国只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不会充当领导者，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收稿日期：2013-07-29]

[修回日期：2013-09-13]

[责任编辑：陈鸿斌]

#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

梁益坚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事实上主导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体系理论又都以理性主义为指引的，凡不遵循理性主义逻辑的体系理论，多不被视作严肃的体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的缺陷恰好在于其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应用：体系理论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讨论，而理性主义方法却注重微观层次的考察。这就导致了止步于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简洁有余但解释力不足，而多数引入更为微观讨论的理论尝试又陷入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应当重新强调理性主义的微观关注，将微观研究重新引入体系理论。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一方面尝试将体系理论的宏观层面与理性主义的微观层面相结合，另一方面旨在寻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汇合点，并由此得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本研究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理论 微观分析方法 大国和小国

**【作者简介】**梁益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117-18

---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 30 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sup>①</sup>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 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 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sup>②</sup>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sup>③</sup>但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

---

<sup>①</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sup>②</sup>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第 18 页。

<sup>③</sup> 参见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sup>①</sup>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 一、微观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分析

新现实主义诞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体系层面成为主要的研究层面。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划分标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之分，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分。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线是比较分明的。

表 1：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

| 研究方法<br>研究层次 | 理性主义                  | 社会学方法                    |
|--------------|-----------------------|--------------------------|
| 体系层次         |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 | 建构主义等                    |
| 单元层次         | 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等         | 女性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暴力冲突的心理学理论等 |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制作。

<sup>①</sup> 参见布鲁斯·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66页。

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识是怎样影响行为体选择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sup>①</sup> 对于社会学方法而言，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背景条件。比如经济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剥离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将其看做是给定的；而人类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内容正是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论研究中又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研究层次上，华尔兹划清了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的界线，这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为了理论的简洁，将国家假定为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把整个理论的因果逻辑推导集中在体系层次。这并不表示它们认为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不重要，而是为了使理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更加明晰。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变得简洁的同时，理论的经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剥离的变量太多，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其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权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体系理论还是坚守了体系研究层次。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将单元层次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关注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强调女性在权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单元层次理论所关注的主体恰恰是体系层次理论所剥离的“国家暗箱”。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是国内政治是否重要，而是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影响。<sup>②</sup> 研究者在这两个层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层次上的体系

---

<sup>①</sup>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sup>②</sup>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31.

一单元的划分，使得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进行了人为分割，特别是对微观层次的刻意忽视，导致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即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系理论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而导致的。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还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因此，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义微观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析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地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微观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功、明晰地在体系层次上将微观层面（单元层次）纳入了考虑、融入了理论体系。在不失宏观性的同时，也不失微观性，实现了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微观经济学虽然也将行为主体假定为“理性的”<sup>①</sup>，但相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经济人基础上，以数学为工具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逻辑演绎和推导，进而得到了经济在均衡时的状态。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无争议的一个领域。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的争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经验研究的理论升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经济现实导致了各种理论学派的出现和争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也存在多个理论流派的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通过坚实的微观基础演绎推导而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给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为体系理论引入一个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个微观分析方法同样也属于体系层次，而非单元层次。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作“同质行为体”，止步于国际政治的宏观部分。其实，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可以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微观部分。可能有人会说政治问题太复杂，

---

<sup>①</sup> 经济学假定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选择。

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日常语言的确更为有力，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却又很不容易被发现。<sup>①</sup>

## 二、微观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内容

肯尼思·华尔兹在创建新现实主义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sup>②</sup> 该理论把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厂商的产品差异、组织形式和内部决策过程，认为市场产生于厂商的互动，市场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厂商并能决定价格和数量，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华尔兹在参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也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国际结构比喻为市场，认为国际结构产生于国家的互动，结构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国家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sup>③</sup> 然而，这一市场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业只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而不是由大厂商和小厂商共同组成。<sup>④</sup>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完全竞争市场”之外，还有“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将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sup>⑤</sup> 现实中的厂商并非是“同质行为体”，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更多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而微观经济学发展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理论，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同理，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国家组成，而华尔兹将国际社会看做是许多同质国家组成的“完全竞争”（无政府状态）结构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本文认为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结构来比喻国际社会可能更为合适，可以借鉴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现实。

---

<sup>①</sup> 参见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第66页。

<sup>②</sup> Fearon D. James,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p. 293.

<sup>③</sup>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4.

<sup>④</sup> James,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94.

<sup>⑤</sup> 仅有部分农产品的市场接近完全竞争。

因此，本文的微观分析方法修改了华尔兹关于“同质国家”的前提假设。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中，基本假设是厂商的非同质性，这种差异使厂商获得了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借鉴这一思想，本文假设国际社会是由非同质性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上。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国家为两种类型：“大国”和“小国”，核心变量是“影响力”。<sup>①</sup>需要特别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质基础”并不是核心决定因素，尽管可能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有影响力的国家；“小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结构的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厂商的存在会使市场结构无效率，但大国的存在会使国际社会有秩序。

从这一前提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做是同质的、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是由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互动所产生，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独立的，就像是“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是由厂商互动产生一样。可是，正因为它们是自在的和独立的，所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很难对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变化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改变了前提假设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大厂商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的。本文的假设也是如此，大国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结构，小国受国际结构的影响和左右。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假设所带来的解释力上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由于没能预测到冷战结束而备受指责，但批评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解释不了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但根据“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对体系结构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大国而言，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体系结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大国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原因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随之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说，大国是体系结构的制定者，而小国是体系结构的接受者。如果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表示，就是“大国——国际结构——小国”。因此，这不是华尔兹认为的“结构选

---

<sup>①</sup> 这样处理不影响结论的一般性，但大大简化了分析。

择”（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死灭），<sup>①</sup> 而是“大国选择”（顺大国者昌，逆大国者亡）。

在区分大国和小国的问题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按照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这一区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中“大厂商”的概念是给定的，大家不会去讨论拥有多大的厂房、达到多少年产量的厂商是大厂商，这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非凡影响力的体现。当今的大国，亦难以非常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论英雄”里所言，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sup>②</sup> 因此，在理论的论述中，“大国”的概念是给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也可以适当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主要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强对复杂情况的分析能力，还可以将大国划分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世界大国决定国际结构秩序，地区大国能影响和决定地区结构秩序，并可能对国际结构秩序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加入这样的变量可能会使理论的推导变得模糊，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在新的前提假设下，为了防止犯“还原主义”的错误，本文根据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图形引入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微观图形，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同样也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图1）。

第一，国家预算约束线是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制约线。图1中的斜线AB就是国家的预算约束线。这种约束是指国家的行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资源的制约。超出预算线的国家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大国的预算约束线远离原点，小国的预算约束线靠近原点。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内容，而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也可以引入具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另外，预算线是可以变动的。它的变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国家的实力增加或减弱引起预算线的平行移动；另一种是斜率的变化，也即X轴

<sup>①</sup> 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39页。

<sup>②</sup>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或 Y 轴两种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同等预算下可消费的产品数量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预算线的斜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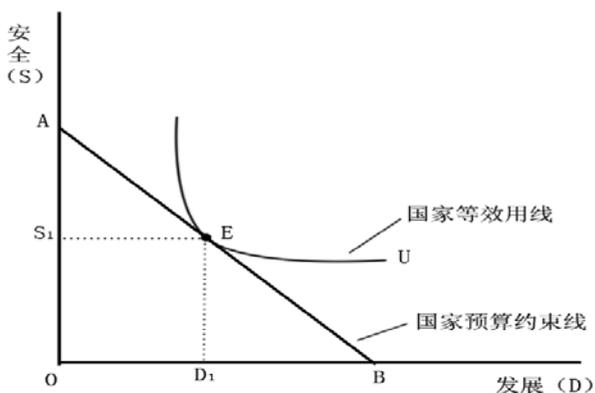


图 1：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本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安全与发展是国家消费的两种主要“产品”。为了保持微观图形的简洁，假定国家有限的预算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安全和发展。<sup>①</sup> 图 1 中 X 轴表示发展，Y 轴表示安全。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权衡取舍，需要对安全与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做出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安全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力量和源泉；从长远来看，二者互为补充。预算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代表了国家在发展和安全上的一个组合。理论上国家可以选择预算线上的任意一点来确定自己的发展和安全的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国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国家会选择效用最高的组合。因此，国家需要做出考虑的是：如何在预算线（国家实力）的约束下获得对国家最有利的安全和发展水平。

第三，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一个暗箱。图 1 中曲线 U 就是国家等效用线，它是用来衡量国家的效用水平的；U 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

<sup>①</sup> 正如爱德华·厄尔所言，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每个治国之才面临的最关键也是最吸引人的问题”。参见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 218 页。

发展组合，U 凸向原点表示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偏好极端的组合；U 离原点越远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 的位置代表了国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 的位置决定过程被看做是一个暗箱，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本文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U 的位置是给定的，它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被忽略的。<sup>①</sup>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效用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点。也就是图中的 E 点，E (S<sub>1</sub>, D<sub>1</sub>) 表示国家在现有预算条件下能够投入用于安全的资源和用于发展的资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国家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思想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本体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厂商可以为了利润进行合并，而国家合并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厂商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学的四种市场结构中，厂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属性，并不是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sup>②</sup> 这一属性植根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这也正是当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常常失去目标的主要原因”。<sup>③</sup>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存既不是一个前提假设也不是一个推论，厂商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它可以为了利润而进行合并，但国家却很难。要吞并或消灭一个国家的难度非常大；借用物理学的术语作类比，国家这个行为体的原子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要聚变或裂变这个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惊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这个由社会属性连接的原子结构，其稳定性远远超过

<sup>①</sup> 在经济学研究中，等效用线的位置也是给定的，它只讨论消费者的效用线在给定的情况下所出现什么情况，而不会去讨论消费者的偏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某种偏好，因为这已经超过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围。把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剥离并放在这个暗箱中，这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图形包括太多的变量，将使因果关系变得复杂而不清晰，虽然这可以增加图形的解释力，但却很难说它是成功的。

<sup>②</sup> 华尔兹认为国家的生存考虑是由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参见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 31 页。

<sup>③</sup>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序”第 7 页，第 191 页。

了厂商的结构。即使是“一体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欧洲，人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到要聚变几个“原子核”又谈何容易。虽然国家也会像厂商一样追求利益，但国家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一个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讨论条件。

### 三、微观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论

在上述“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和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微观分析方法的六个推论。

推论一：国际社会的特征是“多头等级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国家造就的”；<sup>①</sup>它实质上是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同质国家”这个前提假设建构出来的。国际社会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同质行为体的互动才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华尔兹将国际社会假定为无政府状态是与现实不符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内容。<sup>②</sup>米尔纳对此也进行过评判，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sup>③</sup>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恐怖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个多头政治（polyarchy），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也只存在于大国之间。对于小国来说，国际体系实质上是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系，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sup>④</sup>在多头等级结构中，大国

<sup>①</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 391.

<sup>②</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 4-15.

<sup>③</sup>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1991;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140页。

<sup>④</sup> Carlos Escude, "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 Argentina and The Condor II Missile Project," in Stephanie G. Neuma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55.

和小国会不同的行为特征，大国更注重均势与制衡，小国更注重福利与生存，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将相对收益的分析方法绝对化。国际合作的难题其实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下虚构出来的一个命题，并非国际社会的现实。<sup>①</sup> 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多头等级结构的缩影。加强对国际社会多头等级结构状态的研究，将促使大国抛弃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上，而是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承担起那份属于大国的责任。

推论二：规模效应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国际机制有助于国家形成规模效应，减少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

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资源和预算下，国家要实现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获得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大国本身就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单位预算收益要比没有规模效应的小国高；也就是说，大国的规模效应减少了它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而对于小国来说，要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单位成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产生除了“防止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信息对称”<sup>②</sup>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规模效应。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进而获得规模效应。当然，实现规模效应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国际机制的结构也是非常灵活的，它不仅存在于小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大国与小国、大国与大国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欧洲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来形成发展方面的规模效应；美国、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来降低安全方面的单位成本；小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大国购买武器来降低武器研发成本，大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小国出售甚至赠送武器来提升大国自身的安全。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大也会引起收益减少，这可能也是欧盟一直拒绝俄罗斯加入的一个原因。大国通过规模效应获得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小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规模效应，不然就很

---

<sup>①</sup>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67-85.

<sup>②</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0-93.

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大小国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会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国际机制既可能是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供应派机制<sup>①</sup>（即国际机制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由大国主导，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基欧汉所认为的需求派机制<sup>②</sup>（由于国家的需要）——由小国联合组成。进而，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改变体系的特征，但这仅具有相关性而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规模效应的确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产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产品是由国家等效用线决定的，也即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非机制所能直接左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sup>③</sup>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是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sup>④</sup>但以上分析显示，国际机制可以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但国际机制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干预变量。

推论三：参加国际机制将使国家追求更为合理的安全与发展平衡。

从图 2 可以看出，国家加入国际安全机制后随着安全的单位成本降低，同等预算条件下获得的安全产品更多，这样国家就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在不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是一个暗箱，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不同的国家，其等效用线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等效用线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即自变量）是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

在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也是一个暗箱，但国际机制是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在体系层面通过改变安全与发展的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来干预和影响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使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

<sup>①</sup>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sup>②</sup>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③</sup> 另外，以克拉斯纳为代表的温和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国家行为，是一个干预变量。参见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p. 185-205.

<sup>④</sup>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前言第 3 页。

合趋向于平衡。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参加国际机制后的国家预算线会成为一条曲线。假设 M 国加入了一个安全方面的国际机制，规模效应使其安全方面的单元成本下降，同等投入下获得的安全增多，表现为预算约束线以 B 点为中心向右上方转动。但由于国际机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该国将受其他成员国情况的制约，所以这一增加过程必然是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下降，所以预算线在靠近 Y 轴的部分会发生弯曲，国家预算线成为一条曲线。也即参加安全机制后，图 2 中国家预算约束线由直线  $A_1B$  变为曲线  $A_2B$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一国参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机制。

其次，在国家预算线成为曲线的情况下，选择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平衡组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图 2 中， $E_2$  点是平衡发展的选择点，它所形成的矩形  $OS_2E_2D_2$  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国际机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将使国家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把曲线  $U_2$  移向  $E_2$  点，即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上，国家会趋向于选择二者的平衡发展。但曲线  $U_2$  最终是否移向了  $E_2$  点，国际机制不起决定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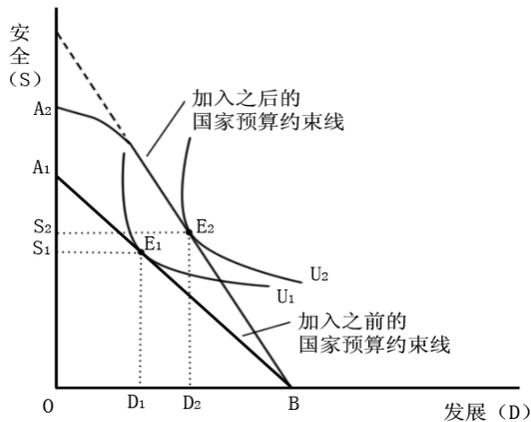


图 2：M 国加入国际安全机制之后的收益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在 M 国加入安全机制之后，在国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安全消费

由  $S_1$  上升到了  $S_2$ ，发展消费由  $D_1$  上升到了  $D_2$ 。这是由于规模效应而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预算剩余，它可以将这一部分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方面，也就是说国家参加安全机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以此类推，如果某国参加发展方面的机制，它也可以将发展方面的预算剩余转移到安全上。因此，不论参加机制之前的国家效用线是偏向安全还是发展的，在参加国际机制之后，国家的选择都会趋向二者的均衡发展。这颇类似于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即在某个领域建立机制之后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但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功能外溢是指从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而“预算转移”只是国家在某个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安全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领域。所以，这种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预算的转移。

推论四：随着规模效应的变化，国际制度会有一个产生、稳定和解散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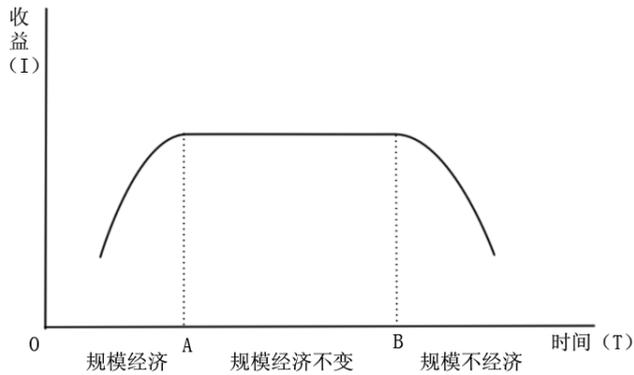


图 3: 规模经济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虽然加入国际机制能够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元成本，但是从长期看，规模效应是会变化的，将出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变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图 3）。在国际机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形成规模效应，某些国家开始大声呼吁，希望与另一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如果其他国

家也认为可行的话，国际机制就产生了。国际机制产生的领域和形式都是多样的，在合作领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发展方面的；在合作形式上既可能是小国与小国，也可能是小国与大国或者大国与大国。在第二个阶段，当规模效应形成之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国会努力维护该机制的稳定。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时候，成员国进行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机制内某些成员国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消失，国际机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如果不能在现有成员国内形成新的规模效应，这个国际机制就可能解散，大家开始去寻找新的“组合”。由此可见，国际机制形成的根源还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日益复杂、物流通信高度发达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国家也积极地参加国际机制来降低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元成本。在以往的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看作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和研究本体是有很大大风险的，由于规模效应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不稳定，这使得国际机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个干预变量，而研究的本体应该还是那个具有“稳定原子结构”的行为体——国家。

推论五：在理论研究中，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分界线；但在具体研究中，它又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暗箱，把国家内部因素都放入这个暗箱中。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理论将国家暗箱当做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工具。而在微观视角下，将国家的实力大小引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仅仅只是将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放在这个暗箱里，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使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界线，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国家实力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剥离出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国家等效用线暗箱的设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国家效用是由国内的偏好来决定的。国内的偏好通过国际政治是难以进行分析的，而国内政治则是分析国内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国家行为微观图形中的国家等

效用线既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条分界线，也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个结合点，某种程度是将二者进行划分和结合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彼此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其分界线。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通过这个图形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比如，在对 M 国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先通过国内政治来分析 M 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偏好结构，然后将国内政治分析出来的结果引入图形之后再继续进行国际政治的具体研究。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影响国家的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而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何种选择。

推论六：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

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华尔兹先后提出过“第二种意象”<sup>①</sup>（内→外）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外→内）两个模式；古勒维奇在颠倒华尔兹的“第二种意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颠倒的第二种意象”<sup>②</sup>（外→内→外）。而本文的分析则可推导出“大国内→外→小国内”的模式，也即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结构是动态的，视大国和小国的情况而定。大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决定者，小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 结 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

<sup>①</sup>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sup>②</sup>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sup>①</sup>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 2013-04-17]

[修回日期: 2013-10-15]

[责任编辑: 张 春]

---

<sup>①</sup>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obert M.A. Crawford and Darryl S.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001, p. 27.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嘉涵

2013年9月2—3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保护海外能源利益：中国与欧洲的方法与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法国国防历史研究所、乔治·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基金会、化险咨询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能源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机制，西亚北非与中亚地区能源安全，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 一、能源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机制

近年来，随着能源需求不断快速增长，防范能源安全风险已引起各国的重视和关切。有学者认为，应从地缘政治事件影响、运输线路的稳定性、环境与气候变化四个维度来加以分析。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为实现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可及性、价格合理性与可持续供应性营造良好环境。中国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与美欧等主要国家或地区加强联系，扮演领头角色，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参与运输线路尤其是海上航道的保护；三是致力于生态营

---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比较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造与低碳环境建设。中国需加强同亚洲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借鉴欧洲经验，构建更加稳健且与防范能源安全风险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有学者阐述了欧盟对能源安全风险的认识，认为随着能源需求量日益上升，欧盟面临的供应竞争与威胁也不断加大。为应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挑战，欧盟成员国需加大国内能源开发力度，尽力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并通过技术提升来改进能源使用效率。为应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在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欧洲在非传统天然气开采方面需保持谨慎态度。总体上，尽管面临挑战，欧盟并未陷入能源困境，今后要考虑长远需求，通过与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强化合作，出台转型性或改造性政策，努力影响世界能源市场。

有学者从法律视角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应积极利用双边投资条约来化解海外能源投资风险。目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主要面临遭受偏见与质疑、征收与国有化以及战争与内乱的风险。鉴于中国已与外国签订了100多项双边投资条约，因而需要更加注重平衡自身利益，通过双边投资条约来保护海外能源资产。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明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按照合作开发、跨国并购、贷款换资源等不同投资方法制定相应的利益保护措施，对主要投资风险与争端做好预防与处置安排。

有学者通过回顾两个世纪来英国、日本、美国、苏联对大西洋、印度洋、波斯湾等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垄断与争夺，强调保护海上运输线路在维护海外能源利益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认为中国参与对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运输线的保护有利于其维护地区利益与能源安全。甚至在中东地区，中国也可适当参与排雷和打击海盗活动。

## 二、西亚北非地区能源安全

西亚北非地区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同时充满地缘政治风险并对区域内能源安全形成重大影响。有学者分析了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认为该地区的主要冲突点仍是冷战遗产。在意识形态作用下，俄罗斯仍在保护自己的盟友。作为中东老牌大国，伊朗油气资源丰富，且具有强烈

的民族主义情绪，站在什叶派穆斯林立场上对抗美国。以色列受益于伊朗的资源，两国事实上拥有共同利益。以色列屡次欲与伊朗妥协，但因伊朗与美国关系不佳，伊以关系也未能正常化。此外，伊朗与土耳其也相互猜忌。预计伊朗不会持续发动资源战争，转而依赖土耳其和中国，在核能力发展方面会与西方国家加强谈判，谋求妥协。

有学者指出，中东过去 50 年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和权力的中心。但 21 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了若干变化。美国开发了页岩气与致密油，加拿大开发出油砂，巴西也在尝试开采深海油气，这对中东的能源权力结构造成了冲击。因此，需要思考美国在西半球能源供应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的意涵。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提高将使自身面临诸多风险，如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恐怖袭击风险、投资目的地国的腐败状况等。中国应当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在能源市场中的作用，同时为外资进入油气行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除确保海上通道畅通外，中国还需花大力气保障陆路油气基础设施特别是长距离管线的安全。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西亚北非恐怖主义风险对该地区能源安全构成的威胁，认为许多国家内部都存在足以引发动荡的力量，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利比亚南部地区的武装势力等，当前叙利亚国内的乱局也使部分恐怖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总体上看，西亚北非的恐怖主义风险正在上升，沙特南端靠近伊朗的地区、也门南部阿比扬地区都存在激进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力量在西亚北非呈现出星星点点的蔓延趋势，亟须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

有学者指出，中国应坚持实施多元化战略来保障能源安全，既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与油气生产国及相关国家保持双赢合作关系，又要立足自身，在国内想办法，抑制进口量的过快增长，同步实施油气进口的多元化战略，实现多供应源、多通道进口。在这方面尤须加强中阿合作，稳定中东油源。办好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对于巩固和提高中阿能源合作水平意义重大。拟议设立的银川能源交易所可从煤炭交易起步，逐渐走向国门，进入国际能源市场。此外，上海自贸区也不妨引入中东的石油资本。

### 三、中亚地区能源安全案例

中亚地区油气储量丰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是大国竞相博弈的场所。2014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安全局势变化是否会对中亚国家与大国在中亚的能源利益造成直接影响？有学者认为，中亚的能源利益不会与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形成密切关联。总体而言，中亚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世俗政权，不大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冲击，宗教激进主义对中亚国家没有太大吸引力，他们更想成为土耳其式的世俗伊斯兰主义。因此，中亚的能源形势更多取决于中亚国家内政情势的演变。目前，中亚国家与外国能源企业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但基本没有改变合作共赢的格局。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中亚国家内部的三大政治风险：一、制度缺陷，政府透明度较差，行政与司法体系不成熟，经常被政治化；二、政府官员经商现象严重，过程缺乏透明度；三、政治优先方向不断变化，对能源领域投资者提出挑战；四、政府强调经济多元化，外国投资者不再过于依赖油气领域。未来几年，中亚五国中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将面临领导层交接，外国能源企业因此会面临复杂的投资环境。尽管能源断供的可能性很小，但与总统继承相关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有学者基于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理环境与油气管道分布的描述，强调了该地区能源供应国也有自身的安全需求，认为他们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油气储量没有苏联解体初期宣传的那么多；二、大部分油气资源为西方企业控制；三、资源开采条件恶劣，投资环境不理想；四、领土争端不断，如纳卡冲突、俄格冲突、里海划界问题等。而中亚高加索地区国家亟须应对的能源安全风险则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社会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家间能源债务与跨境水资源纷争也可能影响该地区的能源安全。

有学者探讨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特殊意义。作为开放的多边合作项目，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既缓解了中国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有利于中国能源运输安全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同时也符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管道起始国及过境运输国的国家利益。由于政治意涵不强，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可增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的信心。

还有学者对塔吉克斯坦跨境水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思考。塔吉克斯坦人均水能资源与淡水资源均居世界第一。为蓄水发电，塔吉克斯坦在境内建造了数十座大中型水电站，这导致它与阿姆河下游国家因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发生矛盾，而开凿卡拉库姆运河则使咸海发生渐趋枯竭的生态危机。塔吉克斯坦利用跨境水资源亟须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建议今后在妥善续建大型水电站的同时，大力发展小型无坝水电站，支持推广节水农业和膜下滴灌技术，积极开发地下水资源和矿泉水资源，并引流萨雷兹堰塞湖水，减少隐患，接济咸海。

#### 四、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展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能源安全面临系统性问题与风险，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将挑战有效转化为机遇。中欧在能源领域合作空间巨大，但需加强相互间了解，增进互信。有学者指出，中欧之间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差异导致双方在能源安全认知和理解上也产生差别。中国首先着眼于能源供应的安全，致力于实现满足能源需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三大目标。同时，中国习惯自上而下制定政策，同时又有各省市相互平行的法律法规。因此，促进中欧能源安全合作需要双方超越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协作。

有学者认为，发展低碳能源可以成为未来中欧能源安全合作的新方向。目前，中欧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同时，双方能源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在化石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中欧可相互借鉴节能减排经验，尝试通过扩大低碳能源应用来携手实践低碳计划。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中欧能源安全合作机制仍不够充分，很多事务亟须共同行动。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应区分轻重缓急，将一些工作当成重要起点，比如为能源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共同保障非稳定国家内能源企业职工的安全，相互交换对地区和有关国家局势、风险的分析结果，通过二轨对话形式缩小议程范围等。今后，中欧双方还可进一步借助国际组织达成的多边协议来共同营造稳定的能源供应环境，并以此促进区域间与国家间的合作。

# “2013 周边形势与中国外交”

## 学术研讨会综述

方 晓

2013年9月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了“周边形势与中国外交”座谈会。会议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主持,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座谈会主要围绕我周边及海洋战略、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与前景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 (一) 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原则与领域

与会学者指出,“包容性发展”是我国注入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则。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圣彼得堡峰会时提出的“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一系列新理念,以及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三点建议,与“包容性发展”一道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发展关系的准则。

与会学者皆认为,中国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是地区的发展机遇。中

---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考验我们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能否顺利实现地区合作的目标取决于中国自身结构转型的进展，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基础保障。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各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力推结构性改革，刺激国内消费，确保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为全球市场增量贡献重大份额，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亦将因此继续提升，这将从根本上为中国与周边的经贸合作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周边国家与中国在区域内贸易方面确实存在竞争，但丧失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和有实力的投资来源国绝不是周边国家所能承受的。地区合作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随着我国沿海地区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升级，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向周边和内陆转移，中国有条件改变高消耗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从产业发展来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仍将是重要形式。我国具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多项优势，未来五年仍将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仍将在区域产业链中占据中枢位置，从而为巩固和深化我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继续注入活力。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及新兴产业的转移产生的包括环保、节能和新能源领域的更多商品，将成为我与周边国家贸易的新增长点。

第二，投资与贸易一起成为引导全球化的主流。中国不仅早已成为全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逐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2 年全球投资活动萎缩，但中国对外投资却逆势上扬，当年流量高达 878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7.6%，存量则突破 5000 亿美元，达 5319.4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13 位。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吸引周边国家投资较多，但对周边国家投资较少，对东盟投资存量仅 236 亿美元，仅占对外投资存量 5319.4 亿美元的 4.4%，中国对周边国家投资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加强跨境、跨国地方政府合作。内陆与沿边地区以新建城市为着力点拉动经济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推动开放。中国需注重在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处理好内陆、沿边、周边之间的关系，完善次区域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和“10+1”，既保证国内发展，又让利周边国家，促进共同发展。与区内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之间开展节能技术、新能源开发、防

灾减灾方面的合作，统筹解决能源、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是金融合作。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10+3”框架下于2000年5月启动了“清迈协议”。全球金融危机后，“清迈协议”从2009年12月起从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升级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建立了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2012年5月再次扩容至2400亿美元。全球经济的调整 and 转型升级，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产业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更多的金融业务支撑，如从单一的国际结算扩大到信贷类、代理类和股权投资类业务，以及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协作，风险防范，等。

第五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刺激有效需求的工具。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已成为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而这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海陆路互联互通、农田水利、能源加工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将进一步深入。2013年8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已就探讨建立亚洲互联互通投融资平台达成共识，以支持区域内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将在未来五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带动人民币“走出去”。目前人民币“走出去”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边境贸易结算，和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与中国边境贸易额相当部分是用人民币结算的；二是出境旅游消费，人民币银联卡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可以广泛使用，成为中国积极推进并参与周边货币合作的一大标志。

第七是全球经济治理。东盟、印度、韩国等，都希望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争夺话语权，谋求调整目前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改变体系不对称劣势，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展开合作的基础。

## （二）中国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建设

与会学者指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谈判是中国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的当务之急。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RCEP构想由东盟提出，最符合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也最具可行性。若能在2015年如期建成，有可能成为未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雏形。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未来的合作应抓住几个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一是提高自贸区水平和企业对自贸区的利用率。第二是互联互通，不仅包括交通等硬件上的连通，更重要的是人员、信息、货币等软件的自由流通。第三，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产业链上都位于下游，应以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为抓手，共同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另外，美国选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下简称“TPP”）为重要抓手，推动投资准入和改革区内主要经济体国内制度，引领地区一体化。然而，TPP 谈判牵扯利益面复杂，采取“一揽子”谈判方式，以“一刀切”的办法处理不同国家的诉求，与一国无关的议题可能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因此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尽管如此，中国仍应抓住机遇参与规则制定，提升国内改革开放水平。

有学者指出，中国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特点在于先行先试。东盟国家由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等存在巨大差异，并未形成实质性的一体化。中国可积极寻求与个别国家先行先试，在建设产业园区、重点区域合作、企业间行业对接与产业合作等方面深化合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即是能够突破地区机制建设困难的重要途径，中美 BIT 谈判的有关制度能够在实验区内边谈边试，而中美 BIT 谈判又能为中国正在或者计划开展的其他地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提供范本，扫清规则和机制障碍。

## 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地区战略态势发展

### （一）大国关系与亚太格局

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未来的亚洲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给中国带来军事安全和地区制度建设上的压力。美国一再容忍地区部分国家右翼势力的主张，通过海洋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牵制中国，特别是在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方面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形成重大挑战。美国依靠在本地区另建一套机制，引导形势发展。中国作为大国全方位迅速发展。美国经过量化宽松、非传统能源革命、制造业回归、吸引对内投资、提升就业等一系列举措，稳步走出金融、经济危机，今年国民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 2.2%。五年来，美国和中国均提出了一些中美关系战略理念，如“中美国”和“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是互补性关系，双方有条件在亚

太以中美关系为核心，亚太一体化为重点，以新思维和理论制度模式建构区域一体化。

也有学者指出，日本走向的不确定性造成地区风险上升。日本内债高筑，国家面临破产风险。当今日本与明治维新时期一脉相承，当时日本以战争为机遇改变国运。日本也在寻找机遇期，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习惯于在大国对峙环境中发展，偏好冷战格局。而中国在全球化中成长，对全球共同发展的依赖高于其他国家，偏好是全球化，机遇在于和平发展。因此，中日之间是两种不同国家战略的较量。

## （二）地区海洋战略态势及我应对

与会学者指出，建设和谐海洋，首先是要界定我国所处海洋社区属性，特别是明确周边海域及相应国家的不同特征；其次是要明确，中国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洋条件相对不利国家发展与周边临海国家关系的权益。在明确地理环境属性基础上，以历史和法律为基础逐渐明确外交措辞，增加填补型权利。例如，以“U型线”指代所谓“九段线”的说法，即我国在南海地区历史性水域的外部界限。在为我海洋权益“正名、正法”的同时，运用多种方式解决海洋争端，既可以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调停、斡旋、民间智库交流等综合方式。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海洋和边境合作开发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中外南海联合科考，与多国进行渔业、港口合作等，并成功在北冰洋航线试航。但中国的海洋和跨境合作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大冲击和破坏。地区国家主动利用和配合美国战略，伺机加大发展海洋战略和立法力度，以争端掩盖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实际上将争端国际化。尽管我国参与如联合国渔业协定等相关国际机制起步晚、空间有限，但仍应坚守法律原则，坚持合作开发，区分不同海域情况，条件成熟的按照国际法有关原则划界，在争议海域“争而不界，主动开发”，按照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的“四原则”开展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工作。加快与周边国家渔业协定谈判速度，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落实有关海洋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海洋型城市，领导地区的国际公约执法，率先举起海洋保护的旗帜，及时行使海洋保护的责任，服务亚太海洋社区利益。

#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

## ——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张 春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建构愈益迫切。相应的努力也日渐明显，且正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而迈向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新近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便是其代表作之一。<sup>①</sup>《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主题的三部曲之二，延续了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的主题，探寻中国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并以欧洲经验为参照寻找中国全球角色的启示。

### 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

在探寻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努力中，最为首要的便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全球角色。不是作“应然性”讨论，王逸舟教授回顾了从1919年直至今天的中国外交发展，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几个30年，“实然性”地考察中国全球角

---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国际展望》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sup>①</sup>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除非特别说明，正文括号中页码皆出自本书。

色的生成，进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中国外交理论的特色所在。

根据王逸舟教授的看法，1919—1949年的30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解放斗争的30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30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30年（第8—9页）。从中国全球角色的角度讲，中国事实上引领了这一时期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中国是在通过“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30年即“毛泽东时代”，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和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第13页）。这个30年也是中国的全球角色发生逆转的30年：从一开始很大程度上站在主流国际体系的对立面，到逐渐演变为竞争直至成为美国的准盟友，为迈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起的30年，是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突飞猛进的全新阶段（第28页）。事实上，此前30年中国全球角色的演变，某种程度上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历史潮流的或许是无意识的准确把握。世界历史潮流从殖民主义向着和平发展的转换，曾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及全球的思想乃至政策混乱。尽管未必是最早走出这一思想和政策混乱的国家，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较早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潮流，从而确保了此后30年里中国迅速地从“改变自己”、“适应世界”到“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已然完成从“受压迫者”到“负责任的大国”的蜕变，向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的阶段发展。当然，中国人站到了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树未大先招风”的特殊压力与孤寂（第37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麻烦和挑战，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成长的信心，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可能是新兴大国里最强烈的，也许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乐观的（第48—49页）。中国共产党人也通过将“合作”、“共赢”等词汇纳入对世界潮流的论述，通过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概念，继续站在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前沿。

当然，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全球角色之生成，始终处于一个“再平衡”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全球角色正发生重要的转型或升级，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设者、参与者开始变成一个重大的驱动力和新的引导者，或者说是一个新崛起的、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这一角色还不够完美，很多方面还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在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全球安全、国际文化等领域，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像在经济领域那么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仍需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使自身变成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创造性积极作用的角色。

## 二、发展不干涉内政理论：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角色，便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和更全面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克服眼下的困难、创新性地发展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理论。这需要从政治哲学高度来思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造性介入”讲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某种方法论；它的重点不在价值观，而是提倡一种积极态度（引言，第3页）。王逸舟教授的探讨远非就此止步，他事实上提供了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再解释；二是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新全球角色的要求思考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

传统上，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共处原则代表着受压迫者、弱势群体共同愿望，折射出对国际政治现有秩序提出批评和抗议的那些国家的声音（第73页）。二战后的历史也证明，中国一直是维护这一原则的主要大国之一，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政治独立和外交自主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伙伴。在同样的意义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有理由也有可能不仅自己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而且应当在国际社会全力维护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广泛应用（第76页）。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领导层看到了趋利避害的机遇，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强调转向新的方向，即各国应有公平合理的参与和决策权利（第75页）；同时也注意到，修正传统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呼声正日益上升（第78页）。因此，中国“加大介入”不仅不是对外交传统特别是不干涉原则的否定，相反

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某些主宰性力量之不合理、不公正秩序的纠偏，是维护并提升中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做法（第 82—83 页）。更为直接地，中国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是与中国自身的能力和世界历史潮流的演变相互适应的，即经历了一个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的发展。<sup>①</sup>

中国全球角色的演变，使得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成为一种新的大国责任。在王逸舟教授看来，创造性介入就是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就不会产生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冲突。可以认为，通过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可以避免不干涉内政，还是对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的思想，王逸舟教授认为，新时期发展不干涉内政理论的重点是，如何在量力而行、互助互利的前提下，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战略援助和公共产品（第 67 页）。

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是要突破西方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和期望差距。这在非洲表现得非常明显，多数非洲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到来会加剧大国争夺，危害非洲利益；不少非洲国家只希望中国加强财政方面的援助（第 99 页）。因此，中国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类、战略安全类和思想类。<sup>②</sup> 总之，广义的公共产品既包括物质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既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如联合国会费），也可以是文本或制度形态的（如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和国际海洋法公约）（第 134 页）。

### 三、借鉴欧美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理论的普遍意义找寻

中国的全球角色是初步和不完整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进，因此必须学会合理地借用“他山之石”（引言，第 3 页），使中国特色的理论具有普遍

---

<sup>①</sup> 潘亚玲：《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试析中国互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新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45-57页。

<sup>②</sup> 张春：《试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三大使命》，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2期，第11—12页。

性意义。

王逸舟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共享政治”和公共领域，给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空间（第 195 页）。中国有必要在国内进行适度 and 稳健的改变，使之得到多数百姓和部门的理解和接受。这种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变革及其议程，是依照本国国情和发展日程确立的，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和破坏，不会被一时一事的“战略意外”所改变和颠覆（第 63 页）。其目标是树立中国的广阔战略意识，争取在全球高地站稳（第 148 页），改善当前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崛起的尴尬局面（第 146 页）。

就创造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言，欧洲的方法也颇具参考意义。欧洲人的干涉偏好不仅有军事压制和经贸制裁等强力表现，还体现为体制、舆论和观念等方面的优越感和“先手棋”（第 155 页）。相比美国超群的硬实力，欧洲人最大的优势不在器物层面，而是其积淀深厚、系统完备的现代体制和规范。欧洲国家实施对外干涉时，不光有基于利益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也有现代体制和规范方面的内因（第 172 页）。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是中国全球角色生成的最重大挑战之一。王逸舟教授正确地指出，中国面临的重大难点，……在于怎么恰当处理国内巨大的重心（决策优先性）与不断增强的国际角色（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用合适的机制统筹协调外交、军方、商务等部门的潜在矛盾（第 60 页）。欧洲也可在这一方面为中国提供重要借鉴。欧洲人的干涉往往有其国内价值观的重大支撑。欧洲人在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作用，是自觉和竭力充当国际规范的起草人、宣读者和推广机器的角色（第 178 页）。与欧洲相比，当代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这类思想贡献总体上数量较少，多半带有东方人的哲学思辨色彩，更加宏大高远，重道义而轻实利，抽象有余但操作性较弱。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贡献主要来自政治领导人，而学者、学术机构和媒体的独特创造似乎极少，至少被国际承认的微乎其微（第 190 页）。因此，在中国迈向新的全球角色、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国内还存在需要改革的诸多弊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对于借鉴和超越欧洲的问题，就能比较均衡，做到心中有数（第 191 页）。

# Abstracts

## **The Rising, Innovating and Striving of the Zhou Dynasty**

###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Political Culture and Pursuing Grand Strategy of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SHI Yinhong*

By reading the *Myth of the Zhou Dynas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 this essay probes the Zhou Dynasty’s grand strategy of shaping i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rsuing a grand strategy of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Due to its overwhelming life-style of aerial farming, the Zhou Dynasty developed a characteristic “nation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and thus firmly established a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Ying and Shang dynasties. By exercising “soft-power” and accumulating “hard-power”, Zhou flourished and expanded to wait indefinitely for the Armageddon to change. This grand strategy had successfully made the center of attraction having shifted even before the shift of the balance of powers. And the would-be result of military showdown had been predetermined prior to a war because the strategy had been assisted by the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campaigns and by the equally effective forging of alliances before the non-strategic and hegemonic war was launched by its ultimate rivalry. Zhou, after its successful rise, swiftly took a series of grand strategic measures in four aspects, namely, strategic education,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fruit of the rise. The rising, innovating and striving of the Zhou Dynasty demonstrate that the sort of fundamental innovation and doctrine are up to the sor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while in terms of a particularly crucial strife and grand strategy such as national rise and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the fate of the innovation and doctrine are up to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strategic commanders in the first place.

## **Colonial System, Post-Colonial System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WEI Zongyou*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r the sovereign nation-state system defined by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theory ignores the fact that it consists of two sub-systems instead: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post-colonial system, with the former expanding from the era of the Great geographic discovery by the West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latter lasting from the dissolving of the colonial system till now. The colonial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avage conquering and occupation of the “backward races” in America, Africa, Australia, and Asia by the West, in which only the Western powers enjoy the privilege of sovereignty and the rest are deprived of it, and the rise of powers is accompanied by war and conquering. The post-colonial system formally abandoned conquering war and colonization as legitimate instruments of foreign policy, and it’s also a closely-knitted web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a result, it provides much more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nations to rise peacefully. The simultaneous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is a convincing case and hopefully it will continue to live peacefully with the established powers in the future in this post-colonial system.

## **China’s Rise**

### **—Grand Strateg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SONG Dex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a non-Western, newly emerging power,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have a basic choice of road based on broad consensus, a pragmatic and prudent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program and a coherent strategic patience, though equally important are the availability of a grand strategic theory reflecting the psych of the times, the realistic state of affairs, and a Chinese aspiration. Along with the great national revival of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a process full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challenges,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abou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n China’s rise was automatically put on the agenda and has reached great achievements. The theory should be based on: firstly, the requirement of pursuing realistic politics; secondly, rationally defining the world powers; thirdly, requirement of creating a basic logic of strategy; and fourthly, pointing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entennial rise. Therefore, decision-makers and scholars alike should be committed to harboring the time and space, deep and wide enough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its structure and trends in a long run and by which to think over, and design, the road for China and a basic strategic choice. At present, we particularly need to think over the grand strategic theory on the rise of China in three aspects: security cognition, definition of interests and exercise of power, in order to form an organic logic chain and finally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i.e., the great national revival.

## **Driving of Theory and the Rise of Power**

### **—The U.S. Experience**

*ZHAO Kejin*

The rise of a nation is the rise of ideas to the final analysis, and especial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ories improv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a nation can really rise or not.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he drive of ideas and the intelligent support are indispensable to its rise. The U.S.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its rise was first unraveled around the realistic policy issues confronting America. To answer the issue “how to handle the U.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the U.S. had put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onsistency with its domes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grand strategy of the new American empire that pushed for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form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IR theories full of competition within and organically unified without. Especially, the U.S. strategists’ community had designed the realist theory about a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a bunch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sts headed by Hans Morgenthau, George Kennan, Henry Kissinger,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were encouraged to face up to the U.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ality and planned for the future of America on the height of th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hat provided the rise of America with a powerful intelligent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d institutionalized the theoretic research by having established the public think tank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policy advisers, which provided the U.S. strategic theory and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a reliable pivot. Therefor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ells a truth that the rise of a power must be prepared with a grand strategic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are coherent with its inherent values and its outer system concer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become the theoretical pillar of a world power.

##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On the Features and Causes of American Economic Recovery**

*WANG Guoxing and YING Xiangshuo*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U.S. economy began to recover since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with new feature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covery though not robust enough throughout the period. In macroeconomic terms, the growth rate is not high and the employment rate grows modestly; the recovery is unbalanced among industries, i.e., the recovery of service industries is faster than commodities though almost all industries have recovered; in microeconomic terms, enterprises are in a good shape

of gaining profit, which have reached a record high. A good microeconomic performance with a not so good macroeconomic on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causes: on the supply side, productivity rate grows slowly in the absence of new breakthroughs in technology; on the demand sid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remain plain as households and enterprises are not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n the policy side, monetary policy and budget policy play a big role in economic recovery, though its marginal efficiency is decreasing; and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xternal condition is not very ideal due to the impact of debt crisis of Europe. Thus, the U.S. economy will presumably remain recovering though quite slowly, and will fail to reach its potential growth rate unless there occurs of a big technology progress or a good external condition.

### **Sino-Afric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 **—Status Quo,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veloping Trends**

*ZHANG Xiaofeng*

We believe that the Sino-Afric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ith huge potential; Cooperation with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conditions has yet to have a higher level. As th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constantly grows, African countries profoundly reflect on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desire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financial cooperation space is wide. In the future the cooperation will focus on 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cooperation, etc. In the cooperation the banking industry occupi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s a result, both sides will actively push forward cooperation in the insurance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and then realize the macro financial field.

### **BRICS Cooperation Strategy in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LU J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created the BRICS regimes. With the world economy entering into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period, strengthening the BRICS countries pragmatic cooperation highlights the BRICS regimes' influence, the initiative by the fifth BRICS Summit of launching a joint development bank and a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pool pushes the BRICS countries pragmatic cooperation to a new stag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RICS countries' cooperation strategies are as follows: first, to rightly position the BRICS regime; second, to establish soft binding mechanism of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third, to improve inclusive

cooperation regime of “development on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on development”; fourth, to construct the network mechanism of BRICS countries’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RICS countri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Micro Research Method for System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NG Yijia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 facing a difficult puzzledom between the rationalist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a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reality. We believe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cking a micro rationalist method for system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ssumption of various theoretical schools established in macro empirical basis,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macro view make their theories different. Currently, the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other mainstream theories put the countries as unitary actor, only study macroscopic par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act, there has a microscopic sec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at can use the rationalist research methods. Therefore, to create a micro rationalist method for system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necessary, and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roduces a graphic as meets the need of the analysis, and concludes with six inference based on the micro method. This author hopes this attempt will help better explore a nexus theory between system level and unit lev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